共产主义政权体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共产主义政权体系

〔捷〕 奥塔·希克著

蔡慧梅、谭美华、王健众译，张　斌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徐凤嵺

共产主义政权体系

〔捷〕奥塔·希克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54,0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书号：3100·234　　定价：0.63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说　明

《共产主义政权体系》一书的作者奥塔·布克一九一九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六——一九四〇年曾参加过反纳粹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一九四〇年被捕关入集中营。二次世界大战后始获释。一九五二年起历任捷共中央党校教授、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一九五八年当选为捷共中央候补委员，一九六二年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一九六三——一九六八年任捷政府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设计了捷共经济改革方案。一九六八年四月任捷政府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同年八月，苏军侵捷后流亡瑞士，现在任瑞士圣加伦大学教授。

布克在流亡期间发表了好几部论述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著作，本书是其中的一部，完成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翌年由西德汉堡霍夫曼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八年由高桥正雄和渡边文太郎二人合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出版，改题为《克里姆林宫官僚统治的实态》。全书约十七万字，共分七章。本书根据日译本翻译，按德文版本校订。

本书从历史上、实践上、哲理上对苏联和东欧的社会性质及其政权体系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一、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垄断体制。布克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作进一步的探讨。认为苏联已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只有“阐明官僚体制产生的原因，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布克以大量篇幅论证了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都不是社会主义”。苏联实行的是“独特的官僚体制的独特统治。它对外是霸权主义，对内是国家垄断主义”。他认为把

这种制度叫做"党的官僚"体制和"国家垄断"体制最为恰当。"前者说明政权机构所包含的官僚主义内容，后者反映了它执政的特点。"这种官僚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在这种体制下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须符合党内官僚的利益，因为决定党的领导班子及其政策的，不是党本身，更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已在政权中巩固了自己地位的官僚。党的官僚掌握着实权，任何个人或领导班子都必须得到官僚集团的支持，否则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因为，"这个集团是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特权阶层"。因此布克认为苏联"不仅是一党专政"，而且是"党阀专政"。"实际上政治家对人民并不负责任，个人借助官僚机构决定一切，但是只要这个社会还不能实行真正的选举，就不可能使这些人受到社会按正常方式给予监督、批评，甚至罢免。"

布克接着指出：今天苏联的领导人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把罪恶和弊病都归咎于斯大林个人性格上的专横，却不去触及官僚体制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勃列日涅夫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官僚体制。

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是产生官僚主义体制的原因。布克说："官僚化的产生与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和实行垄断的政治体制是分不开的，这个国家缺乏民主传统和把社会主义理论简单化，也是一个原因"。他认为"苏联的官僚体制早在列宁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列宁后来对官僚化的发展感到震惊，并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是已为时过晚"。斯大林通过不民主的制度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利用布哈林的经济理论击败了托洛茨基，实际上斯大林又贯彻了托洛茨基那套加速工业化的路线，并以此反过来打倒布哈林。官僚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取得自己的利益，斯大林也利用党的机构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这样，"独特的官僚体制便进一步得到巩固"。

布克进一步揭露苏联官僚集团为了贯彻他们的统治而把干部

政策当作争权夺利和镇压人民的手段,“干部问题成为最重要的权力工具，也是政治局委员最为关注的政治活动。”他认为官僚们任用和提拔干部不是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而是以唯命是从、拍马奉迎、看风使舵为条件，于是“机会主义的适应性和无原则性就成了个人行动的指南”。布克说：由这些人组成的领导集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加强了警察、法院和监狱等镇压工具，同时又利用特权封官许愿、堕落腐化和结党营私。“官僚体制异常膨胀,以致发展成为具有难以想象的镇压手段的新的统治阶层。”

三、强调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布克说:“在十月革命初期,列宁曾主张取消市场交换,由国家直接分配产品,这种设想在理论上表现出严重的简单化，忽视了市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必然存在的、客观上不能取消的种种原因。一九二一年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列宁在理论上认识到上述做法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布克认为,当时列宁还强调“企业独立核算的重要性”,但是，列宁没有能够得出“企业生产不可能由中央机关具体决定”的结论。布克说列宁“过高估计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可能性,没有看到高度集中、垄断化和在政治生活中逐步抛弃民主原则所造成的党和国家的独特的官僚化，以及由此而给社会的发展带来的难以避免的不良影响”。布克认为,“布哈林关于充分利用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市场关系的观点是正确的。布哈林反对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和过快的工业化,认为这将会破坏工农业之间的市场平衡。因为工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的迅速增长为基础,两者是互为条件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业获得持续的发展”。

四、苏联的发展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异化现象进一步加深。布克说：苏联虽然标榜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个也没有实现。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在苏联,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是解放生产力，可是苏联的劳

动生产率之低“无法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由于苏联重点发展重工业，这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给人民生活造成灾难性后果。马克思的第二个原则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但苏联工人迄今仍无权处理自己的剩余产品，“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被国家官僚的剥削所代替。”希克指出：苏联官僚集团力图加强军事实力而无视人民的生活。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关心和自觉支持下才能获得发展，可是这个基本思想却与官僚主义格格不入。马克思另一个根本愿望和社会准则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异化，然而在苏联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异化更加严重，贪污盗窃、徇私舞弊、利用特权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盛行，这些现象都反映了普通人和各种机关正在发生深刻的异化，也反映了人们本身的异化。希克说：自杀和犯罪等社会现象，“事实上是对这种社会制度的强烈抗议。”希克在谈到苏联异化现象时还指出：苏联官僚集团采取了帝国主义政策，“列宁把那种不愿意承认各民族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政党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行为，今天的大俄罗斯主义的官僚们正在不折不扣地用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和自决权来证实了列宁所说的这种背叛行为。”

本书关于一党制的提法、认为“列宁自己就参与了中央集权制的工作”、批评斯大林是“权欲主义者”，以及把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归结为产生官僚主义体制的根源等观点，立论偏颇，值得商榷。

由于翻译水平有限，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日

目　录

前　言

本书的目的是想在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其在高度发达国家的运用之后①，对苏联控制下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现实制度作一探讨。这里不仅分析这些国家的特殊性，还要从这些社会制度中发现共同的普遍性的本质。

分析这些共产党国家的现状，也是为选择另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发展作准备。因为只有充分地认识现实制度究竟有哪些实际缺陷以及带有什么实质性的内部矛盾，才能提出和理解关于克服这些矛盾的新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设想。鉴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宣传(这个宣传也为西方一部分教条主义的"社会力量"所推广)，把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各种缺点轻描淡写地极其简单地说成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的困难"，因此，这就更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根据官方说法，目前经济上存在的若干问题是由于：第一，在计划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缺乏经验；第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还不够高。这种说法应予以驳斥。问题不是经济上存在若干困难，而是整个社会制度违背了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的设想。官方的宣传没有揭示，而是故意掩饰这一制度的较深刻的根源。

要认识究竟什么是被官僚主义歪曲了的社会主义状况的本质和原因，这对曾经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们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本上没有分析过这种社会问题。而我自己也只是在经过了长期的体验和理论学习之后才摆脱被简单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的羁绊。这正是我

① 参阅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现代化工业社会》。——译注。

对“社会主义”现存制度采取批判立场的前提条件。除了我以外，在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变革的人们还很多，正因为有了这种变革要求，才能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之间掀起了要求从制度上实行根本性变革的斗争。我们在捷克经过为期十年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之后进行了制度改革。尽管这个尝试由于受到来自外部的暴力袭击而被阻挠了，但在我国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至少应使人们得以了解，而在东方集团，从来就没有人以毫不妥协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记述我国所发生的一切。

从我的切身体验中清楚地懂得，要想把一度陶醉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人们转变到不同的新的思想方法和立场上去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袖手旁观。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争取建立一个能保证有人的未来发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也希望本着这一精神对共产主义体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奥塔·希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于圣加伦

一、导　论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建立的社会制度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国家在苏联的影响或在其直接的政治压力下产生的社会制度，一般都通称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以下简称为东方集团)共产党，认为这个制度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建立的。他们不仅借助于这种理论为现实制度辩护，说它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把来自民主社会主义者对现存制度提出的批评以及要求对制度本身作重要改革的尝试，一律斥之为"反社会主义"或"反革命"的活动。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现存制度，就其本质说，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设想的，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本质，因而凡是企图改变这个制度的某些基本特点的，都必然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显然这种思想方法和议论是非科学的、教条主义的，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与"社会主义表现"相矛盾的具有实质性的事实而已。因为：

(1) 他们不去探讨这个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把这个制度的某些特性说成是"社会主义原则"(生产资料国有化、由中央全面实行经济计划管理和通过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等)，他们不允许人们去分析这个制度的社会结构和统治关系，同时也不允许分析在各种有关政治机构中形成的意见同大多数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表面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特点的帮助下，掩盖了统治结构和经济制度上的反社会的实质。

(2) 他们虽然在言论上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但是这仅仅为了掩盖这个制度的反社会的本质而作的片面的曲解。

尤其是他们强调要通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采用国有化的形式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并以计划管理的形式由中央全面实现经济计划化，等等，实际上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的下列强烈要求：1.把劳动者从一切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2.随着共产主义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逐渐地废除官僚体制；3.停止对一切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们的剥削；4.保证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同时保证他们有权直接参加处理和利用自己的产品；5.克服工人与劳动场所、企业单位、经济基础和社会管理机构等相分离的异化现象。他们不仅忽视这些要求，还以所谓“不可能实现”或“这是将来的目标”等进行诡辩，欺骗群众。

(3) 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然而马克思和列宁都强调理论必须符合实际，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并根据实践经验不断予以修正，可是他们完全无视这一衡量科学性的决定性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与实际相对证，没有根据新的经验和认识进行修正，而且许多简单化乃至错误的前提没有被发现或加以否定。这样，以计划取代市场这样的理论设想，虽然已被证明是简单化的、并给社会带来了重大损失的思想，却没有得到批判和克服。由于在理论上存在着这样最严重的缺陷，也就对下述问题毫无理论上的准备，例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利益矛盾问题、涉及面很广的官僚统治问题、缺少效益标准的问题，以及生产者不关心经济的最佳发展等等①。这些理论上的缺陷不仅不允许揭露，更不允许以新的、与官僚利益相抵触的理论去加以弥补。在东方集团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已成为旨在维护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国家信仰。不管在口头上如何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都不足以证明苏联及在其控制下的现实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

① 关于理论上的简单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缺陷，参阅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译注。

以下各章将试图阐明为什么这个体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说明马克思理论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几个根本性的必要条件①，在东方集团的社会制度中都没有实现。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不仅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而且特别需要根据现存制度本身的经验去加以补充和具体化。

虽然不能脱离马克思的若干基本要求，但是还必需说明制度本身存在的严重障碍和缺陷，因为它使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不能得以贯彻实现。这些障碍是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也是官方的（为共产党所接受和推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没有详细探讨的。克服这个制度上的根本缺点，也许是这个制度可能转变为真正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因此，从理论上分析这些缺点，以及令人信服地指出克服这些缺点的道路，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的新的原则性的要求。

独特的"官僚体制"的绝对统治，是东方集团的体制中的消极特征，也是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障碍。我打算根据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理论分析，说明这个官僚体制的产生、它的独特结构以及它进行和维护这种统治的机制等。同时，我还将说明克服官僚统治（也即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性条件，就是必须具备各种民主条件。不能设想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在缺乏民主的社会里，劳动人民不会有社会主义的自由。在那里，新的官僚体制将会异常膨胀，以致发展成为具有难以想象的镇压手段的新的统治阶层。在民主条件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缺点将会经过长期的努力而开始得到克服。

因此，如果从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东方集团当前的制度，不能称作社会主义制度。书中虽然按建立这种制度的党的名

① 马克思经常谈到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及其两个阶段。自列宁时代起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被称为社会主义阶段。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制度，详见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德文版第384—392页。——译注。

称，在形式上把它称作“共产主义制度”，但是不能因此而把这个制度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或其他共产主义空想混淆起来。换句话说，这里所讲的共产主义制度，是在东方集团中现实存在的制度，它建立在历史形成的共产党单独执政、并在党和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庇护下错误地被称作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制度。这里使用“共产主义体制”这一称号，这绝非为了以它来反映这个社会制度的决定性本质，如果要恰如其分说明它的特征，则应称它为“党的官僚”体制和“国家垄断”体制。前者的叫法，说明了这一政权机构所包含的特殊的官僚主义内容，后者的叫法，则反映了它的经济特征。

但是，任何一种叫法，都不能充分说明这个制度的本质。以上这些论述，只是为了对用词作一些说明。下面，我将首先着重阐明官僚主义政权结构以及国家垄断性质的经济结构问题。在苏联官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一章中，我将着重谈一谈这个制度的那一段历史，在那个时期中，“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关系”的问题上出现了理论混乱及其实际恶果。此外，我还希望说明，由于对官僚问题缺乏理解，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理论缺陷，大大促进了这个制度的官僚化。最后，我还打算从历史上证明：在苏联以及后来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党的领导集团的政策如要作大的改变，它必须符合党官僚的利益；实行党的领导和决定党的政策的已不是党本身，更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在政权中巩固了自己地位的党官僚。尽管东欧国家的社会结构多少有所不同，但是上述情况也适用于东方集团的其他国家，正因为如此，分析这个历史最长的苏联政治发展过程及其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将有助于说明带有普遍意义的共产主义政权机制。

因此，这里并不是要从历史上去探讨苏联复杂的政治发展，而是首先希望强调指出和论述党的官僚——党的领导——党和国家政策这三者之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相互关系。在最近的许多综合

性历史著作中，人们由于过多地描述细小的表面的事实，往往忽略了这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人们往往只看到个别偶然上台的领导人给共产主义政治以决定性的影响，而忽视了在其背后的党的机关的权力。但是，有些历史学家虽然企图从国内外客观政治经济形势中去寻求说明某个政党领导集团和政策的产生原因，但他们又往往忽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然而始终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党内官僚们的特殊利益。

主要由于对共产主义制度中党的官僚所处的特殊地位注意不够，以及对他们贯彻其利益和行使权力的机制、知识不足，这就导致了人们对党的官僚在共产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影响认识不足。在分析共产主义官僚本质及其权力机制的其他几个章节中，我将试图说明这些官僚为什么，以及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能成为共产主义制度的绝对的统治者。正是这种官僚主义统治的结果，使本应可以实现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设想，在东方集团国家中的共产主义实践中受到了严重的歪曲（但他们仍扬言这就是社会主义），从而使无数生活在这些国家内外的工人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就是极端不自由的和压迫的制度。这本书就是想要证明：造成这种压迫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的官僚主义。

二、苏联官僚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意识形态的出发点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发展，首先是由下面两个因素决定的：

① 俄国的经济落后状况。在那里，小农和手工业生产占绝对优势，实际上几乎没有大的企业。

② 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的理论设想。它对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和整个社会的进一步改造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战前，俄国的经济已发展到商品交换广为流行的阶段。战争期间，由于货币贬值和商品奇缺。商业受到了打击，并较多地具有自然经济（以货易货）的性质，投机倒把的浪潮席卷全国。

共产主义者在掌握政权以后，立即开始有意识地进行革命的变革，而且这个变革必然是根据共产党领导者的设想来塑造。即实行经济的集中领导，促进高度集中的现代工业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安排最重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以及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不通过市场的直接关系。

列宁从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战时经济，特别是由国家管理生产与产品分配的体制中得到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对整个生产和产品分配实行全面地控制，可以成为一种过渡的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不通过市场实行直接产品分配的制度。因此俄国革命胜利后，最初采取的经济措施都是按这一设想进行的，即实行土地国有化、强制实行工业联合企业化，以及把银行、铁路、贸易、商船队和大企业都全部收归国有。一九二〇年，五人以上的工业企业全部都实行了国有化，而且从有组织的工

人监督制逐步过渡到经济的集中管理制。此外，中央管理机关不仅控制整个工业生产，而且也负责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中的分配，特别是粮食的分配。所谓粮食垄断，最初还保持形式上的国家收购，但后来逐渐变成强制征购和没收，然后又发展为国家以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由国家在人民中实行消费品分配。

把社会主义的全部生产直接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并且不通过市场进行直接产品分配，以及尽可能把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置于国家的统治之下(企图逐渐地使之从属于社会主义政权)，这些都清楚地反映了原始的社会主义经济设想。列宁把市场关系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过程或是产生资本主义的过程。因此他有意识地企图消除市场关系。无数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首当其冲。按列宁当时的设想，小农所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应通过国家对整个分配过程的控制而加以克服①。如果以为仅仅由于战争期间和战后出现经济和粮食紧张才采取旨在废除市场关系和直接产品分配的方针，那是不对的，它当时是从建立全国的直接配给制度出发来考虑的。无疑，当时在理论上认为走这样的道路是正确的。消灭市场交换、直接实现社会化的设想，早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宁提交给俄国共产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纲草案中就已经阐明了。党纲说："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②

这种设想本身，在理论上表现出严重的简单化，它忽视了市场

①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所谓'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统计和监督'。"(《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第315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91—92页。——译注。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必然存在的、客观上不能消除的种种原因。列宁注意到了其中的若干问题，并打算通过改变现实去克服它们。但另一些问题他却没有看到，因为这些问题列宁未曾经历过，是后来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才开始出现的。

列宁的一个很严重的缺点（它也是列宁的继承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大部分领导人的通病），就是只要一旦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便要硬性地执行。列宁在理论上的透彻性和善于争论的才能更进一步促使他深信已确定的目标是正确的，并以毫不妥协的顽强的态度对待反对派的意见。列宁在向着革命目标迈进的背后，饱含着巨大的毅力。但是列宁与他的继承人不同，他是一切为了"事业"，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力①。列宁认为他是根据"认识的必然规律"向着实现革命的目标迈进的，从他那种惊人的狂热信念出发，自然就不会充分地去考虑别人对他的正确的批评和反对的意见了。他对于这些攻击和意见采取了毫不宽容的态度。即使是社会主义营垒中的人对俄国革命发展提出的怀疑，他也往往置之不理。在取得政权后，列宁对于那些反对者的论点轻率地扣上阶级敌人的言论的帽子。但是在这些言论中，常常却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形式和方法的方案，而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问题，根本就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②。

由于当时进行的不是一个无关重要的实验，而是一场决定数百万人命运的巨大的社会体制的变革，所以列宁性格中的积极的

---

① "列宁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真正诚实的、坦率而又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在他的眼里只有社会的利益，而无个人的权力，我坚信，如果他认为这是为了共产主义，那么无论如何是会让道的人。我是从他的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信念中发现的，这个有着磐石般坚定信念的人，在猜疑心重的西方人中是很难找到的。他认为共产主义的胜利，正如在命运中所决定了的、科学地证明了的——天文学家所预言的象日蚀般地确实无疑的。……列宁从他这种磐石般的信念出发确立了牢固的世界观。"（罗素：《列宁的遗言》）

② 列宁过低估计了民主这个全民性的问题，并且把它看得过于简单化，但是现在随着这个问题的日益明显，就更加说明当时列宁的做法是危险的，他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的反对派都当作了敌人。这只要回顾一下列宁同考茨基的争论的作法就清楚了。

一面，即公开承认错误，并勇于改正的优点，往往不能足以抵消那种“革命急躁性”的缺点（沃尔夫岗·哈里希语①）。但是列宁的继承人既没有必要的理论水平，也没有公开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和改正路线错误的勇气，因而他们在阐述革命思想时就更加容不得与己不同的见解，并且强行把那些简单化的和过时的理论付诸实践。这种偏执和肆无忌惮的态度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典型特征。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中具有一些简单化的设想(有些已经承认是错误的，有些仍然坚持未改)，这些设想是：

(1) 认为个体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可以不经过市场而由国家来集中统一分配，与此同时，工业产品也在农村进行统一分配，并认为可以废除货币②。

(2) 认为应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甚至包括小农)，以及自上而下为有劳动力的人们分配工作③。

(3) 认为不通过市场只依靠中央机关可以保证工业企业进行社会所必需的生产。

(4) 认为官僚主义是领导集中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弊病，它的产生是由于俄国的文化水平低，它只能通过普及和提高教育水平来加以克服④。

但其后不久，列宁经过实践认识到上述第一、二两点理论设想是错误的。他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对整个经济体制进行

---

① 参阅沃尔夫岗·哈里希：《对革命急躁性的批判》第13页。——译注。

② “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首先以存款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纲草案》第92页。）

③ “立即着手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并最慎重地逐步推广到不雇佣别人劳动靠自己的经济维持生活的小农中去。”（《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临时代表大会》第14页。）

④ “我们将同官僚主义作长期的斗争，谁要不是这么想，他就是欺骗，就是煽动，因为要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有千百个措施，需要每个人都识字，每个人都有文化，每个人都参加工农检查院。”（《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全俄矿山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52页。）

了根本性的改革。显然他没有认识到第三、四两点的错误。虽然第三、四两点设想在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早已被人们所看到，可是至今这些错误观点仍然被坚持下来。今天它已不再是认识问题了，而是明知故犯、坚持错误，是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权力机构的必然结果。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首先认识到市场关系在小农众多的农村是必要的① 。因为无论是通过自愿交售还是强制征购，都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取得必需的农产品。更不用说，这种交换（实物交换），比现金贸易还更落后一步。因为以物换物的交易，使农民难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广泛而自由地购买物资，所以它起不到刺激生产的作用。这样，国家又不得不重新通过通常的买卖，用货币购买农产品。并且让农民自由选购工业产品。事实证明，货币流通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② 。

一九二一年，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这说明在理论上已认识到靠国家直接分配产品和强制劳动不能保证满足社会的需求。因而人们不得不努力发展以货币为基础的市场交换制，并以此来代替城乡之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同时，采取稳定币值和相应的控制通货膨胀措施，并在对外贸易中建立可以自由兑换的金本位币制。

列宁了解到，普遍义务劳动制的缺点，并且也认识到通过监督劳动和精神鼓励不可能发挥必要的劳动创造性。义务劳动制不能引起对劳动的兴趣，它终究不可能激发起提高技能的热情，也不可

---

① "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十月革命四周年》第 39 页。）

② "商品交换没有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现在，我们所处的条件使我们必须再后退一些，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而且要退到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莫斯科省第七次代表大会》第73、74页。）

能灵活地改变工种。因为只有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自愿地从事劳动（这同时也意味着自愿受雇和退职）才能发挥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因此，列宁开始强调不仅要以工资形式给予报酬，而且还强调与精神鼓励相比更要优先实行物质刺激，这在长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是必要的①。

列宁同时也强调了"企业独立核算制"的重要性。这说明列宁这样一种想法，即整个企业集体必须尽可能节约经营，并根据经济实效获得利益。但是列宁没有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企业的生产不可能由中央机关来具体决定；没有市场关系，单凭独立的经济核算，是不能使企业从事最有效的和社会所需要的生产。

列宁虽然不断地强调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监督的重要意义②，但是他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劳动"概念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内容。因为劳动是无法由中央机关全面地在量和质方面根据社会要求的发展来加以计划和控制的。所以，过分低估个人利益和企业集体的积极性对促进生产在技术、经济以及质量的发展和提高微观生产结构的灵活性方面所具有的作用，这可能是列宁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这说明列宁并不知道市场压力对提高企业劳动效益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不理解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在主观决定较长期生产计划时，作为客观因素的市场压力是不可取代的。当然，在当时社会主义工业究竟如何发展还没有足够经验。因此，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很大的管理能力，他把重新建立市场关系看作是对俄国小资产阶级（农民）的状况所作的一个让步，并

① "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十月革命四周年》第39页。）

②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僚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国家与革命》第456页。）

认为它对完全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来说是不适用的。

最严重的错误是：**过高估计国家的管理能力和可能性；没有认识到，即使对完全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来说，市场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没有看到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和垄断化以及政治生活中民主原则的逐渐被抛弃所造成的党和国家的独特的官僚化，它给以后的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虽然列宁在晚年对国家和党的机关里日益发展的官僚主义感到震惊①。可是，他没有认识到这种现象与高度集中的和垄断化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而列宁自己就曾参与了确立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工作。他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存在着小资产阶级习性及其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因此，他认为最重要的对策，是进行长期的教育及加强工农检查院和工农监督。但他没有能注意到，即使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如果在那里也实行了类似的垄断政权体制，那么那里也同样会产生这种官僚化，而且控制再严也无济于事。

官僚化的过程

毫无疑问，俄国在革命胜利后的初期采用中央集权化的管理形式，是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而后来的中央集权制的辩护者却总是强调这一前提。但是，企图依靠中央集权机关作出决定的办法去克服客观上出现的困难，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计划和管理方法，是一种过分强调党的权力的表现。那种长期培植起来的所谓只有共产

① "显然，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能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关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第382页。）

"也就是我在上面说到官僚主义分子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的时候所暗示的那些人的名义提出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第449页。）

党才能了解和实现劳动人民利益的信念，导致了对不同意这种信念的观点采取怀疑和无情压制的做法，这种做法最后在斯大林时期发展到了群众性的恐怖镇压。应该承认，这一过程在列宁时期就已开始。

由于战争和内战，经济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产品、原料、生活资料和交通工具都极其缺乏。初期，人们只能通过国家实行配给制来摆脱困境。此外，不仅由于长期的战争，而且也由于对革命成果的错误理解，劳动道德急剧下降，这也要求人们不得不实行严格的劳动监督，以及对某些革命领导集体在经济上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作有效的斗争，这种经济上的不负责任的现象，尤其在实行革命的集体管理制时显得更为严重①。

在工业和文化都落后的俄国，优秀的经济和技术专家也很缺乏。而且，大多数的这些经济技术专家还被看作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并且得不到工人的信任。他们被称作反革命分子，他们即使是没有离开自己国家，但也大部分被撤了职。

这些情况促使许多人赞成实行普遍的集中化和集权化，而简单化的理论观点又为它提供了论据。由于基层生产管理机构里缺乏可靠的领导人员，也由于确立了难以实行的一长制原则以及极为幼稚的“会议民主”，最后还由于生产手段的不足等等，这一切导致了人们不断加强上级或中央的管理机构，因为必须由它来决定生产手段、劳动力、资金和生产任务的分配，由它来承担下级经济部门的管理职能和监督下级经济部门的经济活动和完成任务的情况。这种经济“管理”日益集中到上级机关，以及随之而出现的更加集中片面依靠党的所谓“最后决定”的现象，必然进一步加速

① “你们研究一下主张集体管理制的人，就会在他们的决议中看到一种极其抽象的说法，什么每一个委员必须独自负责完成任务。这种道理我们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你们当中每一个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一百回里只有一回才是真正这样做的。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这不过是一句空话，任何一个委员都没有接受明确的任务，就不可能由个人负责来完成这些任务。我们这里对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检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279页。）

了官僚体制的发展。由于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不具备在错综复杂情况下进行全面领导的条件，而且每个人也没有能力去了解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以及去处理堆积如山的情报，因此，人们只好在各项活动范围内实行日益细致的分工。由于这种细致的行政分工和以量代质的结果，对各项活动的全面监督和目的明确的协调就变得更为困难了。领导机构的任务日益失去它原来的意义和内容，领导机关的任务变成了形式上的自我管理①。这就导致在各个机构的权限之间筑起了壁垒，出现了重复劳动；公文往来不可避免地增加，机构日益脱离实际，其结果是造成了许多不经济的和难以计算的损失②。

随着国家机关的日益扩大和分支日益增多，非党官员也随之而逐渐增加，公众对国家机构官僚主义的公开批评愈多，共产党便日益企图把国家官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为人们最初以为官僚主义是非党员和反革命职工的敌对行为，所以只有加强党的监督才能防止官僚主义。但这意味着更进一步加强了党组织对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拥有更大的管理和监督职能。每一个国家权力机构和活动领域，都要受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专门机构的监督。与此同时，党的机构也就进一步膨胀，其活动领域也越发广泛和复杂，这些机构内的工作人员（都是政治上可靠的共产党员）也日益

①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缺乏责任感、对企业中的机械和技术能力不负责任、自上而下地发布指令的生产计划。在生产对策上、技术上和财政上的许多预算和计划，好容易才冲破一打的机关最后在业务部门通过。接着就是不断修改，从三个月到五个月继续逐个进行修改。但是实际上即使如何管理，也还是存在缺点，盗用公款、滥用、冒领等胡作非为成风。许多职员、记帐员和统计员都从属于一个伟大人物，数万公斤以上的报告书、文件和毫无价值的印刷品围着他转。而且在联合企业的领导机关内，连一个有关企业活动的最基本的数字都没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清楚有关联合企业的任何活动。"（A·朱可夫：《苏联国民经济及其任务》。）

② 在一九二六年，当时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仁斯基批评了官僚主义的工业管理，他说："恐怕我们在工业管理上有不经济的现象。……如果你看到了我国的全部机关、行政组织以及难以置信的官僚主义和不切实际的梦幻般的意图相结合的状况（各种经济部门和经济机关相互之间的状况），你将会感到震惊。"（A·朱可夫：《苏联国民经济及其任务》，1926 年 1 月 1 日《真理报》。）

官僚化，在一般的官僚体制内部又产生了一个超官僚体制。

与此同时，便产生一种特殊的官僚利益。官僚机构本身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决定所有下属国家机构的领导人选，可以任意地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和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可以暴露别人的隐私，可以决定一切的一切——这便使社会上许多人产生了一种羡慕之心和吸引力，向往成为这个机构中的人。这样，在党的机构内，也开始出现往上爬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人们通过合法手段发展自己，而且争相建立许多新的科、局机构，从而也产生了新的力争出人头地的倾向。

俄国革命后不久，很快就出现了反对国家政治领导官僚化的工人反对派。反对派由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所组成，他们在工会内部逐渐确立了最强有力的地位。工人很快发现官僚机构不仅脱离实际生活、形式主义、僵化、内部矛盾重重，发出的许多指示和制定的规章制度毫无益处甚至有害，而且发现官僚机构是违背工人切身利益的。但是他们也逐渐明白违背党和政权机构的意志来实现自己切身利益是不可能的。

许多经验教训说明，具体地批评官僚机构的某些规定和做法，都不起任何作用，工人既缺乏必要的情报和有关的专业知识，而且对整个形势也缺乏了解。工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些有权有势者互相勾结，并拥有各种压制批评者使之沉默的手段。他们看到，大多数掌权者不是被选出来的，而是由上级权力机关任命的。因此反对派提出了管理民主化的口号，要求企业和企业的上级机关实行集体领导，以此来解决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①。

一九一八年，列宁在党纲草案的初稿中曾建议使劳动组织（工

① 一九二〇年三月，工会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在反对党的领导机构的观点而起草的提纲中说："第七，现时所实行的由集体（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起到工厂管理委员会止）来管理工业的原则，是建立调节工业和管理工业的机关时唯一能够保证广大非党工人群众通过工会参加管理的基本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或有关的工会中央委员会双方同意，才能准许个别企业在工会及其机关监督一长制管理人员这一必不可少的条件下，实行一长管理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第 424页。）

会、企业委员会等)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管理机关①，但是，他后来又逐渐改变了由职工组成管理机关的思想。他尤其不相信工人委员会，他越来越认为这些组织是反对共产党对工人的监护权，反对官僚主义集中化经济管理的社团，加之越来越多的非党工人群众被选进这个社团，他于是在一九一九年发出指示：应由工会来代替工人委员会；工会应成为国家管理机关与工人相联系的纽带②。

列宁(托洛茨基更为甚之)强烈要求实行生产管理军事化，主张应直接向每个企业下达生产任务，直接向每个工人分配劳动任务。为了提高生产和克服经济贫困，这种"分配"应具有彻底的军事命令的性质，自上而下地进行，由国家经济机关通过企业负责人下达到每个工人。他们认为直接的工人民主体制将削弱从中央到每个企业的有纪律的逐级下达指令的体制。与此同时，他们还指望将成为工人群众的组织，它将支持具有"行政性质"的国家管理机关的活动，并且向工人群众说明为什么需要由国家机关向社会下达指示的原因，以便协助对生产活动和生产成果实行监督。这样一来，工会的任务就改变了：从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工资和劳动条件等)的组织变成了为生产服务的组织，变成了只动员工人去完成生产任务以及监督生产活动的组织。这个变化也正是工会本身日益官僚化的原因。

但接着就出现一个问题：企业的生产管理任务究竟应由企业内选出的工会组织负责，还是由上级任命的厂长负责？列宁反对在生产中实行职工组织的"议会民主制"，强调由上级任命的厂长

---

① 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123页。——译注。

② "因此，工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同时，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也是同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机关的官僚化作斗争的主要办法，并且提供了对生产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的可能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第50页。)

独立负责制的必要性。因此，他也不认为应由职工组成的新的工会机构来代替工人苏维埃行使领导机构的职能。与此同时，以中央委员施略普尼柯夫为代表的“工人反对派”则主张应该靠工会委员会来共同行使管理生产的职能。工人反对派充分反映了工人以及那些为民主化而斗争的知识分子强烈反对官僚主义的立场。工会不仅要计划和管理企业的生产活动，而且还应该借助于经选举产生的超企业的机构（直至经选举产生的中央国民经济机关）来计划和管理整个经济。这是一场为争取彻底实现经济民主化和工人独立自主地实行经济管理的斗争。

列宁认为工人反对派危害革命，因为列宁认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严密的国家组织，才能保证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符合工人的利益，而工人反对派与这一信念相抵触。列宁还认为在不是由党选出和任用的工作人员中，潜伏着怀疑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因此，他认为应对工人反对派提出的主张展开斗争，使之受到遏制。党从一九二〇年底至一九二一年春之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在争论中，列宁主要得到了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从而最终战胜了工人反对派。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应归功于列宁个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得到了党组织的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党组织的利益在这里也得到了维护）。不过，列宁的论点并不符合工人的长远利益。

在争论中，无论是工会方面（当它阐述其关于集体领导的要求时），还是党的领导机构方面，尤其是列宁，都把两个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而把这两个不同过程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尽管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一是具体的、对生产行使管理的过程，另一个则是对这一管理以及对选择管理人员行使民主监督的问题。

从外表看，这一争论似乎涉及到的是由职工进行集体管理，还是由厂长个人负责的问题。工会代表不断强调民主的、集体的企业领导或管理机构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们更多地是强调领导人

员应隶属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集体机构，而不是否定由个别人行使管理职责的活动①。在争论中，列宁始终坚持要实行“一长制”的原则。

列宁强调只有那些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专业知识的企业管理领导人，才能管理生产，并且批评集体管理的不负责任性，反对由行政组织取代内行的经营管理②。

列宁还强调由一个企业领导人进行生产管理，要比集体管理更为有利，这无疑在过去和现在都还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当时也没有根本的意见分歧。列宁认为在协调生产和交通等方面，都需要由一个人来负责指挥和决断。相反的，集体管理将造成不负责任和互相推诿，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③。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问题都不在于是个人领导还是集体领导，问题的

---

①“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就在于负责的全部机关（从基层直到最高机关）要根据苏维埃制度的需要，把国民经济的领导和组织化建立在反对工人至上主义以及有关选举制度、组织起来的生产者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责任制的原则基础上……

只有建立这种制度，即只有由中央和地方的生产者组织的代表来选出全体国民经济领导机关，才能使共和国的经济得以进行集中领导。如果按这种办法，不仅对国民经济的组织化来说达到必要的意志统一，而且广大工人群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倡议给我国的经济组织和发展以巨大的影响”。（施略普尼柯夫：《国民经济的组织和工会的任务》。）

施略普尼柯夫是联共（布）党内的“工人反对派”成员之一。这个派别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期间在党内围绕着工会性质问题的争论而产生的，它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中的作用，主张整个国民经济交由“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去管理。施略普尼柯夫后被作为反党分子开除出党。——译注。

②“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所以，当我们提出一般的决议，而以很内行的样子郑重其事地说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管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我们在管理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应当开始学习一些东西，权衡每一个步骤，提拔每一个多少有些能力的管理人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394页。）

③ 列宁在同工会派进行争论时反复引用过去已发表的小册子中的观点。他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一切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始终承认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第246页。）

核心是究竟由谁来选举、任命、监督以至罢免这样的企业领导人，企业经理隶属于谁，在企业中由谁直接代表工人的利益。实际上，争论的焦点不管是"个人管理"还是"集体管理"，它强调的是"党的领导作用"论者与"进行民主的独立自主的管理"论者之间的分歧①。

当时，实行有效的管理，确实需要一些有才能的专家。但是诽谤性地指责工人要求独立自主地进行集体管理生产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设想（这一指责后来被经常用于反对各种要求实行工人委员会的企图）是不对的，因为它无法反驳要求民主管理的正确性。当时，许多重大决策问题并未出现（如决定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在不同发展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问题、对企业的管理活动及其后果作长远估计的问题以及解决整个企业集体与企业领导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和发展的，它们并不妨碍日常管理活动的进行。在监督活动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上述决策问题均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企业机构来贯彻实行。

可能有一种不同的议论认为，在革命刚刚胜利后的年代，工

---

① "……我们必须同思想上的涣散以及反对派中的不健康的成份进行斗争，因为这些人甚至说要反对任何的'经济军事化'，不仅反对'委派方法'——直到现在这还是一种主要的方法——而且反对任何的'委派'，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反对党对非党群众的领导作用。必须同工团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如果不把这种倾向彻底治好，就有亡党的危险。"（《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党内危机》第37页。）

"是官僚主义还是群众独立自主的首创精神？这是党的领导机构同工人反对派意见分歧的第二个问题。虽然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上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只在最上层进行讨论。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这里同样也是把议论引到错误的方向。这个争论比见到的实际上更为严重。问题的核心就是在确立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瞬间，工人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在创造性的阶级活动上，究竟是保证有更大的活动余地？还是实行官僚国家机关体制？或是工人群众可以广泛而实际地贯彻独立自主的首创精神？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领导体制好呢？也就是围绕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官僚主义还是独立自主的首创精神的原则在进行着争论。"（A·柯伦泰：《关于官僚主义和群众的独立自主的首创精神》。）

A·柯伦泰是"工人反对派"成员之一，后作为反党分子被开除出党。——译注。

人阶级对制定原则和监督贯彻执行这些原则还缺乏训练。但是这种议论，经过几年社会主义实践后是会销声匿迹的，因为工人和职员通过理论学习，特别是从实践经验中可以取得必要的知识和才干。但是，当时的争论表明，反对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企业集体领导机构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政治上不信任工人阶级，而且过高估计了共产党在才能和道德上的成熟程度。造成这个错误估计的原因，是与忽视党由于垄断了一切权力而出现了官僚化分不开的，是与毫不留情地镇压不同政见和其他政党分不开的①。

从理论上来看，这是忽视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着社会利益矛盾的结果，首先是忽视了掌握管理职能和政权职能的官僚们的特殊的权势已经产生的结果。这种权势利益是不可能通过教育和下面批评而克服的。不断地强调对抗性阶级利益矛盾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低估这种特殊利益以及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利益矛盾，主要是因为他们片面地重视阶级矛盾。他们忽视了社会中存在的并不是以劳资矛盾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差异和利益矛盾。

除了这一理论错误外，起主导作用的还有工人领袖的权势欲。这些领导者自我陶醉在“没有错误”和“享有威信”之中，因此，就看不到群众与政权机构之间的对立。他们把自以为唯一正确的信念也带到了由他们领导的党内来。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列宁身上。他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的“认识”能力和“领导”作用。他执拗地坚信只有党才能领导工人，而那些经过民主方式直接选

① “竭力帮助劳动群众，接近他们，从他们中间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工作人员来做经济工作。而对于那些实际上不外乎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非党人物’，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遣送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去自由地享受纯粹民主制的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换意见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论粮食税》第 357 页。）

举出来的工人或生产者机构有可能走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列宁没有认识到工人是无法与官僚们的利益相抗衡的，官僚们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决策权，拥有重要的人事任命权，他们严密地控制着整个党的机构——从国家管理部门直至企业领导人都受他们的控制，他们的利益是不可能通过工人的批评而加以克服的。列宁虽然也谈到党内严重存在的官僚化，并要求这个党同官僚主义展开斗争，但另一方面，他又把维护工人利益的党外组织和集团称为阶级敌人而予以镇压。列宁不能识破也不想去正视那些党的干部镇压反对派，这也正好助长了官僚主义的专横，他们实际上在所谓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掩盖下压制了工人中的批评。

因此，一面在口头上号召消灭官僚主义，一面又要求人们一切听从于党，这实际上是用鬼驱鬼。这种作法反而导致党的机构和监察机构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本来在理论上就很微弱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在实践中却被葬送殆尽了。全体工人对发展生产力的关心（这正是工人反对派所特别重视的②）也随之而消失了。

反民主的发展

给劳动人民以一切民主的机会！这原是列宁提出的，并被写

①“要管理，就需要有一支久经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大军，这样的大军是有的，这就是党。一切工团主义的荒谬言论，生产者的指定人选——所有这些都应当扔到废纸篓里去。”（《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第47页。）

②“如果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体制，即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组织及其实际管理方式，那么，就将可以克服当时存在的混乱，并且也将能够重新建立和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所谓体制和受沉重的官僚机构支配的建设方式，就是遏制被组织到工会里的生产者的倡议和一切独立自主的行动。依靠官员（这些人都是越过有组织的生产者由上面加以任命的）和怪诞的专家。他们以官僚主义方式贯彻经济政策，生产现场委员会和企业领导机关之间、工会和经济机关之间这两股经济领导力量不断引起矛盾。从这种体系中产生的一切条件，都不可能在广大劳动群众之间激发起生产劳动热情，而且还会影响他们通过组织上的合作来克服经济上的混乱。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体系。”（F·格鲁、E·奥巴兰特编的《是工人民主还是党的专政？》一书中的《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工人反对派提纲》。）

入俄国共产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1]之中。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民表达政治见解、意见、愿望以及决定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切权利，完全被置于共产党的权利之下。除了党的思想和指示外，人民的其他任何创议和意图都一概不能得以贯彻。议论、批评、建议和选举代表等所有活动，都必须在党的机关的同意和监督之下进行，丝毫也不能违背党机关的意志。凡是没有得到党的同意，工人的自发行动都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而受到镇压。

人们认为党是唯一能够理解和体现广泛而具体的人民群众的愿望、利益、观点和建议的政治组织，认为党能够取代全体人民政治创造性，但这些想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民主的。

这意味着不允许对党的机关所作的决定持相反的意见，除了党所推荐和批准的代表外，任何人都得不到信任。这是对劳动人民采取的一种前所未闻的不平等待遇，在实践上就是把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摒弃于政治之外，使他们变成一群在政治上消极被动和受控制的人。与此同时，却给人民中的一小部分人以特权，这部分人也就因此而处于与其他广大劳动人民相对立的地位。

大多数人民都反对这种状况，因为这种状况反映了在政治上有权者与无权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不承认共产党的这种优先地位和拒绝加入党，这意味着有被排除出一切积极的政治生活的危险，至少意味着只能在工会及其他社会组织中从事消极的、“被领导的”活动。由此可见，这里根本谈不上人们大声宣布的所谓“充分民主”。实际上，这里建立的不是“多数人的民主”，而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

虽然人们一再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即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已经改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即大多数劳动人民对

[1] 参阅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中的《俄国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第139—143页。）——译注。

少数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这个一再被强调的论断从一开始就是不真实的，并且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导致了**官僚政权对劳动人民的专政**。当工人不满意共产党员的行动，而去拥护那些符合他们观点的、支持他们要求的代表人物时，就会立即被指责为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观点的支持者①。即使工人宣誓忠于社会主义原则、拥护社会主义体制，但是，如果他们要强调排除官僚主义的弊病和腐败分子（其大部分都自称为共产党的代表），并且要求通过民主的秘密选举选出值得信任的不受官僚机构束缚的代表时，那么这些要求就被视为“反革命的要求”并遭到暴力的、而且往往是血腥的镇压②。

自从喀琅施塔得地方发生叛乱以来，无党派的工人和农民曾多次采取各种方法反对共产党干部对他们进行的监督和实行官僚

---

① 例如在一九二一年，即列宁还活着的时候，喀琅施塔得的工人和水兵发生了叛乱，其特点很简单，甚至连里加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新道路》也不得不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作了如下的报道：“总的说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是从右边向共产主义者进攻，而是从左边进攻。在他们的最后通电中传出了‘苏维埃政权万岁！’的口号，‘人民代表大会万岁！’的口号。他们还不止一次地发表声明，为什么他们反对苏维埃政府呢？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苏维埃政府还不够苏维埃化。他们在旗帜上写着布尔什维克自己曾在三年半以前（十月革命成功之日）提出过的相同口号，半无政府主义的和半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些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们在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斗争中采取各种形式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憎恶‘资产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声明说苏维埃政府已经资产阶级化了，或者说，季诺维也夫‘胖起来了’。即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从左的方面掀起叛乱，而不是来自右的反抗”（引自R·诺卡/E·哥尔德曼：《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的国家化》第99页。）

虽然喀琅施塔得的人们不是从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共产党的干部，他们这种反对共产党的批评，仍然被看作是反革命的行为，他们遭到残酷的血腥镇压。

② 在共产主义的堡垒喀琅施塔得，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水兵因进行叛乱而被镇压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忠实支持者，但是，只因为他们希望共产党不要独裁，要求实行苏维埃自由选举而被镇压了。

当叛乱被肃清的前夕，这些叛乱者们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呼吁，其中说：“十二天来，一部分真正的英雄们——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被迫同全世界隔绝，忍受着共产主义刽子手们的攻击。我们坚定地捍卫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使人民从一个党的狂热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在临死前高呼：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愿全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事件的真相！同志们！我们需要你们道义上的援助，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引自R·诺卡/E·哥尔德曼：《布尔什维克主义》第102页。）

主义的控制。从苏联国内的抗议、叛乱和暴动直到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的工人起义，这些例子是不胜枚举的。的确，作为统治阶级的劳动人民，本应采取别的方法来解决对政府的不满，可是，人们迄今没有坦率地说明劳动人民为什么要反抗的真正原因。以喀琅施塔得为例，人们总是解释说，那只是由于小资产阶级作怪，以及他们对物质状况不满所致，与此同时，人们也从不忘记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外国资产阶级①。

但是，同喀琅施塔得的情况一样，工人们总是在演讲、宣言和传单中对官僚主义的强制命令表示绝望和无能为力，并同时明确地与资本主义及其代表保持距离。关于这一点，人们过去和现在都缄口不语。为什么外国的资产阶级和政治流亡者反而比可以直接同劳动人民接触的共产党员在工人群众中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按理说，一切混乱、困难和物资缺乏是可以通过采纳和满足劳动人民的要求而得到解决的，至少可以避免叛乱和暴动的发生。但是这种行动仍然发生了。原因就在于人民已经不相信共产党人的诺言，人民把大部分的共产党员看作是造成愚蠢错误、非法行为和侵犯人权的官僚。但是人们至今仍然拒绝承认这些指责的正确性②。当工人对生活在他们周围的共

---

①“于是这种小资产阶级力量就转化为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用愤激的言行来表达自己的要求。

现在在欧洲所有国家内都有白卫分子。在欧洲，俄国的亡命者共达七十万人。这就是逃跑了的资本家和大批不能同苏维埃政权妥协的职员。我们现在看不见第三种力量。它跑到外国去了。但是它还在生活着活动着。它同全世界资本家结成了联盟。这些资本家支持它，……既在财政上援助，也用其他方法援助，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国际联系。”（《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266页。）

②“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分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须的。党呢，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是领导者。

既然我们，党中央和全党，掌握着行政管理，就是说，管理着国家，我们就绝不会拒绝而且也不能拒绝实行‘整制’，即拒绝采用撤职、任命、开除等等办法。”（《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第88、89页。）

产党干部的行动和态度感到不满时，人们往往就给这些工人扣帽子，说他们的这种态度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尤其是拒绝工人提出的民主选举的要求，理由是：一旦选出的代表是非共产主义的，这就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们避而不谈他们的另一个担心，即害怕共产党的代表会在自由选举中落选，他们避而不谈这种恐惧的本身就已说明：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已官僚化，已不孚众望，因为他们是自上而下地任命的，没有经过真正的选举，他们脱离了人民群众，失掉了人民的信任。

共产党员应该研究、坚持和贯彻劳动人民的利益，然而，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议论，即认为这些只不过是纯粹抽象的宣传而已，这里并没有任何保障，足以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因为这种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实现，即：一定社会集团的代表在每项政治行动中都始终得到本社会集团的信任，向本社会集团负责，并有可能被罢免。只有当各社会集团真正有可能从各种不同的候选人中选择其代表，他们真正有可能建立自己的独自组织，以及根本不存在拥有特殊垄断手段从而能片面操纵代表选举的政治组织时，人们才有可能选出真正体现各个社会集团和一定人民阶层意志的代表。

凡是不存在上述机制和组织保证的地方，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制，即民主制度。如果不具备这种民主条件，那么即使极力引用“科学的认识”，也是难以保证通过政治组织持续地代表迅速变化的和具体的人民利益。相反，现存的政治组织迟早也会脱离人民，走向特权化，并最终转化为一种本身就是被指派的统治阶层。

下面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民主的基本原则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党内也被取消了。正因为如此，**实际上不仅是一党专政，而且形成了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小集团”的专政**。罗莎·卢森堡曾根据俄国革命后的初步经验对这种非民主的专政进行了批

评。当时觉得这种批评有些过火，今天看来这个批评比当时显得更为切实中肯，因为当时她的批评只能以夸大的和不充分的材料为根据。罗莎·卢森堡当时是这样写的：

"毫无疑问，在全国的政治生活受到压抑的情况下，苏维埃的生活也必将日益瘫痪。如果没有普选，没有不受任何阻挠的出版、集会自由与言论自由，那么所有公共制度的生活便会衰亡，成为只是空有其表的生活，剩下的就只是官僚体制成为活动的要素，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摆脱的规律。公众生活将逐渐变得死气沉沉，仅仅由几十个精力充沛而且受无限的理想主义支配的党的领导人来统治，实际上是由他们中的十几个优秀的领导人来领导而已。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只是时尔被召去参加会议，只是为了给领导人的演说鼓掌，一致通过所提出的决议等等，其实这基本上是一个'小集团'的管理。虽然这是一个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即在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党统治意义上的专政……。"

接着，卢森堡又说：

"所谓自由仅仅是政府支持者的自由、仅仅是党员的自由——其数量可能很多——但这绝不是真正的自由。所谓自由，只能是经常地给予那些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以自由。"①

斯大林的上台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维埃制度的官僚主义、不民主和专制性更加严重了。但是把这个制度的消极面都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的专横，乃是谬论。相反，斯大林是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不民主的制度才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并在其后又滥用这个权力的。至于斯大林性格上的缺点，列宁在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虽然已对斯大林的不良

① 参阅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中的《俄国革命》。

性格发出了警告①。

列宁逝世后，许多党的领导人（例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虽在党内外都比斯大林更得人望，但是斯大林却成功地掌握了权力，并逐步地把所有那些危及其权力的党内领导人全部清洗掉。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作为党的总书记②的斯大林逐渐地控制了整个党的机关以及国家机关，使之受其随心所欲地驱使。当所有的领导职能由一个垄断性的党的机关所把持，而且所有干部能被党的机关所撤换时，这就必然会产生对这个机关的依附性（这在民主的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这时，谁若在干部方面控制这个党的机关，他就必然会成为整个政治体制中最强有力的人物③。

当托洛茨基及其他领导人察觉到这一情况时，已为时过晚了。虽然托洛茨基作为国防部长有很高的威信，并拥有不少的权力，但是比起党的总书记，他的政治地位还是很薄弱的。在同斯大林进行意识形态的较量中，托洛茨基以为通过到处作报告，就能够把党的

---

①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给党代表大会的信》第617、618页。）

② 党的总书记的权限，首先包括在党内的一切所谓组织活动的权限，监督党的机关的活动，为党的中央机构准备资料，因此，也对整个干部政策（人事政策）负责，即考察和分配干部，首先是配备党的机关中的所有干部。后来一切重要的国家领导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干部对策也属于他管理。因此，斯大林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对于这一发展，列宁曾发出过严重的警告。

③ "在国内，人们很少听到关于斯大林的事。在非苏维埃世界，人们根本不知道有斯大林的存在。但是，不到两年的功夫，他竟在党组织中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以致列宁（认为斯大林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同他断绝了'同志关系'。又过了两年之后，斯大林依靠党的机关，又把十月革命期间和苏维埃政府中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领导人托洛茨基排挤下来，使之处于一种尴尬的政治地位。"（L.·托洛茨基：《约·维·斯大林》。）

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可是掌握着党内外干部大权、对大部分国家领导干部的升降有决定权的人物,能够对人施加政治压力,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也敌不过这种压力。可惜托洛茨基认识到这点时已为时太晚。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国家和党的官僚化已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政治意见的交换和对峙逐渐消失,权力的集中乃至垄断已变成绝对化。斯大林在全党全国进行的个人权力之争、他一步步地加强起来的权力地位以及他把自己个人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利益等同起来的做法等等,都给苏联后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如上所述,形成这些问题的前提,一方面是由于这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的落后性,另一方面,也在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简单化,它的制订从一开始就是片面的和欠缺的。这一切都使得建立一个不民主的垄断化的个人政权变得更加容易了。

斯大林一开始就追求一个贪图功名的目标,即发展他自己的地位,并逐步地把所有的政敌和反对者驱逐掉。但在某些方面,斯大林是很难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其他重要人物相匹敌的,他没有列宁那样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能力,也没有托洛茨基的修辞学,同时并无布哈林的那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雄厚基础和群众爱戴。他的强处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无忌惮地利用所有其他人的能力,懂得利用这个人反对另一个人,最后打败所有的人。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典型的党的机关的代表,他通过党的机关掌握其他政治领导人的必要情报,并借助于党的机关把党内的一切事情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根据列宁在其第一次脑溢血发作后的提议,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三巨头的政治领导,负责党的领导工作。不久,斯大林在三人中成为最有实力的人①。斯大林为了把自己装扮

①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谁掌握了党的机关,并通过它掌握了干部政策,他就会从所谓的集体领导中突出出来,成为真正的领导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诺沃提尼和乌布里希等人就是如此。

成是列宁的始终如一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于是有意识地在列宁还在世时就大搞起对列宁的个人崇拜来了。尽管当时他不参与同列宁的争论，而是不断地到处引用列宁的话。在这方面他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语录，排除别的思想，从而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他自己的政治目的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把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固定化，把正在出现的一切观点和思想都经院式地与这种概念化的“教条”相对峙，把所有他不同意的意见都当作“反马克思主义”或“反列宁主义”而予以镇压，这些都是由斯大林带到党内来的典型特征。斯大林总是以维护“列宁的党”的统一和纯洁的姿态而出现的，作为党的总书记，他懂得充分地利用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禁止派别活动条例这个最大武器来对付他的所有反对者。

斯大林作为党的机关的坚决拥护者，反对一切对党的机关的攻击和批评，从而也得到党的机关的可靠支持。在列宁逝世前不久，他巧妙地通过捍卫党的机关，针对托洛茨基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①] 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从而把自己显示作为未来的党的机关的最可信赖的代表。正当托洛茨基企图争取无党派人士，特别是争取青年的宠爱时，斯大林则首先笼络所有官僚化的干部和在党内感到地位不稳的人。因此，他赢得了党的机构的坚决支持。

斯大林在他的一生中都恪守上述这样一条路线的。在斯大林的同代人中了解其为人并书面地记下其特性的人们（列宁、托洛茨基和赫鲁晓夫等）不断地指出了他的无原则性以及不顾一切地追逐权力的表现。对斯大林来说，首要的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是遵循真正符合这种利益的政治形态的原则。他主观上大概坚信保持他个人的权力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而其他一切原

① “托洛茨基首先攻击党的机关。他们知道，没有巩固的党机关，党就不能生存和活动。反对派企图动摇、破坏这个机关，企图把党员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党内的青年同老干部对立起来。”（《联共〔布〕党史》中文版第 294 页。）

则都服从于这一点。只要符合这一权势目标，他将毫不犹豫地从某些政治原则中转换到与之完全对立的政治原则方面去，甚至不惜采用数年前他曾激烈与之斗争过的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观点和理论。但是，在一件事情上他却是坚持不渝的：在他决定当前某个政治目标和强调某个论点时，一定要取得党的机关的支持。他也知道怎样在重要的政治机构中以及在反对其对手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取得必要的多数。

托洛茨基的被解职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首先努力除掉他的最危险的敌手托洛茨基。他首先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指责这个理论与"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列宁主义"理论不相容。当然，托洛茨基并不是要在俄国放弃共产主义的统治，而是要借助于它首先推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托洛茨基认为西欧的革命不发展，也会危及俄国的共产主义政权①。他的设想是，首先要在工业发达的西欧国家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以便使俄国能够取得经济上的援助。他认为没有这个援助，在经济和文化都落后的小资产阶级俄国，是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的。

这里不去探讨在西欧是否有发展这种革命的机会。而只不过

---

①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L·托洛茨基：《约·维·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第94页。）

指出托洛茨基的基本设想而已，他确信：在不违反绝大多数人民意愿的情况下，在没有优先发展的强大工业的情况下，单独靠少数职业革命家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此外，托洛茨基在社会主义体制和生产国有化问题上也有不少教条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国有化的生产可以在取消了市场关系的情况下由一个计划中心来计划和领导。他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才可能实现，而且他深信，俄国的经济只能从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获得必要的援助，如果没有这种援助，要在绝对贫困的俄国实现工业和农业的技术进步，只不过是幻想。

附带地说一下，列宁基本上也是这一观点。列宁尤其期望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德国发展起来。他甚至认为由他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对市场关系所作的战略退却，通过这种退却，可以在小农经济的俄国推进至今还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直至从外部、从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援助时，就可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合乎时代的农业。列宁只是担心在此期间资本主义性质的积累和生产会在苏联不可避免地得到发展①。

托洛茨基不仅期待来自外国的经济援助，而且也希望依靠本国的资金来强制推行俄国的工业化。当然他也看到了巨大困难。托洛茨基认为，如果只是从农业方面积累工业化的资金②，势必会遭到农民的抵抗，并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认为在有计划地

---

① "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摆脱这种处境。因此，只要能获得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中，从我们丰富的原料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这一切我们以后是可以用高利收回的。在一个空前破产的国家里，在一个遭到破产的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自然，由于这种帮助，资本是会向我们勒索百分之百的利息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 213 页。)

② "由于官僚机构进行独断专行的领导，不得不改变经济的机动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在消费方面有许多工业，即在农民的支援下建立起来的工业，比起生产来，它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永久性的基础的。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即无产阶级的命运，唯一取决于国营工业内部产生的剩余价值。"(L·托洛茨基：《关于工业的提纲》。)

促进俄国的工业化同时，还需要谋求扩大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此保障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继续生存下去。

斯大林蛊惑人心地解释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说他认为政权能否保住只取决于俄国以外的革命的发展。说他不相信俄国农民的革命潜力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及其能力。指责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说他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而是孟什维克的变种①。显然，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和贫农之间矛盾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但列宁的理论认为，应该实现"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并认为通过新经济政策而相应扩大了的市场关系和工业品供应的改善，从而将赢得农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拥护。

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斗争，是符合党机关的利益的，党的机关不仅希望托洛茨基（他是批评党的机关的政治家）在政治上遭到失败，而且认为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必然会扩大和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加强党的机关的领导作用。斯大林借助党的机关的力量，并宣称自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他又在党内隐瞒了列宁的最后几封信，即所谓列宁的遗嘱），从而巩固了他的地位，并在一九二四年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成功地从政治上把托洛茨基打倒。

---

①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反过来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能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了这一方面以外还需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克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第102、103页）。

这里应强调指出，托洛茨基本人也没有揭示出斯大林之所以能集中那么大的权力的根本原因。他虽然看到斯大林控制和利用党的机关,这是一个直接原因。但他未能回答,为什么党的机关能给它的领导人带来那样大的权力，这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限制领导人的权力。指出必须限制党的机关的权力和加强民选机构的作用,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所有政治实践都证明了，没有官僚机构的政党是不能维持下去。因为准备各种提案、资料和监督干部等耗费大量时间的工作,不可能由普通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来处理。现实强迫人们必须建立机关。如果要把"苏维埃制度"维持下去,而又没有建立具体的体系机制,没有在制度上保证权力不致于集中到机关,那么，这只能是理论上的愿望。

托洛茨基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当全部政治权力集中到唯一的政党手中时，人民能否有真正的政治生活和发挥必要的创造性？托洛茨基并不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更讲民主。他更加简陋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解释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①。他比其他人更为明确地主张农民不参加政治活动和不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机构。他说社会主义必然是劳动人民中的少数人战胜了多数的结果。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意志是决定性的,必要时甚至可以用暴力反对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加以贯彻。这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危险,即公开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却不能保证它不会从一个阶级的意志转化为一个集团的意志。

此外,托洛茨基的工业化理论是无视人们的基本经济利益的。准确的和详细的国家计划经济理论，最早是由最能干的托派理论

---

① "俄国资产阶级把一切革命的地位让给无产阶级。他们不得不让无产阶级掌握对农民的领导权。执政的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来说,是作为解放了的阶级而出现的。"(L·托洛茨基:《约·维·斯大林》1952年科隆坡版。)

家之一，经济专家E·A·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这个理论虽然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偏向没有被斯大林所赞许，但是，这个理论的基本点在后来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还是得到了贯彻。不过它从未公开被承认而已。具体说来，涉及以下几个观点（下面我还要再详谈）：1．通过牺牲农民来完成工业化的积累；2．有计划地确定一种不利于农业的价格并把它说成是一种附加税；3．把社会主义的计划性解释为是价值规律的对立面；4．把迅速扩大重工业和军事力量作为工业化的目标；5．在工业内部废除市场关系，在农业中实行有计划地控制市场关系，等等。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们的经济积极性和经济利益，把经济当作军队似的加以组织，似乎只要有一个万能的中央经济计划部门，依靠计划指标以及对财政和价格的控制就能实现一切，根本不必考虑劳动人民会对此持什么消极态度。显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个理论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劳动人民完全可以按照国家的需要来加以指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根本不考虑等价交换原则（价值规律），他认为这一原则早在垄断资本主义出现时期就已被埋葬了①。但是，这是较为肤浅的结论。它无视在资本主义后期事实上仍存在着的市场职能。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通过这个理论为后来随心所欲的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提供了论据，并在这个计划经济中完全抹煞了市场职能的重要性。

最初，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中还利用了布哈林所提出的市场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布哈林阐明了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遵循价值规律以及实行等价交换原则的必要性。当时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方案的斗争，对斯大林也是一个支持。尤其是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的斗争也为斯大林所利用。但是，在二三年以后，斯大林又反过来借助于基本上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业化理论的论据

① 参照E·A·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

打倒了布哈林。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被排斥

在清洗布哈林以前，必须剥夺两位早就反对扩大党的机关的领导人物的权力，这两人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早在一九二五年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前，便开始同他们两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展开了论战。他们曾公开说：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当时，也正是斯大林开始加速建设重工业的时候。

虽然前一段的发展未能保证使国家有充分的积累（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没有获得应有的提高，官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误），但是斯大林还是决定加速工业化。他举出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国家正威胁要进行军事干涉。然而重工业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建设，只有在动用巨额的剩余价值，在进一步扩大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此外，要做到这一切，行政机构必然要扩大，官僚化必然会进一步发展，但这一切斯大林都置之不理，相反，他却依靠这些机构来推行他的计划。

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这个决定正确与否表示怀疑时，他们就被宣布为反对发展社会主义的敌人。但不久前，季诺维也夫曾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化方案。但是当时斯大林只不过是为了驱逐托洛茨基，才与这个工业化倾向进行斗争罢了。事隔不过两年，虽然经济条件也还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斯大林又开始为他的工业化而斗争了。当季诺维也夫提醒斯大林，说他过去也曾认为没有外国的援助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时，斯大林再次强辞夺理，反攻季诺维也夫，并指责他缺乏对苏联力量的信任。

斯大林提出，必须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一国能取得社会

主义最终胜利"这两种说法区别开来，他认为苏联的确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强大的工业。但是，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终胜利[①]。在一九二五年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的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形成了。他们要求对工业化的速度持慎重态度，同时，要求对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大农——富农）施加压力。索柯里尼柯夫的反对派方案[②]，建议优先恢复生活资料的工业生产，加速积累资金，接着，才能使生产资料工业得到可靠的发展。同时他们主张，对资本主义成分加重税收，这样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会招致后来（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的）这样难以置信的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就不会造成对苏联自然资源的严重掠夺。

显而易见，官僚机关力图加速军事力量的建设，他们完全无视人民对生活的要求和所处的生活状态。随着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停滞不前，斯大林和官僚主义的权力机关就更加极力强调自己的权势利益，从而更加忽视了国内外"劳动人民"这个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只能在大多数劳动人民关心和自觉的支持下才能获得发展。这一基本思

① "就是表明季诺维也夫并不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最后胜利了解为有免除武装干涉和免除复辟的保障，而了解为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季诺维也夫则把它了解为不能够而且不应当使社会主义建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碰碰运气，茫无前途的建设，在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季诺维也夫的立场。"（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文版，《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第161页。）

② "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原料和粮食用以向国外出口，而从国外进口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也不应生产的机器。在一九二五年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分明是让工业发达的外国在经济上奴役苏联，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贪欲而使苏联工业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参照《联共〔布〕党史》中文版，《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第305页。）

想与官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按理，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对本国的其次是对外国的劳动群众有吸引力，官僚们抛弃了这一思想，并简单化地认为国家政权只要依靠警察和军事手段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真正得到了改善，而这一点又最迅速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所认识，那么，这就可能成为有效的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基础。但这不是官僚们的典型思想。官僚们倾向于认为，要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以及在本国强大起来，首先应加强和巩固本国政权机关和军事力量。

因此，从一开始，占主导地位的就不是改善劳动人民的经济政治地位，而是斯大林及其官僚化机关的权势利益。斯大林对个人权力的追求以及官僚们的肆无忌惮的权势欲，都必然导致对斯大林敌手提出的一切建议全部断然拒绝的结果。与这一逻辑相一致的是：凡是斯大林的敌手，也就是党的机关的多数派的敌人，因此，他们都必然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从同一理由出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同伙，不仅被描绘为遭到拒绝的错误经济建议的代表，而且很快就被宣判为"党的敌人"、"资本家的代理人"并加以消灭①。对斯大林来说，这是唯一的发展道路，别无其他可能。

斯大林通过这样巧妙的政治策略，逐步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不断发展其机关、扩大其权力机构以及排斥反对派的过程中，他有目的地朝着建立权威性国家垄断体制的方向发展。为此，

---

① "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大会痛斥了季诺维也夫派的经济'计划'，指出它是奴役苏联的计划。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新反对派'的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实质。他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是重弹列宁当初无情批驳过的、党的敌人的滥调。"（《联共〔布〕党史》中文版，第305、306页。）

他不顾一切地建立这一体制所要求的工业基础，但是粗放性的发展生产，首先是为建立强大军事力量服务的。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群众的经济状况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恶化了；工农不是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而是增强了对官僚体制的反抗；这种社会体制不仅不能吸引外国工人阶级，反而使社会主义理想的信誉遭到破坏，但这些斯大林都毫不在乎。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国家垄断主义"的形式而已，他从一开始就坚信：不管在苏联或是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只有依靠政治和行政权力才能实现。

虽然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寸步不让，但实际上他却把托派的工业化理论付诸于实践。例如迅速增加投资、扩大投资品的生产和限制消费品的生产等，而这些都是通过压缩人民的消费来保证的，是通过减少对农村的消费品供应或以较少的消费品来抵偿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就是降低工资）来保证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理论上为这条道路提供了论据。认为它从长远观点看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①。斯大林虽然把托洛茨基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清洗了，但是他又毫不犹豫地利用了他们的理论，尽管他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议中从来不承认这一点。

这种强制推行工业化的政策造成了可怕的通货膨胀，工业产品的价格虽然通过行政方式被压制了（一九二三年还降低了价格），但农产品价格却开始不断地上涨。尽管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了，一九二七年中农的平均收入仍比城市工人的收入低。由于在通货膨胀中农民用贬值了的钱只能买到少量的工业产品，初期随着新经济政策而开始的那种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也下降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苏联领导机构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而决定用行政措施降低粮食收购价格，同时提高税收，以增加经济压力，但这却导致农民拒绝销售农产品的现象。这时，斯大林决定用行政措施打

①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第195页。——译注。

破农民的抵制。

从新经济政策后退

实行行政措施，就意味着从新经济政策的方法、从城乡市场关系倒退到利用行政手段向农民强制征购农产品。虽然这一方法被称之为非常措施，但实际上它后来却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摊派生产义务和交售义务的永久性计划制度了。依靠命令进行高征购，事实上就是取消农产品的自由买卖。只要农民企图在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一部分农产品时，他们的交售义务就跟着提高。因此，农民对生产和市场的兴趣迅速消失。

强制交售降低了农村的消费。同时，在城市里发行了食物票证。在压缩一般的消费的同时，国家提高了向外出口粮食的数量，借此获得加速工业化所必需的外汇。

这种有争议的、依靠命令来实行农业生产和强制交售的计划体制，虽然符合官僚机构的利益及其工作方法，但是，在成百万分散的小农私有制基础上实行这种农业计划体制，是困难的。由于人们把这种生产的计划和分配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而同时又不得不把市场关系看作是对私有者的必要的妥协，因此，斯大林不得不时而这么说，时而又那么做出决定。这种通过加速工业化和实行国家粮食征购向“社会主义”农业计划化的过渡，被解释为必须以迅速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基础。这就为立即实行强制性集体化发出了信号。几年前，人们还不断说要在农民实现进步的机械化基础上根据自愿原则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但后来却突然开始强调小农已作好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准备，而机械化的问题却根本不提了。他们说，只有资本主义的富农才反对实行集体化。因此，必须一方面清算富农，一方面实现集体化。实际上，不是向中

小农民提供允诺的农业机械化和拖拉机[①]，而是用富农的牲口、农具、土地及他们的财产，来引诱中小农民向集体农庄过渡。

大量屠杀牲口[②]，烧毁和破坏庄园，绝望的反叛，再加上对叛乱的毫不留情的血腥镇压，这就是"社会主义化"的结果。最富有经营能力的农民（包括一部分中农）不仅在经济上，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了，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强制进行的集体化，通过一切残忍的镇压手段，在最短期间内便完成了[③]。在一九三〇年中期，百分之五十五的农村实现了集体化，到一九三四年，集体化已达百分之九十三。不仅是富农，甚至连某些中小农民（虽然没有剥削他人），也作为独立的小生产者阶级被强制清算了。

国家给集体农庄规定了超额的征购义务，而且这个征购又是靠政府压低征购价格进行的。这意味着有意识地通过课税剥削农民。斯大林公开承认，在工业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间人为地制造的差额就是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但是斯大林却说，这是为工业化服务的[④]。国家根据计划向集体农庄大量征购农产品，同时压低收购价格，价格之低，按赫鲁晓夫的说法，低到使农民赔

---

① 根据莫斯科国立经济研究所的资料，一九二八年，在三分之二的集体农庄中，一台拖拉机也没有。

② 仅在一九二九年底集体化的第一个阶段中，就有一百一十万匹马被杀，而截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止，更有三百万匹马被屠杀。从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三三年之间，牛的总头数减少了一半，羊和山羊的头数也减至三分之二。一九三三年，家畜总头数比一九二二年的饥馑时期还少。

③ "由于管理上的错误和对农民的干涉，因此，仅从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三〇年冬止，集体化已不是按真正的自由意志原则进行了。……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开始出现了管理上造成的事件，同时违反了自由意志的原则和建立对农民的刑罚制度。"（N·J·诺缅柯夫：《共产党》。）

"在这方面，我国农民的情况是这样，他们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第139页。）

④ 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第139页。）——译注。

本①。这就导致农民难以置信的贫穷化，在农村出现了饥荒，农民的抵抗和叛乱不断发生。但农民的所有这些绝望的行动，总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政府强制农民留在集体农庄。如果逃亡往往要处以重刑。笼罩全国的是流放制度和难以想象地限制人们起码的行动自由的旅行制度。这事实上是意味着恢复到了列宁曾亲自谴责过的那种强制劳动。

这事实上就是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后退，首先是放弃一再宣称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的政策，转而实行由国家对农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政策。但斯大林从不承认这些，却伪善地强调说，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布哈林批评这种作为工业化基础的、对农民采取行政措施和剥削农民的做法，斯大林则就布哈林的这一批评大做文章，目的仅仅是为了从政治上排除他的最后一个重要敌手。

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曾在反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斗争中支持了斯大林，并赞成把他们开除出党②。但布哈林始终反对的是托洛茨基关于牺牲农民的工业化理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布哈林写了许多反对托洛茨基有关农业经济政策的论文，这些文章实际上也是对斯大林政策的批评。他认为这种政策是"对农民进行军事的封建的剥削"。他并且说，这个政策必将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布哈林尤其反对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反对将会破坏工农

---

① 赫鲁晓夫列举了如下例子：虽然在这期间的猪肉成本，一百公斤从二六点五一卢布到三七点六〇卢布之间，但一九五二年国家平均收购价格只不过四点七二卢布。(《消息报》1964年3月7日。)

② 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有下列一些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科夫斯基、皮达可夫、谢烈布利雅柯夫、斯米尔诺夫、加米涅夫、萨尔基斯、萨发罗夫、里弗施茨、穆吉万、斯米尔加、萨普龙诺夫、弗·斯米尔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多罗布尼斯及其他人。(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载于《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

业之间市场平衡的过快的工业化。他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强调指出：只有在协调下，在工业的发展以农业的迅速增长为基础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高速度，不仅是一时的，而且是持久的高速度①。这个设想就是：农业生产的提高与工业生产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农业合作社必须在集体大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

布哈林的理论是从这样的根本观点出发的，即：社会主义生产不能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和超经济的强迫和压制来推进，而应靠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越性（与私有制生产相比）来取胜。布哈林认为只有通过市场和竞争，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制造出来的现代化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魅力，才能使农民相信合作社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布哈林在一九二五年曾引用路·埃·米泽斯讲的一段话："既然共产党人想根据命令和用棍棒来指导生产，那么他们的政策必将遭到而且现在已经遭到挫折。"②

但是布哈林在这个场合，也反对米泽斯关于市场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意见。他认为不能在违背劳动人民的意志的情况下使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当他们的利益得到实现，靠更富于生产性的集体生产劳动使劳动负担得到减轻，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时，才能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他要求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首先应克服强制性的和独裁的做法③。

---

① 参阅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载于《真理报》1928 年 9 月 30 日。）——译注。

② 路·埃·米泽斯（1888——？），经济学家，生于奥地利。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米泽斯是攻击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政策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在大量荒谬和愚蠢的言论中，说出了某些不愚蠢的和相对正确的东西。——译注。

③ "在当前的阶级统治中，有必要改变统治的形式和方法。……因为适应被包围的经济、征购、租税和内战而建立的专政形式，并不适合新经济政策已经长期而认真地考虑过的新时代；而正好是背道而驰。"（布哈林：《发展经济和工农联盟的任务》，载于《布尔什维克》1924 年 11 月 5 日。）

但是布哈林的政治观点和对国家的强制性政策、严重的官僚化、特别是对权力高度集中到党的机构中去的做法所进行的批评，对斯大林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因而也是危险的。无论是通过社会生产的竞争，逐渐克服私有制生产的理论，还是把逐步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看作重工业的积累来源的理论①，以及逐步使国家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见解，都是斯大林所不能接受的。

凡是不赞成他的"社会主义的设想"的人都是敌人，这种极其简单化的"敌友论"乃是斯大林的典型的教条主义见解，因而批判他的行动，必然遭到毫不留情的清洗，因为触及到他个人权势利益。从这种观点和立场出发，他只能得出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布哈林及其支持者都必须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朋友"而加以批判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布哈林被逐出了政治局。从此，斯大林清除了他的最后一位政敌和最大的批评者。

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政策

布哈林关于充分利用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市场关系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在充分利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社会

① 如果工业可以增加消费资料和农业机械的供应，同时也活跃和刺激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如果农业可以增加生活资料和原料的供应以发展工业生产的话，那么，工业就可以逐渐取得经济均衡的发展，尤其对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L·舍宁根据布哈林所讲的意义完成了这个理论。如果这样地发展的话，也就不可能剥削人民和带来生活的贫困化，从而逐渐扩大对重工业的投资手段。（L·舍宁的文章：《我国物质缺乏的经济体质》，原载《蔬菜经济》1924年11月号。）

② "为了使自已能在理论上站住脚，他们炮制了可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愈多，阶级斗争就越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不经反抗就会让出自已的一切阵地；因此用不着对富农实行进攻。这样，他们就恢复了他们所谓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陈腐的资产阶级理论，践踏了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即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而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以后才会'熄灭'。"（《联共〔布〕党史》中文版，第323、324页。）

主义生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越性(与私有制生产相比)将会逐步得到体现。但是,布哈林的这一理论在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是不现实的。在那个时代,布哈林的理论也必然是片面的,妥协的,它没有触及关于在工业中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中的计划管理的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更没有触及依靠共产党垄断化的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当然这并不能理解为是对布哈林的批评,因为他已由于提出了这些理论而被作为"投降资本主义的叛徒"受到了批判。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可以理解的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使得布哈林的观点显得不如斯大林的论点那样有力。

发展工业生产,不可能象逐步取消私有制那样通过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来实行。在严重的浪费和生产效率低的情况下,必要的积累是很难迅速实现的。缓慢的工业发展也不可能给农业生产以充分的刺激。对各个独立的企业来说,没有必要的市场压力和市场刺激,也就不可能促使它们灵活地提供工业产品,尤其是提供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而这正是农民自愿走向具有技术魅力的合作社大生产的前提。没有这些条件,在农业方面就必然会发生一般的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富农越来越富,小农越来越穷。

即使布哈林等理论家得出了必要的结论,认识到在工业部门应充分利用市场,以及必须使工业企业享有它的独立性,但这样的发展对官僚机构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危险的、敌对的。因为这种发展在本质上是反对官僚主义的。这种发展的结果必将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实行民主化。对官僚机关刚刚开始进行的一点指责,很快就使布哈林成为官僚机关和斯大林的永不能忘的敌人①。

---

① 在列宁最初脑溢血发作后的一九二三年九月,已有数名政治家在基斯洛夫斯克集会。这是为反对扩大斯大林和党组织的权力而举行的。在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计划采取措施以便限制官僚的权力。这个计划没有成功。虽然这个计划失败了,但是无论党组织还是斯大林都没有忘记这次集会。所有当时的参加者后来都被斯大林秘密地枪决了。

但是，布哈林在制定他的理论和提出批评时还没有充分地看到官僚政权将造成何等严重的反社会的恶果，以及斯大林的政策和行为是官僚体制的必然反映。他没有觉察到在一党制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堕落为党的机关的专政和唯一得到官僚机关支持的执政者的个人专政。

这种彻底官僚化的工业根本不能在经济竞赛中战胜乃至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当国家不能通过商品的自由交换和充分地调配粮食时，官僚主义者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就是：排除市场关系和消灭富农。当国家无法为现代化的集体生产提供足够的机械和新技术时，当人们在没有市场关系的条件下单靠强制办法已无法监督数百万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无法搞到必要的粮食时，官僚主义者的通常反应也就是强迫农民迅速地集体化。同样，由于农民和饥饿的群众对这种强制集体化不是毫无抵抗的。因此，官僚主义者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不断扩大和加强权力机关，人们并以所谓资产阶级被彻底消灭后阶级斗争仍在加剧的理论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

在这种情况下，谁若反对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状态或是反社会的政策，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提出本质上与此不同的工业化模式以及批评官僚主义的行政措施时，那么，这些人就必然会被宣布为阶级敌人而受到清洗。因此，布哈林被宣布为“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和富农的保护者”，并由于他进行了所谓反抗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活动而被判了罪。过去，斯大林批评托洛茨基把小农说成是小资产阶级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从而不去争取他们，而是把他们置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但今天斯大林却把同一思想付诸于实践。布哈林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理论，因此他后来也反对这种实践。斯大林则掀起了难以置信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反对布哈林。斯大林曾指责托洛茨基过低估计了“小农的革命性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这次他又责怪布哈林看不见“农民走向资本主义的倾

向”。

布哈林的批评是最高领导成员对斯大林提出的最后一次公开批评。布哈林垮台以后，虽然达到了所谓党的统一，但这个统一实际上只不过是按斯大林个人意志行事的统一。从那时起，斯大林变成了独裁者。在党的形式上的最高机关中，他实际上为一批应声虫所包围。谁若发表略带一点批评的意见，就会被看作是一种敌意的表现①。

某些精心安排的怠工案件的审判（例如对顿涅茨煤矿区工人的审判），被用来作为一种证据，说明阶级敌人在进行有害的敌对活动，从而也说明阶级斗争在加剧。随着这种对敌人及其怠工活动的揭露，似乎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就可以从物资供应严重缺乏这一真正的原因上引开，使他们的愤怒转向斯大林提出的“人民公敌”方面去②。

在一九三四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了没有骨气的自我批评。这是一种绝望的尝试，他们不仅希望留在党内，而且还想能够继续在党内同斯大林的专制展开斗争。斯大林害怕这些有头脑的有经验的政治家，不愿再象从前那样给予他们以政治活动的机会，他以极

---

① “斯大林不是说服、解释和对人不厌其烦地进行工作，而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原则，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这种做法的人，或是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构，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许许多多的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

② “斯大林采用了‘人民公敌’这个概念。这个名辞可以使你与之争辩的那个人毫无可能来证明他是犯了思想上的错误，凡是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意见的人，或者只是被怀疑有敌对打算的人，或者只是受到污蔑的人，都可以加上这个罪名对他横加镇压，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人民公敌’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和就某些问题，哪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证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经过后来的检查弄清楚了，是被告施行肉刑而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制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

其凶恶的攻击来回答他们的这一行动，这便是难以想象的在全国实行大规模恐怖主义的信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斯大林险恶地让人暗杀了基洛夫。虽然基洛夫是完全服从斯大林的，但由于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日益增高，这使斯大林大为不快，甚至感到危险。

基洛夫被暗杀后，斯大林公开宣布这是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及其他人制造的阴谋，这就成为完全编造的首次公开审判的借口①。斯大林用拷问、威胁和捏造出来的"证据"强迫他们承认，这些供词在宣传运动中被大量引用，从而在人民群众中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出现了一个里通外国的反苏大阴谋②。这种被证明是可靠的方法后来也被其他共产党国家所采用，成为这种体制所具有的典型特征。

斯大林在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恐怖浪潮。数十万以上无辜的人们成了牺牲品③。从此以后，迫害活动难以胜数，告密、特

---

①"一年后知道，杀害基洛夫的真正的、直接的、实际的组织者和准备杀害其他中央委员的组织者，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皮克里、伊·恩·斯米尔诺夫、穆拉契科夫斯基、帖尔瓦加年、勒因哥里德等被交付法庭审判。这些当场被捕获的罪犯，不得不在法庭上当众承认，他们不仅组织了杀害基洛夫的事件，而且还作了准备要杀害党和政府的其他一切领导人。"(《联共〔布〕党史》中文版第360页。)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说，这个暗杀不仅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进行的，而且后来凡是了解这一暗杀背景的活动家也被全部枪杀了，这件事做得不留痕迹。赫鲁晓夫说："在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被撤职，并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一九三七年却又被枪决了。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

②"犹太托洛茨基是这一大帮凶手和特务的主要指使人和组织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托洛茨基的仆从，是托洛茨基的帮手和反革命指令的执行者。他们进行着使苏联在受到帝国主义者侵犯时遭到失败的准备工作，他们是主张工农国家失败的失败主义者，他们是德日法西斯分子的可恶奴仆和走狗。"(《联共〔布〕党史》中文版第360页。)

③"在S·H·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的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叶奴基杰签署了下列决定：1. 侦察机关——要对准备并进行恐怖行为的被告的案件加速审理。

2. 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迟缓执行最高处分的判决，因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审理类似的申请。

3.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

务活动和公安机关的狂暴行为，已成为令人窒息的日常现象了。斯大林建立了这样一个以恐怖和使劳动人民不安为特点的体制，它被称为“共产主义”，而实际上是“无人性的”、“残忍的”和“不公正的”同义语。

但是，如果斯大林不能在这个变化万端中更好地体现和贯彻党的机关的利益，那么他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权力，也不可能长期地利用残酷的手段行使这个权力。斯大林的突然转变，巧妙地背离他曾作为党的政策原则而提出的政治要求，转换到仅在数年前还当作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与之斗争的政治路线上去，联合某些政治家反对另外一些政治家，并以过去曾共同反对过的论点来清算当年的同盟者，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帮助斯大林发展他的权力，是因为它始终符合党机关的利益。

初期，坚决捍卫新经济政策的原则，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以及反对托洛茨基剥削小农的工业化理论的斗争，是符合党机关的当初利益的。当这个机关还比较弱小，如果没有广大人民阶层的自由意志的支持就不能存在时，那种会引起农民强烈反抗的工业化就不符合党机关的利益。因此，托洛茨基的关于依靠从农业中积累资金的工业化建议当然是不可能获胜的。

反对权力下放，反对借助职工委员会等实行工业企业的自治，以及有意识地发展高度集中为目的的工业管理组织，这些也都同时是党的机关的占统治地位的利益。斯大林懂得最坚定地体现和维护党的官僚体制的这种内在矛盾的利益地位。

当官僚们看到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已难以指望，他们的生存开始有丧失的可能时，斯大林针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向他们提出了“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给他们以生存的保证。这再次表明，斯大林是较好的、能理解官僚心情的心理学家。

二十年代末期，由于农民的抵抗，城市的供应受到严重威胁，

布哈林要求扩大市场机构，排除工业企业管理中的官僚化，以便使企业生产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符合市场的需要。这一切对官僚机构来说是最大的威胁。斯大林不惜一切地维护和扩大官僚机构的权力，甚至抛开了一切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并开始实行强制性的集体化。但由于集体化缺乏思想准备和任何物质准备，所以它只不过是创造了一定条件，以便官僚机构对农业生产实行领导和控制，用警察的办法强制征购农产品，更加严重地剥削农民，从而进一步为工业化加速筹集资金以及扩大官僚主义的行政与镇压机构。当党的机构强大到足以能镇压各种反抗，并从镇压中不断地加强自己时，布哈林等所竭力反对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业化措施便被付诸实施了，这种镇压政策，也就成为党的机关加强其本身权力的前提。当时托洛茨基已在政治上被清洗了。这时，作为反对官僚制的最危险的人物布哈林也被排除了。

由斯大林创立而又受其保护的党的机关，在一切严重关头都坚定地支持了斯大林，并尽力美化和颂扬了斯大林。党的机构制造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为借助于个人的个人崇拜，可以毫不费劲地清除官僚主义集权主义的一切敌人。

虽然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排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这也是符合党机关的利益的。因为在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中，把社会主义概念与斯大林这个人物同等起来，有可能成为现存制度的严重危险。“领袖”逝世以后，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心甘情愿地忍饥受饿以及对贫困、物资缺乏和经济损失不加批评地予以忍受的精神必然会减弱。此外，曾受过斯大林迫害但却幸存下来的人们和无数牺牲者的亲友们，对现存的、已不再受斯大林这个人物所保护的制度来说，变成了巨大的危险。党的机关的新的代理人为了使党及其制度逃避各种批评，不得不毁坏斯大林的形象。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把斯大林个人性格和行为与“社会主义理想”分割开，他对斯大林全部罪行的宣判所起的

作用，就是先发制人，使斯大林反对者无法对党的机关进行批判。赫鲁晓夫是党的机关中这样一部分人的代表，他们与斯大林的犯罪活动无直接关系，因而能够公开指责这些活动。他自称是斯大林主义的一切牺牲者的辩护人，但他首先是党的官僚体制的拯救者。即使迅速清洗了贝利亚，也是为了党的机关的利益。因为国家公安机关的这个人物如果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就会危及许多的官僚的地位，将使国家公安机关凌驾于整个政权体制之上，党的机关的权力地位也就必然受到威胁。

批判个人崇拜的目的，就是把人民群众中存在的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从其真正的根源，即官僚主义体制下引开，引向一个次要的方面，即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特点上去。正如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官僚体制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本质至今仍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即是说，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尽管揭露和宣判了罪恶的恐怖的斯大林主义，但是人们只不过改变了一点镇压的**方式**而已。在列宁时期就开始实行并在斯大林时期进一步发展的、最带有实质意义的、纵容了斯大林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体制的原则，并没有受到赫鲁晓夫的批判，相反，还得到了维护。

下面关于共产主义体制普遍特征的分析将表明，这些特征在批判斯大林以后并没有消除；它们早在斯大林篡夺了权力以前就以萌芽状态存在了，它们是片面地、被简单化了的错误的、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被歪曲了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三、共产主义官僚体制的实质

干部的个人权势利益

当人们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干部官僚化和追求权势利益时，许多共产党(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共产党)的普通党员和一部分左派革命青年，马上就会表示不相信这些说法。这些人们大都是在感情上同情和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正直的、不为资产阶级权势所腐蚀的人，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经常能勇于承受严重的迫害。正因为如此，人们不相信共产党干部在取得政权后会改变他们的这种纯洁性。

在一段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党员"们也持这种观点。但是今天比起掌权以前，人们形成这种看法的直接经历更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普通党员与高级干部的直接个人接触日益减少。大部分人对于干部的看法是在宣传的影响下形成的，而宣传可以把党员，以至把广大群众对领导人的信任和敬佩发展为对英雄的个人崇拜。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要靠宣传来美化领导人呢？为什么这些领导人在革命以后就不能始终如一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呢？人们最常听到的指责是，他们应当把维护人民的利益看作是切身利益。在西方，许多人倾向于承认"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和缺点，他们无法否认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存在，但他们却不承认这一切都应由领导人负责。相反，他们还指出，领导人也不断对这些缺点进行了批评和斗争。

但是仔细推敲，就觉得这种假设和论证是互相矛盾的。我们必

须对这个问题作更加确切的说明。第一个问题是，在经济及其他社会活动都处于中央集权的领导下，究竟有无可能协调地、高效率地和卓有成效地发展经济？我在《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论述》一书中已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了，为什么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体制不可能正确地发挥作用，以及为什么它在效率上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人们继续保持这个制度的话，即使最有才干和最有品德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克服这个体制带来的实质性的缺点和矛盾。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体制下的领导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制度中存在的实质性的矛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打算和能够改变这样的体制呢？这里姑且不去谈论那些领导人在掌权以前究竟具有何种动机、品德和能力。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某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被群众理想化了，或者在群众中理想化了。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存在着品德高尚和品质平庸的人，有真诚的战士，也有机会主义者，有把群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但也有仅仅利用群众利益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掩体。无疑，在革命前后或者掌权前后，领导人的品德都会给运动带来影响，影响最大的领导人，如果利己主义和权欲之心越大，他对运动的影响就越消极。

尽管斯大林的品格对革命后的党以及对整个苏联社会体制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但也不应对这个影响估计过大。今日的掌权者及其理论家们，都愿意把过去一切消极现象归咎于斯大林，把所谓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看作是一切严重滥用职权的原因，这并非偶然。尽管斯大林有其独特的不良性格，但是实际上在共产主义体制中所有领导人的身上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因此，它也不是某种偶然的品格上的缺点所造成的。

共产主义制度的领导人都是与党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都毫不怀疑地认为：新国家的所有重要职务必须由党员来担任，只有这样，党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只有党员，而且只有“职业革命家”，亦即只有党的机关，才能确定：谁维护

社会主义，谁反对社会主义；什么有利于社会主义，什么不利于社会主义。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建筑在这样一个信念上的，即共产主义优秀分子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在实践中确立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任何一个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所必需遵循的离不开的护身符。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原则，致使过去和现在的领导人在揭发错误和缺点时都有一定的限度。

只要人们仍然坚持这些原则，那么共产主义体制就无法发挥其效能。所谓根本的改变，决不是意味着过渡到资本主义体制。相反，是创造能形成真正**社会主义**体制的条件。但是揭示这种从根本上改变体制的必要性，并不是那些随同党一起走上共产主义体制最高领导层，或者被党提拔起来的领导人的职能。由于领导人的领导作用属于这个体制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不能指望党的负责人会赞成那种将意味着取消“党的领导作用”的体制改革① 。这也正是一切共产党领导人之所以在“试图”着克服现有缺点时陷于进退两难境地的原因。

尽管共产党的领导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思想品德和动机，在他们中间有些人真正关心劳动人民的要求和利益，有些人只把人民的要求和利益作为个人追逐权力的借口，但是他们有一点始终是共同的：这些领导人的个人行动都始终受党的制约，更确切地说，受“职业革命家”，即受党的机关的制约。他们揭露、追求和贯彻的只能是那些不违背党机关的利益的事。当他们一旦违反党机关的利益而行动，那么，他们就会因此而不再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只能借助于社会其他方面的支持而追求某个社会目标。

这一问题的提出不是那个人主观臆造的，而是反映了某些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的困境，他们虽然时而提出各种试图解决问题的

① “所谓个人权力只不过是高度集权的表现，中央集权制把某一个人捧为领袖，但就其特性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某种势力的代表，是等级制度中的最高表现。”（A·卡尔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建议，但实际上都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当然，这种困境不会出现在斯大林、诺沃提尼、乌布里希和勃列日涅夫等人的身上，因为他们作为党的机关的最早的产物，从一开始就与之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系，他们只有借助于党机关才能维持其本身权力地位，所以那些完全有意识地在追求个人的权力的、只是在不违反其个人利益的范围内才代表人民的要求和利益的领导人，根本不可能揭露人民的利益与党的机关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就以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来说，即使他们作为党机构的产物后又发展到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并在人民中人为地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但是这些领导人都很清楚，他们的"威信"只不过是靠党机构制造出来的，如果没有党机构的支持，他们的"威信"就会丧失。

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有列宁和毛泽东那样的才干。甚至列宁的政敌和反对派都承认，列宁不是一个为追求个人权力的人。连党内最常同列宁展开激烈争论的托洛茨基在谈到列宁时也说："列宁对作为行动工具的权力估价非常高，但是为权力而争夺权力的事，却完全与他无缘。但斯大林不是这样。"

因此，不能把列宁说成是党的机关追求权欲的产物。虽然他本人在寻求实现劳动人民利益的条件和方法方面确实有错误、有简单化或有狂热的表现，但是不能把他说成是不正直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超越他所不可能超越的局限性。在取得政权后，列宁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有能力的理论家和社会分析家，对官僚体制和官僚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直到他临终之际还在认真地探索克服这个可怕的社会现象的方法和制度。据托洛茨基称，列宁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导致官僚化的原因应该在党的组织机关本身及其总书记身上寻找① 。但是，真正的原因他还没有揭示出来。只要共

① 据托洛茨基称，列宁在临终前决定通过严厉的公开的批评，促使人们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列宁的意图非常清楚。他抓住斯大林政策作为例子，要在全党面前揭露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变为官僚专政的危险。"（L·托洛茨基：《约·维·斯大林》1952年科隆版。）

产党干部占据了社会上最重要和最吸引人的职位，拥有垄断性的、不受劳动群众约束的权力，并能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那么，他们就必然会组成一个官僚阶层。这一点，连列宁也未能认识到。更确切地说，列宁是否真的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列宁在晚年对已经官僚化的党的干部所作的批评是非常激烈和经常的。但是，承认党干部的官僚化是由于不民主的一党制的必然结果，这就意味着否定了他毕生的事业，也就意味着脱离那些在他的帮助下才能获得特殊社会地位和政权的统治者们。这正说明他公开承认某些认识是受到制约的，克服那些他指责的弊端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

在列宁逝世以后，再没有一个共产党干部具有这样的政治立场和必要的分析能力，从而能越过党和党的机关直接地面向群众、号召群众起来改革体制，反对"党的领导作用"的原则了。这里耐人寻味的是尼·谢·赫鲁晓夫的一件很少为人注意的尝试。他虽然是党机构的一个典型代表，可是他在一九六二年竟把党的机关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独立部，并各自拥有其下属的部门和书记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党机关对人民所处的统治地位，但是采取这种方式有可能有利于使农业的需求和利益得到较独立的贯彻，而不利于过去的那种片面发展工业的做法。赫鲁晓夫这些做法（包括废除中央各部，以及准备下放计划部门的权力等——尽管这一切并不触动党的领导作用这一原则），是如此棘手和不协调，从而实际上对官僚机构来说是很大的危险。例如它危及集中统一的等级制，危及使党的机关难以顺利地贯彻其利益，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因此赫鲁晓夫最终失去党的支持而垮台，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不是说共产主义国家的党的领导人、党的首脑和党的总书记并不关心加强经济活动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主义体制的繁荣。但是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在他们的控制下进行上述活动，

如何维持他们的领导职能，如何防止一切可能危及他们个人权力的事情发生。虽然他们主观上经常认为关心个人的地位和关心社会是不矛盾的，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对立的。因为执政者的认识能力并不能始终与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相一致。相反，它总是从某个阶段起，与新的发展需要相对立。因为领导人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根据当时的需要选出来的，不一定符合**不同性质的后一阶段**的要求。因此，希望定期地撤换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首脑的这一民主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只有通过定期的换班，才能保证社会的最高领导始终由最有能力的、准备得最充分的和素养最好的人来担任。因为那些出色地完成了革命斗争任务的人们，不一定都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知识，同时也不一定对工业化阶段的任务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在后一阶段，在劳动力后备军已不复存在、效率问题已成为决定因素时，他们就不一定能正确理解新的任务和新的方法。但是，如果共产主义体制不允许实行这种领导人的自然换班制度，不允许各种政治家和政治集团自由和公开地发表不同意见、建议及与之有关的创议，那么，就必然要出现影响社会进步的障碍，并造成重大的社会损失。

比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期间出现的这些缺点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领导人在追逐一种权势利益，这种权势利益不允许实行任何可能威胁其权力地位的变革。只要这个社会还不能实行真正的选举，这些领导人就不可能按正常的方式受到社会的监督、批评以至撤换。**事实上**政治家对人民并不负责任，而是凌驾于人民之上，万人服从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借助官僚机构决定一切，决定什么意见允许提，什么东西可以出版，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应视为敌意的，等等。"社会"的利益已人格化了，即是说，首脑的利益也就是社会的利益。凡是不符合领导人个人的利益的见解和建议，都一概受到压制和消灭，而社会却没有可能对这些见解作出自己的判断，确定它是否比领导人的看法更为合适。

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只不过是一种限制一人独裁的措施，它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只要人民不可能进行真正选举、监督、批评以至撤换领导班子，这就只能意味着领导集团的利益高于人民的利益。尽管在现实中，领导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着隐蔽的权力斗争，权力不平衡、权力转移，以及最后又形成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拥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真正潜伏着的问题所在，即在最高领导干部的个人权力背后，隐藏着官僚主义的权力。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看上去似乎掌握着特殊的权力，并可以不断地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得到贯彻，但是在最高领导干部的权力和党的官僚机关的权力之间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前者虽然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实际上更大的权力从长远看却在于党的机关。只有当第一书记实行的政策或多或少地符合官僚机关的根本利益时，他才能取得个人的统治地位。如果他企图进行一次违反官僚利益的政治变革，那么他迟早就要失败。

官僚集团是一个实际上进行决策、领导和统治的阶层。没有它的支持，任何个人或领导班子都不能长期维持其领导地位。官僚集团是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利益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党的官僚掌握着实际的领导权。党的官僚为了统治人民，也需要这个国家官僚机构。党的官僚和国家官僚之间在根本利害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党的官僚构成权力的核心。国家官僚与党的官僚相比，前者处于从属地位。

因为党的官僚拥有大量多方面的情报和操纵人的垄断工具，所以凡是得到官僚支持的政治家，在一般情况下（例如只要官僚体制没有因革命起义等而失掉政权），就可战胜他们的各种反对派。迄今为止，在共产党高级政治家之间所进行的个人权力之争，往往都首先是为取得党的机关的决定性支持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仅要看那些政治家更能维护官僚机关的当前利益，而且要

看谁能通过人的关系把大部分具有决定意义的官僚（书记和部长）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为了实现后一点，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和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

因此，在公开或是隐蔽的个人权力斗争中能够把对方击败或打下去的政治家，也正是那些党的机关的真正代表人物或受到它支持的政治家。谁若得不到或丧失了党的机关的支持，或者正好反对的是党的机关所宠爱的代表的话，那么，他们几乎必然要在这场斗争中遭到失败。这是托洛茨基及其他人同斯大林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也是赫鲁晓夫在他开始触犯党的机关的利益时而感到意外的经验教训，也是柯西金在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已取得的优势面前不得不让步时所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如果勃列日涅夫在政策上失掉党机关对他的支持，那么他同样也将不得不蹈前任的覆辙。当哥穆尔卡由于不明智的工资和价格政策致使广大工人走向绝望的斗争而危及整个党机构的地位时，他就失去党的支持不得不让位给党机构的新的代表盖莱克。同样，当党的机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诺沃提尼的领导还没有产生日益增大的忧虑，还没有准备更换最高领导时，诺沃提尼一直没有垮台。但是后来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出现了违背党的机关中多数官僚的意志，更换领导班子的情况时，这些党的官僚们变成了推行改革的最大的敌人，并协助为外来的军事干涉作准备。因此，共产主义体制中的领导者们比民主主义体制中的领导者们起着大得多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对体制进行革命和变革的活动中是如此，在巩固和保持体制方面也是如此。因此，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的特殊性之后，才能充分理解上述领导人的作用。只有联系到这种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及其在体制中的相互作用，才能清楚地了解领导人物的活动可能性和发展趋势。

官僚体制的一般特性

如果要想真正理解共产主义官僚体制的特性，人们必须在了解一般的官僚体制的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苏联官僚体制的特殊性及其产生的原因。官僚及其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发展，无论是作为对其他社会阶级行使权力的重要工具或是作为争取本身权势利益的重要手段，这在历史上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是，只有在极其短暂的特殊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相互斗争的阶级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官僚才能成为国家中暂时最为强大的力量，从而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①。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也始终从属于国家中在经济和政治上最强大的社会阶级的利益。直到在苏联建立起共产主义体制并随之而排除了内部和外部反对官僚的重要因素之后，官僚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中唯一的、绝对的统治者，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管理机构的官僚化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但是为了认识这个问题，首先应看看官僚的一般特性。

首先应简单地概括分析一下官僚、官僚主义管理机关在合法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官僚们的典型活动、利益发展及其活动方式等②。同时还将阐明官僚的局限性以及**反对官僚主义**的种种因素、利益及其结构。这样，人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些反官僚主义的因素在共产主义体制中被排除的同时，官僚的地位和作用是如何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也就

---

① 参阅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117页起。

② 关于这个问题，希望参考如下著作：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韦伯：《经济和社会》、P·J·蒲鲁东：《一个革命家的自白》、M·巴枯宁：《行动的哲学》、N·鲁曼：《行政学概论》、R·梅伦顿：《官僚机构和个人》、R·戴利朵尔夫：《冲突和自由》以及W·D·纳尔：《福利国家和群众的忠诚》。

明白在当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产生消极作用的各种官僚主义倾向如何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已被绝对化，并导致这个本以为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发生彻底变质的情况。

一般来说，官僚制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这个分工使手工业脱离农业，出现了城市，发展了城乡之间的贸易，最后还导致阶级社会和国家的产生。这种历史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内部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有组织的活动和过程的出现。这时，为了集中地和综合地决定这些社会化了的活动和过程的发展，就必须借助专门的职业化的管理机关。各种活动的不同广度和集中程度的聚集以及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都要求对这些活动和关系的发展过程作出不同广度的、持续的或定期的决定。与此相联系的信息搜集和加工、判断、决策、决定的传达、登记、监督和规章制度的制订、贯彻和监督等等，这些一般都称作管理活动。随着管理活动的复杂化，产生了规模不同的、拥有许多专职官员和职员的管理组织（管理机构），导致这个机构内部出现了专门的分工。

国家机关就是作为最大的行政机关而产生的，并与阶级社会（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所谓管理，一般就是权力的管辖和统治。因为管理总是与追求一定的政治利益和贯彻相应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向一定范围的人发号施令。“任何管理都要求进行某种统治，因为要实现管理就必须把发布命令的权力交给某个人。”① 因此，管理工作不是单纯被看作是一种合理的、在认识到客观关系和进行的活动，而总是被看作是一种根据某种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即为适应某些利益、违背另一些不相一致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正如韦伯所说的那样，“统治”必然是意味着“一定集团的人要服从命令”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服从命令的人总是与发布命令的人有着同样的利益，总是乐意地自

① M·韦伯：《经济和社会》。

② 同上。

愿地服从。但是，这种在权威统治制度中由于"害怕受到掌权者的报复"① 而产生的服从，虽然不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达到一致，但它对实行统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把管理机关的职员称为官僚，或者把这一社会集团通称为官僚集团，这一向是一种带轻蔑含意的贬称，它反映了人们对伴随着这种管理活动而产生的各种消极现象的厌恶心情②。管理活动是人的活动中少有的充满内在矛盾的活动。管理工作本来是社会所必需的、对某些活动和过程实行有效管理的活动，如不进行管理，这些活动和过程就不能有组织地进行。但是同时，人们在管理活动中实际上追求着某种与一定的特殊利益相适应的、与人民相脱离的目标，而且管理活动也极端形式主义化，它的表现是效率日益低下。由于这些原因，管理活动产生了消极作用，人们把它称之为官僚主义。

这种管理活动的消极表现有可能由于管理机关过分扩大或者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大大发展，从而使管理活动的积极内容受到很大影响，以致使管理活动对被管理者及其活动所起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尤其在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体制下，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所起的消极作用，发展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研究这个管理体制的消极面的实质及其产生原因，显然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管理活动中有益于社会的积极内容。即使是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国家官僚的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也没有否定社会管理活动的必要性，他们仅仅以

---

① 韦伯：《经济和社会》。

② 韦伯从根本上把官僚主义性质的官吏和专职行政人员同等看待。也就是说，他把"职员"和"官僚"并列（参考《经济和社会》）。但是，一般称为"官僚"的地方，都极力谈论"职员"的消极的特点。几乎在所有百科全书中都强调这一点。例如在新出版的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所谓官僚，……只是一些拘泥于枯燥无味辞句的人，只要一谈到这些人，就会轻蔑地说他们顽固、狭隘和搞繁文缛礼。"（M·韦伯：《经济和社会》。）

自己的方式描绘了国家和官僚制的消极机能，探讨克服官僚制的方法。他们批评了促使社会异化的权力集中和国家镇压职能，这一批评导致对这种国家组织的拒绝和反对，以及强调采取独立自主的管理形式。

专职的国家管理机关具有一般的、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积极的任务，就是把在一个较辽阔的国土上发展起来的、大量的由于分工不同而相互分离的活动领域相互结合起来，加以协调，为之制定法律上的关系准则，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最后还要担负起捍卫这些活动的任务，免遭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侵犯。显然这种专职的行政管理活动在生产和分工高度发展的社会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当今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专职的政府机构，这种管理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种管理活动的形式和方法、管理机构内部的组织形式及其效率、管理机关的意图形成方式等，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具有各种各样不同利益的社会中，行政机构必然从属于特定的利益。通过什么形式和方法贯彻某种利益和意志，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条件下，对各国社会的发展就会产生极其不同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由于官僚主义这个概念主要是指那些对人民产生消极影响的管理活动，因此，下面我们将集中地分析一下官僚主义问题。

如果人们认为专职的官员制有益于社会的一面在于它能够调整和领导错综复杂的和高度社会化的活动，在于专职行政人员很可能比“兼职的行政人员”的管理效率更高的话，那么这种管理活动的消极面（官僚主义）则主要表现在两个特殊的问题方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首先应研究隐藏在官僚活动背后的利益，或官僚活动主要为之服务的利益。其次要较准确地认识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效率低的官僚主义活动的局限性和关键性缺点。下面就探讨一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1）只要社会还分为具有不同或相互对立的利益的阶级和阶

层，政治因此仍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那么，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权力机关的综合体），就始终会更多地为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这与看上去似乎中立的、凌驾于集团利益之上的国家的职能并不矛盾。国家之所以产生是为了调解利益冲突和保证一般制度得以贯彻①。现代民主国家在形式上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捍卫者姿态出现的，但即使在这种国家里，这种对不同利益集团持不同态度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法律总是在一定的利益状况下产生，而且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利益集团对制定法律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一事实意味着法律更多地适应某些特定的利益。这点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在经济上最强大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比起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们更能从那些保障现行所有制关系的基本法律中谋得更大的利益。甚至马克斯·韦伯也不得不强调这样一个认识："特别是对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群众来说，发现那些法律根据和行政措施对他们并不起任何作用，虽然这是根据形式上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那种精神'制定，但是实质上只不过促进'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法律只有在'伦理'意义上带有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式的法官去执行时，它才能起到法律机能的作用"②。

但是，不仅那些起着捍卫现存所有制关系的、对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不同意义的基本法，而且还有大部分其他国家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确定的法律、规章和决定，都总是由有关政府及其背后的利益在多少不利于敌对者的情况下制定的。此外，各种法规的解释及其具体化总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在经济法

①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所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一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194 页。）

② M·韦伯：《经济和社会》。

和其他原则性法律规定方面，行动的灵活性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这一切却意味着看上去似乎对所有不同的利益都保持中立的国家活动，实际上始终是一种偏袒某种利益的活动，只要在社会上还存在着根本不同的利益和利益矛盾。

只要国家官僚在整个国家机器中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它的活动就必然会对具有不同利益的阶级和阶层起着不同的作用，它的活动越要彻底捍卫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当政治上无法实现自己利益的人民阶层越广泛，反抗官僚活动的规模也越大，因为官僚活动作为一种异己利益的压迫形式只能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抗心理，并可能在具有根本不同利益的集团中导致公开的反抗。

尽管官僚制对国家的法律制定和国家活动的具体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它在一切社会制度中（直至共产主义制度为止）产生也始终只是一个隐藏在政权背后的强大利益的执行工具。官僚们越是把国家机器建造得周密具体，那么他们本身就越发成为这种政权的囚徒。官僚们越是同这个政权合而为一，就越不会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政权的真正囚徒，但是却作为这个政权的代表而被人民所憎恨①。但是他们越是有权，就越少能感到这种憎恨；他们的地位越高，越有权威，下级的屈从和市民们对这种人的畏惧就越大。官僚制越强烈地表现为人格化了的权力，它就越发脱离人民，并发展起它自身的特殊利益。

在各种官僚制中，维护和不断最大限度地扩大官僚机关，是它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只要在这个机关始终存在的情况下，官僚

---

①“官僚们，不管他们在官僚体制中的地位如何，总是以政权和整个组织的权威代表在进行活动的。在扮演这种官方角色时，他需要有无容置疑的权威。于是这就产生了事实上的和虚假的专制者的姿态。如果他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与他在人民面前的地位差距越大，他就越发要摆出这种姿态。平民们在其他官员们面前提出抗议和指责往往都是不起作用的，或由于上面提到的官官相护的团结精神而被置之不理。”（梅伦顿：《官僚机构和个人》。）

的特殊经济利益和权势利益才能得以保证。官僚的经济利益主要在于攫取薪金(在发展中国家,必然还要加上其他的贿赂)。在等级森严的官员体制中,薪金是分等级的(通过受贿赂而得到的钱也是与这种等级相一致),这就促使人们更强烈地往上爬和希望得到晋升。

官僚们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实行统治。经常从事这项活动,使得官僚们始终拥有对一般市民的统治权。"某些人的唯一活动和职业,就是制订制度、发号施令、提出方案、通过决议、实行监视、发出警告、刁难和训斥他人等等"① 。许多官僚在进行这种"统治"活动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自我陶醉和心安理得之感,这种感受不断重复和发展就可能变成官僚们的最强烈的利益和特殊的权势利益。这种权势利益不仅同经济利益相吻合,而且还能成为官僚们的更大的活动动力。

官僚机关越扩大,从属于官僚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部门越多,那么,每个官僚被提升到薪俸更高的集团中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时,扩大其权势和影响的机会也就越多。因此,不断扩大官僚活动的倾向,不断人为地建立新制度、制定新的条例、监督方法、公文报表等等,就成为所有官僚机关的一种规律。官僚活动本身比官僚们所管理的活动扩大得快,C·N·贝肯逊对此有清楚的说明② 。因此,每一个老官僚都力求得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在他手下工作,因为这会自动地扩大其权力范围。

官僚们的这种特殊权欲利益和收入利益必然不断地与其他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在广大居民中也有矛盾,即一部分不愿服从的居民与被迫服从的居民之间的矛盾,这种关系往往也就变得紧张,当顺从者在利益上与规章制度的目标相一致、而一部分居民阶层反对某些法律规定的目标时,官僚主义强行贯彻规章的做法,

① 参阅奥塔·希克:《经济、利益、政策》。

② C·N·贝肯逊:《是贝肯逊的规律还是进步的追求?》第12页。

就会使人民产生更大的失望情绪。当官僚们通过税收来满足其物质利益，这就会进一步引起权力斗争和经济对立。

（2）从官僚的特殊利益及其他种种因素中产生一种独特的官僚主义活动，这又更加促进了人民的反抗，在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不得不发展起一种特殊的分工。判断、决定、规定、检查、情报和控制等活动越多，管理的范围也就越广，部门也就越多，这样，就需要有更多的官员来处理政府工作，因为单靠少数人已不再可能进行管理。如上所述，官僚们对尽可能扩大机构有着一种特殊的兴趣，分工不断扩大，从而使统一协调工作变得日益困难。在那里，每个官僚或各个部门的活动都出现各自为政。从根本上说，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就是对复杂的管理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缺乏全面了解的表现。各个单位和各个政府部门都有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它们的决定在其他部门会产生什么样的间接结果，它们很不了解。同样，别的管理部门对自己管辖的部门所产生的影响也很少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或加以阻止。这种行政管理上的分工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官僚主义空忙，从而使这些机关对其所管辖的部门带来消极影响。完全机械的、不符合实际的、千篇一律的延误时机的决定或命令，正是对现实生活缺乏认识和官僚活动是一种自我再生产活动的重要证明。越是以自我扩张为目的，文件、表格和备忘录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小题大做和繁文褥礼也应运而生。在这种状况下，报表变成了现实生活的内容。现实生活仅仅是公文报表的反映①。对官僚们来说，只要有机关就能足以应付一切，机关的威信对他们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与“委托人”（居民）联系变成了一种负担，因为它占去了受上级重视的议事时间。履行义务和遵守纪律被奉为官僚的最高准绳，它是向上爬的

---

①“既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302页。）

最可靠的阶梯，它同时也窒息了人的感情。

遵守制度本来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现在却变成了目的。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目的偷换，工具的价值变成了最终价值。一般来说，所谓纪律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忠实于规章的意思，但官僚们不是把纪律看作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措施，而是看作他们生活中的一种直接价值。这种改变本来目的的、进而强调纪律的做法，导致了僵化和不易适应性。形式主义以至仪式主义就是这种顽固坚持和过分遵守形式化的程序规定的后果①。

对于下级部门来说，上面来的指示和命令就是最高权力无所不知的表现，它对官僚机关中每一个行政人员来说，就是他们作为公职人员而存在的保证。对各个官僚来说，不管是皇帝或党的首脑，他们关于国家必要性的不容怀疑的知识就是一种保护伞，抵制人们对其行使职权的各种批评。党的首脑与皇帝一样只信赖官僚们提供的情报②，他们则向官员们下达理解人民问题的详尽知识。官员们是人民的传声筒和与人民联系的纽带。他们没有报告的就是人民中不存在的。但实际上情报从下传到中央时，都基本上已是一般化的东西，并已成为不得不符合一般路线的概括，所以送到中央去的情报，其实是下级官员用他们对生活老一套观点而加以补充的情报。

官僚们的活动效率低，形式主义和脱离现实的指示越多，人民的反抗意志越强烈，保全官僚权威的欲望也就越强！对官僚的知识是不容怀疑的，因为它是由于他们对平民的一切理性享有合法支配权而取得的。“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

---

① R·梅伦顿：《官僚机构和个人》。

② “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302页。）

是它的思想方式。"① 凡是违背权威的怀疑论者，都被皇帝的大臣和党的机关的统治者打上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标记。

为了使官僚机关免遭各种批评，为了把领导和管理活动伪装成一种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的、正确无误的"为人民服务"的活动，这就不得不给这种管理活动蒙上一层看不透的、公务秘密的面纱②。隐藏在一切决定和决议背后的真正的利害、对现实生活的无知、效果很小的无休止的会议、公文旅行、各个部门和政府各部之间的相互争夺职权范围、为了向上爬而玩弄的阴谋、为上级搜集群众中的各种谣传，以及对政治上不一致的人展开特务活动等等，这一切都不得不潜藏在神秘的和难以捉摸的外衣之内，沙皇时代的执政者或共产党的执政者都同样很好地穿上这种外衣。"官僚体制的普遍精神是神秘、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 ③

在我们进一步研究对官僚主义管理活动的发展起限制作用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谈一谈作为内部因素的官员们的市场利益和作为外部因素的民主国家条件。

所谓官员们的市场利益，就是指那些主要与生产和商品（物质资料和劳务）销售有关的领导和管理活动。因此它涉及的不是国家管理机关，而是着重在经济领域内的活动。这种管理活动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活动效果直接反映在市场结果上，他们的报酬也直接取决于市场结果。国家管理活动和其他类似管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不能不在市场上出售，因此，它的效果也难以衡量。但是，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302页。

② "所有官僚都企图通过保守秘密，暗中隐瞒自己的知识和意图的方法来进一步提高他们在职务中取得的知识优位。就其倾向来说，官僚主义的管理往往是不公开的管理。官僚尽可能隐瞒自己的知识与行动，以免于受到批评。"（M·韦伯：《经济和社会》。）

③ 同①。

和销售的管理活动却构成被销售的商品的部分成本。所以这种管理活动总是以一种量的比例直接地转入到产品销售的总收入之中。如果这种成本比重越小，或收入与这种成本费用相比的比重越大，那么，这种管理活动的效果就越高。

因为经营管理能够从质量上和数量上有直接给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很大的影响，并可以程度不同地在生产上反映出来。所以经济管理的效果越高，总收入与成本以及所有生产和销售费用相比也就越高。由于经济管理活动具有这种间接的可测性，人们就有可能对企业管理人员的活动效果进行考核。如果经常同竞争对手进行比较，人们就能很快知道管理机构是否过大（效率低）或是比较合适。第一，管理效率问题，可以通过不断改进质量（提高官员们的业务能力、改进组织和实行管理机械化等）加以提高；第二，一切官僚主义的为扩大而扩大管理机构的倾向也是可以排除的。如果把管理人员（特别是负责的管理人员）的一部分收入（分红和奖金等）与利润（成本和销售额的差额）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些管理人员能出自自身利益而关心谋求尽可能高的效率。那么，阻止官僚化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大为提高。

虽然人们不能忽视，随着高度集中和拥有许多子公司的大企业的出现，也就跟着产生了具有明显的官僚主义化倾向的庞大的经济管理机构。在这种庞大的机构里，要对管理活动效果进行考核确实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它已变得如此复杂，从而无法看清全貌，而且也很难把它的效果与竞争企业的效果相比较。垄断化的程度越高，在竞争的压力相对减弱下利润越大，管理效果就更难以判断和对比。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某些官僚主义倾向。同时在这种庞大的行政机构中，使职工的收入同企业利润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也减少了。由于中央管理机关同大量的生产、销售等单位之间存在着日益增多的间接的关系，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们出自本身利益而对效果的关心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但是，尽管在经营中存在这种倾向，不过管理机关的效果大体上还是能够测定和考核的，管理人员出自本身利益而对效果的关心也远比国家机关的利益关心大得多。因此，这里的管理上的官僚化也远比国家机关的官僚化弱得多。当人们在谈论官僚主义的时候，往往是指国家机关而言的。更不用说经济管理机关不是为贯彻政治利益而是为贯彻经济利益服务的，这点大大改变了管理活动的方法。在按市场情况办事的企业中是很难出现那些典型的公文往来、无休止的议事、不断的调查和控制、宣传权威、迫害敌手以及其他在不受监督的统治机关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病。管理活动中的那些有益于社会的内容在经济部门（甚至大的联合企业），往往不会像在国家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里那样为官僚化倾向所否定。因此，如果人们在社会学上使用"官僚"这个概念时，也就是说把它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特殊社会集团的称号而加以运用时，人们考虑到的是国家官员或其他政治机关（党的机关等）的官员们。这个社会集团根本不同于市场经济企业中行政和技术经济人员。

只要管理人员的活动直接同经济的效果相联系，并根据效果直接给予评价和报酬，那么，这种活动既不会变成以追逐权力为目的活动，也不会成为臃肿的虚伪活动。着眼于市场的管理活动，其特点是：尽可能考虑到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合理地掌握生产和销售的活动，不断努力争取获得最高的经济性和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一旦这种管理活动与市场效果的直接联系开始消失时，这些合理的管理特点也就日益消失，官僚化的过程将占上风。国家管理活动和一般政治管理活动是很难直接同市场标准联系起来的，即很难按照在市场价格和竞争条件下产生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来评价这些活动和给予报酬。这在许多部门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国家管理活动与经营管理活动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

如果投资项目是由私人企业主或者由市场企业中参与利润分

红的职工来制定，那么，这一决定过程将与官方的管理委员会所作的决定有着惊人的不同（即使官方委员会是由所谓专家所组成）。当人们一旦知道自己未来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当前决定的投资项目，那么，他们就会付出最大努力充分利用能得到的所有情报，自觉地负责地决定每个投资项目。

虽然政府机关所属的委员会也试图充分利用一切情报，但是在作出决定时却缺少应有的责任心。对经济漠不关心的官僚可以对一个投资项目进行一、两天或数天的讨论，但是，在各种论证都提出之后，经过长时间的令人疲倦的讨论后，参加会议的人便努力想使委员会尽快作出决定，即使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但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承担责任，也不需要承受经济损失。这一意识反映为这样一种态度，它最终以一项决议来结束这一漫长的会议。

企业对经济过程的决定权越小，与经济毫无关系的国家官员对经济过程的干预越多，整个经济的官僚主义化便越厉害。由于国家经营和领导的基础机构不断扩大，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规定日益增多，产品质量规定、保健规定、价格规定以及调整交通运输的规定日益增加，国营工业企业的数目日益增多，国家为周期性危机和通货膨胀而采取的经济措施和命令、调整劳动条件的措施以及国家在社会医疗、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不断增加，国家在收入和分配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等等，由于这一切，官僚们开会、研究、发布各种文件报表、制定规章制度、实行监督、进行调查、提出警告以及传讯等活动也随之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之间的关系已日益不能调整和协调，从而造成大量的经济矛盾、拖拉现象、错误决定、经济损失和严重干扰，更不用说，官僚们作出的决定总是以他们的利益、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为背景的，总是与大多数人民利益相违背的。

但是在民主制中，随着国家官僚活动的增加，人们也日益开始寻找方法和途径，以便自觉地抑制决定的集中化（实行权力下放），

在有可能的地方，则将实行经济标准，扩大和加强民主的和公众的监督，以及用总体的方向性和原则性计划来代替由中央作出具体决定的做法。然而这些都只有在民主条件下才能做到，在民主的条件下，蒙受官僚主义管理活动的恶果最深的广大人民群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与社会官僚化展开斗争。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反对官僚主义的外部因素。

民主关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民主原则、民主制度及民主机制均在不断发展，并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努力相一致，他们要求通过新的民主的国家形式来保证他们的利益。为反对独裁统治而出现的争取民主化的努力和斗争，大部分都具有革命的性质，并且以体制改革作为奋斗目标。

但即使在民主制中，也日益出现了要求实现更广泛和更彻底的民主化的需要① 。尤其是当现存的民主关系已日渐流于形式、广大人民阶层的利益实现无望而国家的活动又日益脱离人民的时候，就更需要更彻底的民主化。不管是极权主义制度还是民主制度，只要国家脱离人民（尽管在两种制度下脱离程度有很大不同），那么官僚主义化必将扩大，国家必将为较小的、但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所利用。因此，扩大和加强民主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场争取限制官僚们统治范围的斗争，一场争取扩大广大人民阶层影响、监督官僚集团的活动的斗争，又是一场争取实现一种新的、有效的、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决策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斗争。

什么是民主关系的实质呢？那就是：受管理的人民群众有一定的可能性得以对粗暴的官僚统治方法施加政治压力，并限制其弊端。重要的问题是，在多元化的民主制内部，在各种党的官僚

---

①“即使民主化并不能帮助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但它有助于实现一个比较民主和比较理想的社会。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有可能使现实的标准的民主制得以实现。民主制度是有发展能力的，是强有力的。而民主化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条件。因为民主化的义务，就是逐步地、渐近地朝着权力平等这个民主准则的理想接近。”（A·贝林卡：《民主的动力》。）

机关之间要展开竞争，从而使国家官僚制无法实行垄断化。在各种管理和领导的过程中，应有各种可供选择的、相互竞争的政策方案，这将有助于限制和取消官僚的利益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旦由于民主条件被排除，如在法西斯体制下，出现了党的官僚垄断化，并由此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国家官僚制时，党官僚的特殊利益虽然基本上与大资本利益相一致，但在这同时，它在某些具体目标上，也可能脱离大资本的利益并且与之发生矛盾。但即使在法西斯体制下，官僚们也仍然隶属于大资本的利益，对人民来说，即使官僚们能够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形式对付人民，但他们也会变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虽然民主国家形式的社会主义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这种形式下，比起极权主义国家的形式来，人们仍可以对官僚主义的愚蠢行为、专横、迫害和压制进行抵抗。首先，人们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民主方式公开地合法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为实现条件成熟的体制改革而斗争。

在各种国家形式中，官僚机关总是在原则上反对一切民主化的努力，而且竭尽全力使民主国家流于形式，并借口为了“国家的利益”限制民主，即使是口头上的民主表白也要限制。绝对的民主是没有的，只有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权利，以便为贯彻其真正的利益而进行的持久的斗争。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也一直是反对全能的、自以为是唯一能了解人民的“真正”利益，并且是人民利益的合法解释者和捍卫者的官僚集团的斗争。官僚集团反对一切来自下面的监督，因为这种监督将埋葬官僚集团建筑在保密基础上的权势地位。马克斯·韦伯指出：“已完全壮大起来的官僚集团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权势地位，在通常情况下，拥有突出的权势地位。不管官僚为之服务的‘主人’是以‘公民创制权’、‘公民复决权’和‘撤换官员权’等武器武装起来的人民，还是拥有‘投不信任票’权力的、按贵族制或‘民主’方式选出来的议会，还是自我增补的贵族院，还

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还是世袭的‘绝对的’或‘立宪制的’君主也好，这些‘主人’对站在行政岗位上的训练有素的官员来说，往往只不过是‘专家’面前的‘外行’。”①

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官僚集团都必然为某种阶级利益服务，国家官僚也从来不可能违背经济上和政治上最强大的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一事实并不会因官僚集团拥有了权势地位而有所改变，无论是作为封建贵族或是资产阶级商人的仆人，也无论是作为大地主或是资本主义工业的保护人，官僚集团总是能够找到足够的活动余地，按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在法律保护下，官僚主义地为所欲为的王国。官僚集团在尊重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尊敬最强最富有的家族的同时，他们又是整个行政活动的主人，并不断追求与人民群众相抵触的特殊权势利益。

无论在奴隶国家（当然除奴隶以外）的旧民主制中或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中，只有当民主条件已经发展到人民群众掌握各种公开的压力手段时，官僚的专横跋扈才能稍有限制。选举活动等才能在有限程度上发挥作用。所谓有限程度，这是因为所有被选出的代表（不论其属于什么政党、不论是在什么民主形式下，是较直接的或间接的议会制下）都迟早会依附于官僚集团，要想反对官僚们对知识的垄断，是毫无办法的②。

尽管如此，人民还是有可能自由地建立政治组织，选出各种不同的政党代表，同时，还掌握了对官僚统治施加压力的手段。虽然这个压力手段的确还不能足以排除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社会结构，还不能足以排除训练有素的官僚体制。不过，与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相比，人民仍然可以获得较多的情报，可以自由地讨论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和社会》。

② “当官僚同议会发生对立时，官僚从其权力本能出发，反对议会使用其独自的方法（例如通过所谓‘证人作证权’等）企图从有关人员那里取得专门知识。一个情况了解甚少，因此，软弱无力的议会当然更受官僚们的欢迎，只要它的无知与官僚们的利益不发生矛盾。”（马克斯·韦伯：《经济和社会》第 573 页。

它，提出各种不同的创议，特别是还有可能去考虑从根本上进行社会改革，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的准备。

公众舆论借助于较为自由的、进步的宣传工具，比选举具有更大的影响。在民主制下，不会允许官僚们象在共产主义体制中那样压制一切批评他们行动的意见，或者把提意见的人指控为敌人而横加侮辱和予以消灭。凡是在官僚们控制了出版机构和情报系统的地方，凡是在他们能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地方，凡是在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并每日每时把官僚们的权势目标当作社会主义利益而加以宣传的地方，官僚们的为所欲为就不可能为公众舆论所限制。在民主制中，能够通过公开批评和揭露，反对行政机关粗暴的和长期难以忍受的态度和行动，这就是对官僚统治的一种限制。它即使还不能粉碎这个统治，但是特别当人们观察共产主义体制时，这种限制的意义就突出了。

当重读韦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所作的关于共产主义经济中官僚化问题的预言时，还是饶有兴味的。

他说："当由一批受过训练的专家官员来实行统治时，其权力是坚韧不拔的，因为整个生活供给的组织工作是由他们来安排的。从理论来看，资本主义虽然可以逐渐消灭，——尽管这并不象某些对资本主义一无所知的人梦想的那样是件小事，假设情况已发展到资本主义被铲除时，但这实际上并不意味着近代产业劳动的坚固外壳将被打碎，相反，国营企业转变为某种'公众经济'的企业现在仍将由官员来进行领导。在普鲁士国营矿山和铁路管理局工作的职工，其生活方式与私人资本大企业中的职工生活方式没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不能说他们比过去更为自由了，因为任何反对国家官僚的权力斗争都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没有一个对于反对官僚及其权力感兴趣的主管单位可供人们象对待私人企业那样提出控告官僚集团及其政权。这就是全部不同之处。如果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排除了，那么国家官僚就独占了统治舞台。现在，私人企业主和

国家官僚并存，至少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对立和相互牵制的关系，但将来两者融合在唯一的一个等级制度之中。这同古代埃及的情况有些相似，只不过变得无与伦比的理性化了，因而也就成为一种无法消除的形式而已。"①

以简要的语句可把官僚们具有的消极作用的利益和行为归纳如下（这些利益和行为在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内只是作为受到一定制约的倾向实现的；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一些消极利益和行为，它们在政治上垄断化的官僚体制下，尤其是在特殊的共产主义官僚体制下，不仅已经再现，而且在特殊的条件下，更加明显地显示出来，并且部分地具有了绝对化的表现形式）：

（1）官僚们向上爬和施展权势的利益。这里所产生的主要利益就是要巩固和扩大官僚机构以及进行反对一切限制官僚权势的改革。

（2）完全按照等级制度，严格遵守纪律地去完成任务和纯粹在形式上贯彻上级命令及规定，这已变成了自身的目的。同时，在人民群众面前则采取一致的专制的行动。

（3）官僚日益脱离人民群众。这主要是由于官僚们滥用职权、牟取私利、垄断特别的知识和情报、制造机密、搞经济特权、追求个人威信以及官僚主义管理机关搞形式主义等。

（4）在官僚内部形成宗派集团和搞阴谋，这主要是由于许多领导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产生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致对付人民。

（5）作决定时，不署名，因此对社会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公众对政治家的大量批评被淹没在众多的官僚主义规章制度之中，或者只进行一些缺席审讯，最后不了了之。

（6）在作出有关经济问题的决定时，由于不管经济决定是否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和社会》第835页。

能带来利润或造成亏损，都与国家官僚的报酬无直接关系，从而对他们也就不存在物质利益。这种官僚主义的生产管理导致了经济效率日益下降。

共产主义制度下官僚集团的特殊构成

在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中，由于废除了私人资本，官僚不再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权力，但是随着也消除了能起到反官僚主义作用的内在和外部因素，从而不仅产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对整个经济也拥有统治权的官僚统治阶层，导致了官僚活动的效率空前低下，而且使权力垄断于党的官僚手中**。这种状况只是在个别历史情况下才出现。但在苏联，这种特殊的党的官僚却**在整整一个发展时期中变成了绝对的统治力量**，它依靠从属于它的庞大的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的帮助，实现了绝对的统治①。在苏联社会中，工人阶级及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强加给党的官僚。只有当他们的利益与官僚本身的利益一致时，官僚们才会考虑他们的利益。这就是**苏联共产主义官僚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

从关于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产生过程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官僚服从的并不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相反，只是那些符合党的官僚利益的政治主张和建议才能得以贯彻。这里我们要概括说明的是：第一，为什么与过去的各种社会形式相比，苏联的官僚阶层会在数量上发展得如此之快？第二，为什么它能成为全体人民真正垄断性的统治者？——或者，总的说来：这种只符合官僚阶层

① "无疑党的机关是苏联体制中的决定性支柱。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近二十年里，党的作用又有了显著的增强，它控制和领导着拥有一千四百八十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此外它们还控制了最主要的群众组织，首先是青年团和工会，当然还控制着党的各级组织、经济企业、政府各部、军队和军队的政治工作等。党的干部是历次运动中的决定性力量。"（W·莱昂哈德：《一次新的革命前夜吗？》德文版第106页。）

特殊利益而不符合广大居民利益的制度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我们认为，重要的不是官僚们出身于什么阶级和阶层，以及他们在当官之前具有什么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尽管俄国布尔什维克们粉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工农子弟代替了大部分沙皇时代的官员，尽管党的机构是由共产主义革命者所组成，但是他们很快变成了具有独自利益的和典型官僚主义活动方式的官僚。甚至那些最受信任的被选为党的机关领导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也或迟或早地转化为官僚(为人民所害怕和愤恨的官僚)，他们几乎同过去的统治者一样对待人民。他们具有特殊的利益，追逐特殊的目标，并且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具有特殊的活动方式，脱离其他社会阶层，并且与其他阶层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切都是他们从事特殊活动、获得特殊收入和具有不同的生活条件的结果。这些情况马克思虽然一度意识到了，但列宁没有能亲眼见到它，而列宁的继承人却故意加以掩饰。

在当今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也就是在当今发展阶段上，有两个可以限制官僚统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尤其是在共产主义实践过程中，却完全忽视了这两个因素，它们是：第一是人的活动是否为社会带来实际效果，以及根据其效果付给报酬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在共产主义实践过程中尚未解决的问题。第二是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差别的问题，以及为了真正提出和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必需具备民主条件的问题。人们过去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后来又不愿去理解它。这就是说，上述两个内在的和外部的反官僚主义因素，基本上既没有被人们所理解，同时也有意被置之不理。

现在，我们先考察一下第一个问题。它首先涉及的是，不能以简单化的方式而应以真正综合的方式来理解人的社会劳动；其次，与此相联系，必须按劳动的社会效果付给合适的劳动报酬；最后，

劳动效果(作为取得合适报酬的条件)是可以客观地加以评定或以某种方式加以表达的。情况表明,如果不理解或者忽视这个问题,那么其结果就会使共产主义经营管理官僚化,它必然导致官僚统治史无先例的大发展。

劳动的概念不能简单化,首先就在于人们只是把劳动理解为劳动力的支出,从这种认识出发,在苏联的经济实践过程中,人们简单地只根据每个从事劳动的人的劳动量(也就是已支出的劳动力)以及劳动质量(作为不同技能和熟练程度的表现)来评定和支付劳动的报酬。他们以为,根据不同的劳动量(直接计算劳动时间或者间接地按一定的产量或劳动成果来计算),以及根据劳动力的不同质量把劳动力分为各种等级付给报酬,就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动付酬的要求了。

但是实际上,这种方法就是把劳动的重要方面,即社会效用和社会效果置之不理或加以忽视。因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劳动是否创造出了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即社会所必需的使用价值。在发达的工业生产中,这种使用价值不是靠单个工人而是整个企业集体提供的,并且也只有当整个企业集体的职工不仅被机械地根据其劳动数量和质量,而且是根据真正为社会所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来付给时,整个企业集体也就会关心社会需要的生产了。但是这意味着无论是社会主义大企业还是一个企业联合公司,在生产成千上万的各种产品时,必需使每一种产品都能按社会所必需的数量进行生产,并使之具有最佳的质量。这也意味着以最佳的劳动生产率,在最经济地利用一切生产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此外,还必须在产品、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面进行最适当的革新。如果要使劳动根据社会的需求得到最佳发展,那么,就应从这些方面来估价生产集体的劳动,并按此给予报酬。

有人认为,生产的方面(结构、比例、质量、经济效益和技术革新)的最佳发展,首先可以通过中央计划,其次可以各个经济部门

和企业的管理机关作出决定而得到保障，并认为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企业职工的报酬按其劳动数量和质量付给是可以的。但这是一种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假设，共产主义的经济实践正是失败在这种假设之下。无论是中央计划委员会还是各个经济部门都不可能对其下属无数企业的错综复杂的各个生产侧面作出规定、进行计划安排和实行监督。实际上，他们充其量只能规定总的增长任务，以及几个略为具体一点的重点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各个生产重要侧面，不是完全由各个企业领导来决定，就是由企业根据它们所掌握情报自行作出计划安排。

但是在没有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企业管理机构作出决定往往是主观的。由于取消了市场价格和竞争压力，由于报酬同现实的市场效果是脱节的，因此，既不可能获得赖以作出最佳生产决定的基本情报，同时，企业管理机构也缺少决定性的利益关心，使生产活动、流通活动以及管理工作实现最有限的发展。所谓不存在现实的竞争，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发现企业管理机构在结构、比例、质量、经济效益和技术革新方面作出是否在本行业中是最佳的决定的决定。因为没有自由的市场价格和竞争压力，所以不管生产决定是否最合适，生产发展是否最有效，这都丝毫也不会影响企业管理机构本身的收入。这也意味着内在的反官僚主义的因素被排除了。这样，企业管理活动的官僚化便可以不断地发展，它已无法自上而下地通过道德要求和政治动员加以阻止①。

这时，企业管理机构不仅主观主义地、不受客观竞争影响地、至少不受竞争威胁地作出决定和进行领导，而且由于中央计划只规定了简单化的增长任务（如果完成这些指标就可以获得计划规定的工资和奖金）从而可以在不顾质量及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发展这种单纯追求数量的增产往往纯属虚假，是靠在生产结构和价格上弄虚作假而达到的。这种欺骗行为无疑给消费者以很大的损害，

① 参阅奥塔·希克:《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论述》第四、五、六章。

并且造成长期的、类似战时那样的经济紧张以及技术发展比资本主义更为落后。

由于不能客观地测定企业管理机构的效果，尤其是超企业的管理机构的效果，也由于在这些管理机构中任职的官员们对市场的利益关心被排除了，从而在这些机构中，官僚主义的无效劳动日益严重，同时使官僚利益有可能得以贯彻，并且很难对此实行监督。会议大量增加，调查报告和供决定用的报表日益繁多，监督活动日益复杂化，为计划而计划的活动超过了对现实可能性的估计，但官僚们的这些努力却不能通过客观的检验标准使其受到制约。对官员来说，这同时是使他们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以及确保他们晋升的最可靠的道路。

这样，整个经济管理就成为官僚们吞食祭品的祭堂。管理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理性地研究如何尽可能地节约生产资源、发展技术和增加资材，而是大量地制造公文往来、计划和请示报告，即忙于向有关的上级部门汇报，填写计划和执行报表、统计表，提出价格草案和新物价申请书，为申请原料向物资分配部门提出申请报告，为申请劳动力的填写基础资料，为技术部、生产质量检查部门、中央银行、检查委员会和外贸部填写报表，给党的机关写总结报告等等，这一切都是公文往来和文件制造，也是虚假的积极性和无效劳动。这些形式主义的活动却变成了官僚活动的实际内容，而提高生产效果的内容却成为次要的了。这种官僚主义发展越快，管理和领导机构就越庞大，各个官员的晋升机会也就越多，他们的薪俸越高，管辖的范围也越广。通过官僚本身的自动繁殖现象，企业以上的管理机构比工厂的生产人数和产值增长得更快。

这一点从下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苏联中央管理机关的经费支出增长情况与几个重要部门的企业职工人数生产总值增长情况）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九六八年的百分比，以一九六六年为一百：

	企业数	职工数	每个职工平均产量	总产值	中央管理机构的费用
各联盟部：					
重工业、运输、机械制造部	99.2	104.3	111.6	116.7	128.0
电气工业部	94.8	108.5	111.5	118.8	135.5
化工和石油机械制造部	103.5	107.1	117.0	125.0	142.0
建筑工业机械制造部	102.8	105.1	117.9	124.8	126.8
农业机械制造部	107.1	104.5	112.7	117.9	131.0
加盟共和国各部：					
黑色冶金工业部	101.8	105.2	110.0	115.5	133.0
煤矿部	97.0	98.0	106.8	104.9	123.3
石油部	97.5	104.4	108.5	113.9	120.6

出处： J·库兹涅佐夫、 A·泰霍缅诺维：《各种工业部门的管理机构的效率问题》。(《经济问题》1970 年第 11 号。)

在企业之上按等级制建立了总经理处，管理总局、各工业部、计划委员会以及所有从属的、相平行的部局(劳动部、财政部、中央银行、技术部、物价管理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原材料供应和物资分配局及统计局等)。这是难以置信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莫斯科除了一般西方国家也常见的各政治部外，还有四十一个主管经济的部，这些部分别拥有官员达数千人以上。在各加盟共和国，这些机构又设立了与之相应的地方一级的部门。这种庞大的国家计划和

管理机构，以及为数更多的企业和企业联合公司的机构，在所有东方集团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的愚蠢行为和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到处蔓延。仅为官僚机构而支付的经费已给社会造成很大损失，而官僚的活动又使这种损失增大了好几倍。遗憾的是，至今尚没有揭露这种损失的统计数字。

至于官僚的总数究竟有多大，这也无法确定，因为这属于官僚集团严加保密的秘密，是不允许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知道的。只有凌驾于经济官僚和国家官僚之上的官僚，即共产党机构的官僚，才了解下属官僚管理机构的规模和活动。但是他们很清楚，他们的命运与整个体制生死攸关，他们不允许揭示这个体系的始终存在的官僚主义本质，不允许把这个体系本身说成是官僚主义的，但党的领导却时而对显示出来的官僚主义的缺点提出批评。也只有党的官僚在经济困难日增、人民(尤其工人)不满情绪发展成一种威胁的时刻才会开始对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进行批评。人们总是首先对各部、各管理总局或企业中的官僚主义进行较严厉的批评。但是却不提中央机关根本不能在变化多端的数百万种产品中认清识别复杂的经济关系，更不用说能通过有意识的经济领导活动来尊重这些经济关系，协调这些关系。

人们忽视了在归纳和分析各种生产情报之中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从各个企业到中央，有关大量必需产品的数据是按一般产品种类进行了归纳，中央计划委员会根本不知道各个具体的产品究竟需要多少，它只能对高度归纳的投入——产出关系进行结算。除少数例外，计划任务总是以总额的形式通过各级机关层层下达到企业。然后，在那里再把这些任务具体化，变成具体的生产决定和生产活动。人们不愿意承认，在中央的一般性计划决定与各企业的具体生产决定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不仅是，或不首先是由于大量的具体产品即使用最现代的计算系统也无法按计划进行协调这个原因所造成，它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企业集体利

益和中央机关所要贯彻的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

中央计划和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企业的产出与投入相比达到最大限度，或者说为达到一定的产出，使投入缩小到最低限度。但企业方面，它总是希望为便于完成其任务，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因此它们的利益是：与计划和领导机关所要求达到的产出相比，要求投入尽可能的高，或者说在能够得到的资金条件下，把产出订得尽可能的低。这个根本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可能通过部分的改革、改变生产指标或改变生产刺激所能解决的，更不能靠管理机构的改组所能解决的。

有人认为，广泛地利用电子计划系统，实行现代化的国民经济最佳化的计算方法，便能克服管理中的官僚主义缺陷，制订更为有效的计划。但这种设想是有意无视这样一种状况：中央计划委员会不可能在产品品种多达几十万种的情况下使生产的"微观结构"实现最佳化，它只能按高度归纳的产品种类进行估算，或者只对少数几个具体的重点产品进行估算。在没有市场利益和市场压力的情况下，这种现行的按产品品种进行估算的做法不可能排除指令性计划经济中的根本问题，即不可能使各部门、各企业从利益上关心生产效果，充分地利用使生产最佳发展的可能性、并从这一目的出发，向中央计划机关提供情报。同样，它也很少能改变各部门和各企业的那种漠不关心态度，使它们关心如何把中央编制的综合性生产指标改变为最能适应社会需求的生产决定。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正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种漠不关心无论在工业经营管理中还是在农业经营管理中都普遍地存在着，尤其在农业经营管理中表现得更为严重。这种漠不关心也不可能通过中央机关的激励而得以克服。

不管计划单位和企业提出的产出是否根据总产值、净产值、利润和劳动生产率的计划指标来决定的，不管它们的生产是否可以

借助于或多或少的指标加以控制，企业追求的始终是：第一，在现有的劳动力和投资条件下，要求上级尽可能压低计划指标。第二，向中央机关提供情报时，力求在这些情报的基础上能争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和便于完成生产计划的条件。上述问题也不可能通过鼓励而得到克服，因为中央机关只能依靠汇报，它对于企业生产的潜力缺乏具体的了解。因此，尽管中央机关规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利润、奖金等，但各个企业更关心的是向上级打假报告，要求压低生产指标，以便轻而易举地完成计划，从而得到更多的奖金和工资。

中央机构完全根据企业提供的情报来决定企业的报酬（最广义地说），这就构成了这个计划体制所具有的难以克服的矛盾。由于物质报酬至今仍然是促使各企业在进行剩余劳动、加强劳力和提高劳动效果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实行刺激的中央不可能具体了解企业的贡献，这样，中央机构就决不能排除企业的假情报（根本不能识破这些被歪曲了的情报）。只靠精神鼓励和不按劳付酬不仅不可能促使企业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反而促使下面造假情报的原因。

谁若简单地正视潜伏在这一体制内的矛盾，或企业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来解决这一矛盾的话，那么，他不是这一体制的既得利益的伪善者（这是由于他本身所处的具有吸引力的地位决定的），或者就是徘徊在理想主义小道上的人。这后一种人是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即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还远远不能对繁重而单调的劳动本身感兴趣，而是为了报酬和消费而从事劳动，因此，在任何一个企业集体和企业领导机构中都出现了讨价还价的现象，即要求劳动尽可能少（包括降低生产以代替提高生产成果），报酬尽可能多。列宁在革命后不久已不得不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等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在革命热情经过二三年之后逐渐消退时，也毫无例外地体会到了这点。

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不断出现这样的号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虽然从根本上批判苏联的官僚主义，指出苏联的体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但与此同时又毫无道理地拒绝一切运用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尝试。例如A·卡尔诺① 。他引证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成就，把官僚统治的存在当作苏联经济困难的原因。他说，这个官僚统治同中国党的领导不同，它导致了违背劳动人民利益、导向剥削和异化的国民经济计划。至目前为止，卡尔诺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苏联官僚统治的机制及其后果还有待进一步详细地解释和论证。卡尔诺不赞成在东方集团国家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尝试，反对利用社会主义的市场关系。他的这一态度是由于过低估计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的物质利益及其特性。卡尔诺认为，只要由"有真正的工人民主"来代替官僚统治就行。根据他的说法，这种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

"工人阶级应通过广泛而自由的讨论对所有涉及全体的重大决定有所了解，并就原则计划作出决定。每个企业领导应参与这个解释和决定的全过程。但它们不是作为与工人相互对立的对手而是作为合作者同工人进行合作。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生产，其目的在于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这种模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②

此外，卡尔诺把苏联产生官僚统治的原因完全简单化了，他把产生官僚统治的原因说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流尽了血，它的先锋队被消灭了，它不可能重建新的政治性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以及不得不起用沙皇时代国家机关的旧人员。卡尔诺认为，只要真正工人及其先锋队具有较高的觉悟和道德观念，就足以保证生产发展能适应社会需求，并能获得最大效

① A·卡尔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第 63 页起。

② A·卡尔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第84页。

果①。这种设想只不过是把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中争取最佳生产发展的问题简单化了。毫无疑问,这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愿望。

第一,这种设想的前提是:由工人委员会领导的企业即使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也总是能事先看清应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品种,从而可以满足全国消费者的需要。但是卡尔诺没有再进一步说明,在有着数百万种产品的情况下,在需求结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人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例如,一个企业当它增加生产时,这还要取决于数百个不同供应者,第二和第三供应者增加产品的供应,就是说,还取决于原料、半成品、机器和能源等生产的按比例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怎样才能对需求的上升作出相应的反映呢?

要使生产适应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象市场经济体制那样,在事后不断使生产与之相适应,但由于价格不是按供求关系来调节,从而就会出现无数的供应缺口,使许多需求得不到满足;要么就是事先对各种具体需求作出预测,并在数百万种产品的复杂关系中对整个生产作出计划安排。然而,这一点无论是代表或计划委员会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连卡尔诺本人也承认了②。

一种意见认为,中央只确定总的生产计划(即根据总的需求调查确定各个部门的产业结构,而具体的生产微观结构则由各个企业自己确定。但是这种设想,第一忽视了中央所决定的投资数额(在各产业部门中的投资)与企业具体生产可能性之间的决定性关系。中央在决定投资时的任何一个错误都将象今天一样导致生产发展与需求不相适应的现象(从而产生供应上的缺口)。第二,卡尔

---

① 例如在捷克,无产阶级并没有"流尽了血",而且有最好的干部占据一切重要职位,但是在这样一些存在着强有力的共产党的国家中,为什么官僚化的发展并不亚于苏联呢?关于这个问题,卡尔诺几乎无法解释。因此,他回避了党的机关官僚化这个重要问题,完全无视与社会地位相联系的官僚体制的特殊本质。(参阅卡尔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第60页起。)

② 卡尔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第67页。

诺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所有企业集体都在利益上关心具体的需求变化，并不断灵活地改变它们的生产微观结构，进行产品改良和引进新的更有用的设备(这是技术进步最重要的前提)，同时最经济地利用生产要素，以便通过不断改进的工艺、生产组织和分工等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企业集体的收入却不因为这一切而得到相应的改变，就是说，这一切是靠"社会主义道德"来实现的。这是过低估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动机对提高成果的作用。甚至连马克思列宁也强调了在这一发展阶段中的物质动机。

即使在卡尔诺所主张的生产关系中，一切生产结构的改变、质量的改进、生产的革新和技术的提高等应作为附加的劳动成果给予报酬。因为在当前生产力发展阶段上，劳动对大多数人们来说仍然是沉重的负担，并没有成为他们自己的兴趣所在，它首先是作为消费的前提而被迫从事的，只要那些通过更多的劳动尽可能最佳状态地发展生产的企业集体，不能获得相应的较高报酬(与那些没有努力利用一切潜力的企业集体相比)，那么，它们的成果就很快会减少下来。因为任何一个处在企业之上的机关都不可能对不断变化的各种改善生产的可能性作出计划安排，不可能对它进行测定和评价。只有真正的市场机制以及价格运动、竞争和收入与市场的联系才能迫使企业不断地追求生产的最佳发展。但即使在卡尔诺所设想的体制(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生产效果也将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人民来说，那种体制也只能同苏联官僚体制一样带来完全相同的后果。

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在长期内不会改变的劳动条件和消费条件的基础上肯定会发生特殊的利益矛盾，它不可能借助于中央计划活动和监察活动得到解决，但可以在宏观经济的方向性计划管理中利用社会主义的有调节的市场关系加以解决。关于这种特殊的利益矛盾的认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理论发展中最大的进步之一。谁若象卡尔诺那样完全忽视这个利益问题，并甚至认为

捷克的改革发展没有带来什么新的理论观点①，那么，他实际上又退回到列宁时代对经济利益简单化理解的理论水平上去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列宁或是他的继承人都未能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和必须利用物质刺激的问题。事实上，所有的企业集体及其管理机关都必须根据他们为社会提供的劳动和创造的使用价值付酬，而这一点如果没有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列宁没有能看到这一点，而今天党机关中的代表人物既不能也不愿意认识这一点。因为他们最坚实的支柱——庞大的和拥有领导和统治权力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关，就成为多余的了。

只有官僚才会相信可以通过精神号召促使企业集体及其领导机关去进行最合适的生产活动。形式化的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充分反映在那些维护官僚制的理论家们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日益经常出现的强调精神作用的论文之中，它既没有较深刻地理解精神本身、它的实质、产生过程及其影响范围，也不会明白社会利益与企业的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的性质②。官僚们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有损于社会的、效率低下的生产活动的真正原因，事实上，他们主观上也想去找真正的原因。这一点清楚地反映为：官僚们经常把一切经济失误的原因说成是劳动者"缺乏社会主义精神"，似乎企业中有了另一种"精神"：首先就可以始终认识到什么是最适当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改革；其次，违反企业集体经济利益的生产活动也能收效。官僚们可以摆出一副架势指责人民"缺乏社会主义精神"，但没有一个官僚能说出一个企业的最佳生产应是什么样。他们也不可能了解正是这种中央计划阻碍了生产的最佳化。

只有那些处于市场关系中的企业，如果它们想在竞争对手的

---

① A·卡尔诺关于捷克的理论发展完全无知。他把捷克的理论与利别尔曼的理论看成完全一样，认为它与波兰五十年代的发展相比，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既然要作出如此大胆的结论，那么他至少应深入了解一下这些理论。

②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M·兰德威的文章：《社会主义道德的产生和发展》。（载于1975年7月17日《红色权利报》。）

面前，在自由市场价格条件下取得尽可能高的收入，就会被迫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以尽可能小的投入争取较高的产出，以及按照需求来调整生产结构，争取最佳的产销成果。这样的企业要想提高工资和奖金，只有完全靠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靠向上提供歪曲了的情报，或是完全片面地只追求数量上的增产以及靠改动结构造成完成计划的假象。只要掌握实权的共产党官僚禁止社会主义市场条件的存在，官僚主义的中央机构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利益矛盾就不会从社会上消除掉，以及与此一并存在的歪曲情报、文件泛滥成灾和经济损失日益增大等现象就不会消失。日益严重的不平衡、供应上的缺口、生产中断、不对路产品的积压、质量下降、基建项目不能按期完工、成本增高以及劳动生产率下降等等，这一切都使党内出现埋怨和批评，使人民中的不稳定因素扩大。这时，党的领导机构就会开始对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提出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不可能指出具体的负责人姓名，以及存在于体制内的原因，取代它的是宣布管理机构的重新改组，并指望以此来解决困难。

共产党国家里，这似乎是一项特殊的研究课题，一会儿决定对所有行政机构进行改组，把各个行业的主管部合并，但过两、三年后又分开，一些新的部建立了，但接着又取消；把托拉斯组织改变为各个不同的总管理局，然后又重新组成总经理处；集中转化为分权化，接着又转向集权化；单个企业合并为联合企业，过两三年后又独立分散开；各个政府部的作用时而加强，时而又削弱，过两三年后又重新加强，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反复。

例如：在捷克，一九五三年一月采用了苏联的领导体制，政府的部骤增。总经理处被取消了，在各部的下面成立了管理总局。企业权限受到很大削弱，尤其在斯洛伐克地区，权限受到更大的限制，因为管理总局设在布拉格。但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又废除了总局，取代它的是生产经济联合公司以及共同的经理处（类似总经理处）。一九六二年，诺沃提尼把经济困难的责任归咎于生

产经济联合公司，并通过政府的部来限制公司的独立性。一九六五年又缩小了主管经济的各个部的权限，并建立了以托拉斯或康采恩为形式的联合企业。一九七二年又重新加强政府各部的作用，并建立起三级管理体制：部、托拉斯或同行业企业管理机关和企业。

当赫鲁晓夫废除各专业部和建立地方经济委员会时，他竟忘记了“一件小事”，即忘记废除指令性计划和建立市场经济关系。中央计划机关仍继续负责制定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调整全国的所有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但是作为各种企业的传动体的部却被取消了。因此，计划机关不得不与地方经济委员会下面的许多产业部门进行合作，以调整全国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计划机关要完成这种徒劳无益的工作，只有靠扩大其本身的专业部门，它们就会逐渐变大，成为一个小的专业部。赫鲁晓夫对此甚为不满，他刚把各部的官僚赶出莫斯科，但在莫斯科新的机构又重新建立起来了。他打算对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实行分权化。当他还打算把党的机构分成负责工业和农业的两个机关时，不仅国家机构的官僚，而且连党机构的官僚都感到赫鲁晓夫的存在太过危险了，他终于不得不为此而垮台。就这样，党机构的代表勃列日涅夫和计划机关的官僚代表柯西金在这些重要的官僚势力的支持下变成了赫鲁晓夫的继承人。

后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重新恢复各个工业部时说：“近年来，出现了这种不足现象，即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缓慢，生产基金和投资效率低。如果我们对此不采取批评措施……那么，我们的增产运动将不能取得更多的成绩。……为了改善工业部门的管理和促进学术科学的进步，必须创立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制以及共和国部长会议制。这些机关应负责有关部门的工作以及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满足国家对工业产品的要求。”①

① L·勃列日涅夫：《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

当时之所以重新恢复各个部，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尽管今天人们批评的还是劳动生产率和效率低下，但它却成为新的分权化的理由。新的分权化就是：建立联合工业企业（大企业联合）。部的某些职权又重新被转移，转到企业联合公司，目的是希望以此促进技术发展和提高经济效果。

但是，各部仍将继续存在，因为它们是指令性计划体制中把中央的任务分派到各个生产部门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组织。它们对各个生产部门的公司和企业的活动拥有决定权。如果没有这个决定权，就无法调整各个行业的活动。只有当各个产业部门内的企业通过市场而相互联系，并以此调整生产活动时，作为调整者的各个专业部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是，各专业部门的这种最重要的调整活动却往往为各个部的官僚们的本位利益所干扰。在各个机关（也包括各个部）的官僚中出现了特殊的集团利益（我们把它称之为本位利益），它表现为努力优先完成自己的任务，即使其他部门和别的部将因此而不能完成任务也在所不惜，因为这与自己的晋升和提薪等有关。因此，这种集团利益将阻碍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真正的协调化。

各部只注意使自己的部门完成计划，而完成计划的方法和方式则不是重要的。简言之，各部都在努力为自己争取优先的投资，争取获得更多的原料、劳力和其他物资，不惜牺牲别的部门的供给，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更容易完成自己的计划，甚至允许下属企业降低质量和忽视技术革新。尽管其他部门指责它们提供的产品质量低下，它们也置之不理。因为官僚们和它的最高代表，各部部长，只关心他们自己的成就，所以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无疑，这种利己的本位利益是一切调整活动的大敌。这种行为不仅不能使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在客观上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活动得到协调，相反却加深了它们的分裂和矛盾。市场通过对企业盈亏的压力迫使企业尽可能尊重顾客的利益，而那种“有意识的”

对供应者和顾客相互关系的协调，实际上却导致这些关系中的矛盾空前加剧。

虽然这种本位利益和本位主义的态度不断受到了批评，人们还试图通过反复的改组来克服这种弊端，但是，如果人们继续在指令性的计划体制下保持官僚们领导地位和具有决定性的活动，那么便不可能改变和消除这些官僚们的本位利益（而且这只不过是官僚利益的一个具体表现）。任何组织上的变动和反复改组都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少不能取代由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竞争而引起的经济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但是，党的官僚是不允许实行那种能导致企业获得真正独立自主权的体制改革的，因为这种改革势必将导致中央监督和控制权的废除。一旦企业活动以及企业经理和其他负责干部的任命不再听命于企业的上级机关，从而也不再从属于党的机构，那么，这些机构的权力地位也就完结了。因此，任何改革的意图和改革活动（它在苏联体制的历史上不断出现）都遭到镇压和诽谤。凡认为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是必要的、是不可代替的，因此而主张实现市场关系的改革思想，一律遭到官僚们的猛烈攻击，被咒骂为“反革命”思想，并最终遭到扼杀①。

---

① 攻击改革思想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那些非经济学家们，他们对市场机制完全无知，并把它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而简单地加以拒绝。他们作为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把市场看作异端，从而获得了官僚们所赐予的桂冠。人们只要听听J·海耶克（捷克机关刊物《创造》主编）言之无物的废话就足够了。他说：“在这方面，希克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他崇拜市场，并把它加以绝对化，似乎市场这个东西，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是不容进行科学探讨的，似乎它的最重要的发展倾向是不可能控制的。”（J·海耶克：《是民主化，还是解体?》。）

一句话中居然能包含这么多的胡说八道！一个人就不应写那些他根本不懂的东西！海耶克知道市场在社会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吗？难道他真的相信这个作用可以靠指令性的计划来代替吗？难道对他来说，市场只有一种后期资本主义的形式吗？或者他作为辩证法的信奉者难道认为：存在了上千年的市场，其最一般的本质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不可能以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方式来体现吗？难道他因此不相信在社会主义中，有可能存在一种与资本主义市场有很大不同的特殊市场吗？他是否了解，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市场的基本职能受到了压制，因此根本谈不上“进行科学的探讨和控制其发展倾向”，他是否不知道，改革者争取的正是一种“有调节的市场”，正是要利用这种市场的积极的社会作用，使整个市场的发展服从于宏观计划目标，并依靠特殊的经济政策手段限制市场的消极影响。难道要批判某种理论的人，不应首先熟悉那个理论吗？

苏联、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改革者们在各个时期提出和发表的实事求是的论述，一个都没有在党的报告和党的正式报刊上发表过，党的官僚只是把这些议论打上“资产阶级的背叛”、“复辟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等烙印。这无疑是官僚权势利益的表现。党的机关刊物从来不敢分析，为什么生产结构长期同需求结构发生严重矛盾的问题。五十年代以来，他们只是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企业领导缺乏社会主义道德”和“党对生产监督得不够”等等，并不断地向企业领导和劳动人民发出呼吁，要他们提高社会主义道德观念。

为什么党的官僚可以长期压制一切社会经验和合理的设想呢？为什么数十年来官僚主义体制的绝对统治能得以维持，而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忽视呢？为什么作为异化了的特权阶层却能实现对全体人民的统治呢？这些正是共产主义权力体系的机制部分所要回答的问题。

四、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的机制

党的领导作用

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被理解为：共产党组织及其机关决定一切社会领域、组织机构、企业、协会和工会等公众活动的发展。由于宪法肯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正式地把一个政党变成一个领导和控制一切公众生活的最高国家组织①。过去人们只简单地把党的权力地位作为一种现实来接受，而现在却通过这种方式使之合法化。现在，在这种合法化的基础上，任何对党的攻击，都被看作是反对国家的行动。

由于人们给党的领导作用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党不仅在决定原则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目标方面起定调的作用，而且还要指挥全部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这种党的领导作用就不可能由普通党员或普通党员的会议来担负，而只能由高度组织起来的官僚集团来发挥作用。同时，为了起这样的作用，就必须有一个按等级制建立起来的机关，它由企业、县、区、州各级书记处以及作为官僚组织最高权力机关的整个联盟的中央书记处所组成。这些书记处的工作人员有数千人，较大的州书记处工作人员甚至上万人。这些书记处的管理干部，由上一级的官员选拔、任命和支配。县一级书记任命企业的书记，而自己本身的职务由地区一级书记任命，地区书记最后由中央书记处任命。

---

① 在捷克宪法第二章第四项中有如下规定："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队伍中最积极的、最有觉悟的居民所组成的自愿的战斗的结合体。"

在党的机构中设有各种专门的部，负责所有重要的社会部门（经济、军事、公安、司法、教育、文化、卫生、社会、科学、体育、宣传、情报和群众组织等）的活动。各个专门部设有专职部长，在这同时又由一个书记负责若干专门部的工作。不仅整个书记处归第一书记（多数称作总书记）领导，而且各个最重要的部，如组织部、军事与公安部等等也直接受总书记领导。这些部的任务，就是监督它所属部门的活动，并与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取得联系，起草本部门的工作报告，了解所属工作人员的情况和任命新的干部，不断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困难和新的发展因素，在必要时提出重要的改革方案。中央书记处的各个部长，比国家的正式部长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这些政府部长在处理一切重要事务时，都必须预先同他们商量，并取得他们的同意。

书记有时也形成集体的领导机构，但以第一书记为首（不仅是中央，各地方和各地区都一样）。尽管所有的书记都从属于"被选出来的"党的机构，但其实这没有多大意义。形式上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决定党的政策总路线；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接着，从中央委员会成员中选出政治局（党的理事会、执行局或主席团）①，并同时任命第一书记。政治局在各次中央全会之间（一般约为三个月）领导党的工作，准备工作报告，执行中央全会的决议。政治局的人数虽然不尽相同（由十至二十名成员组成），但均由党的最有权力的干部所组成，他们均有一个重要的机关（党的机关、政府各部、军队、安全机构和工会等）作后盾。因此可以说，政治局是由官僚中的最高代表所组成。但是，党的机关在政治局中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下面将进一步叙述）。事实上，一切意见和决定都是由第一书记形成和确立的，因此，选举和投票并没有多大价值。

① 尽管各个共产党采用了不同的名称，为方便起见，下面我一律称它为"政治局"。

在斯大林掌权以前(更确切地说，在他把反对派劲敌清除之前)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和党代表大会上，还是可以进行真正的争论和真正的表决。但斯大林执政以后，党内控制逐渐加强，这种控制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至今仍未全部消除，并已成为斯大林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由其他书记和政治局通过政变来解除第一书记职务的例子是为数并不多的(如赫鲁晓夫的下台)。除这种少数的例子外，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和党代表大会上，早已不存在真正的反对派了。人们对书记处事先准备的、提交讨论的一切资料、建议和决议(大部分为第一书记提出的)都只是作一些修辞性的、或一些细小的补充和修改，几乎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便全体一致鼓掌通过了。这当然并非意味着官僚机关提出的各种方案无任何可指责之处，或者提不出任何更符合人民利益的其他方案。唯一真实的解释是：由党的机关"挑选出来的"党的机构的全体成员均具有彻底的依附性。他们不敢采取反对党的机关的态度。全体党员从过去的经验中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如果采取这种态度，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党的机关及其最强有力的代表——书记们，对全体党员、"被选出的机构"、党外的所有机构和组织的控制，基本上通过三种办法：

一、干部政策；

二、镇压和贿赂体系；

三、意识形态的垄断。

干部政策

"党的机关一经建立，它就发展成为一个自我再生产的有组织的体系。新接收的党员，必须在利害关系上与大家处于同一立场，并且要具有必要的意识形态武装。"追求个人前途和权力，这是党

的官僚普遍具有的特点，这些必须按一般的活动规则把它隐瞒起来。在外表上要显得完全服从党的理想和事业，要显得完全符合直属上级或再上面的上级官员所提的要求。但是党的机关的活动，却有其自己的官僚主义的规则。干部晋升的先决条件不是独立思考、批判态度和对人民不满情绪的理解，而是对党的指示唯命是从和不论何时都公开维护党的指示的觉悟。要具有及时识别政治“风向”、善于支持“正确的”（准会高升的）人物的敏感性，要具有经常显示自己的“谦虚”和“毫无利己之心”的才能，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向上级显示可靠性和向上级汇报有关他们的敌人的言行的才能。这些就是能尽快爬上领导干部地位的最可靠的条件，也是最可靠的行动方式。

选拔干部有这么一个习惯，即最初为党的机构所录用、然后晋升、最后被选拔到最重要的岗位。但这一活动总是由上级官员（部长、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来开始的，他们提出建议，然后被贯彻执行。但是对这些官员来讲，由于他们没有一个人不在考虑自己的发迹，所以干部的选拔和录用（干部政策）本身，同时也是对自己发迹机会具有最大影响的方法。每一个官员选拔的干部越多，而且都是些比较可靠的、忠于个人的、以及将来可能成为有影响的重要干部，那么，他本人夺取政治权力和扩张权势的机会也就越大。所以干部政策不仅是整个党机构进行再生产和扩大权势力量的决定性手段，而且也是官员们互相进行不间断的个人权力斗争的最重要的工具。

官僚主义的党机关，对外是很一致的，即在“缺乏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大众面前表现很为统一，可是各个“职业革命家”在为各自的权力而奋斗时，又是完全不统一的。但这里涉及的不只是在各种政党中都存在的个人政治野心和机会主义，而且关系到一种权势斗争，它同以意识形态为根据的“不断激化的阶级斗争”一样无情和残酷。在党内搞间谍活动、收集他人的“错误”思想和反共行为

的材料，大搞告密和阴谋活动、排除个人的政敌，为抹杀过去领导人的影响而演出公审闹剧、悄悄地“清除”那些特别知名的人物，所有这些方法，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它在民主主义国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党的最高机关的官员相互间的关系是很难描绘的。互相害怕、猜疑、紧张、伪装、戒备达到了顶点，这些干部的彻底自我异化已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任何人的头上都挂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每时每刻都怕被别人视为政治上的背离者。为此，大家只能以自己的权势去压倒他人。只有先证明他人是政治上的背离者，才能对付别人对自己的类似指责，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胜利者！不断的、掩盖着的权力之争，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以免陷入少数派境地，以及不失时机地揭露“第一书记”或者其他权势人物以夺取主动权的企图——这一切则酿成一种奇异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只有那些丧失天良和极端无情的官僚才能站得住脚，才能前进。

总之，他们必须熟练地掌握干部政策。为什么诺沃提尼这样一个缺少文化的、连一个简单的发言不事先写在纸上就讲不清楚的人① 能多年呆在捷克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宝座上？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即巧妙地掌握了必要的干部政策。

未来的干部选拔，是从党的最基层组织，甚至从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的。

所有区党委书记处都拥有众多的积极分子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从而可以通过不断地观察基层组织的活动和争论，观察每个党员的行为表现，掌握有关干部的尽可能具体的全貌。在不断进行的干部情况登记中，收集了有关党员的重要情报，从而在必要时可随时使用这材料。在这方面，首先注意的是各个党员的政治“可靠

---

① 诺沃提尼在他临死之前所举行的七十寿辰私人小型宴会上关于自我批评问题，他认为“批评自己的行动，这在理智方面并非有什么充分根据，但将它坦白地讲出来这是自尊心太强的表现。”

性”,行动上是否顺从和是否积极工作。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方面有没有发展前途，他们给部长或中央书记本人留下的印象如何,而一般所说的品德,早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谁若表现积极,并显得具有当干部的素质,他就很可能被派到专门的党校去学习,以便在那里接受必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训练,并再次考核他的资格。这一学习体制是：区党校一个月,专区或中央党校半年至一年。最高教育学府是学制为四年的高级党校,它与普通高等学校相类似。在那里完成了理论论文后也有获得“政治学候补博士”头衔(类似西方的博士学位)的机会。未来的中央干部首先将从高级党校毕业生和科学候补博士中选拔。从这里为党中央机构、其他群众组织的中央机关及各部门(工会、青年组织、国家机关、军队、警察、言论机关以及经济部门等)招募未来的工作人员。

干部政策以及党官僚的利益和意志的贯彻执行不得不经常用民主的外衣来加以掩饰。不论是对普通党员，还是对无党派的群众,总是力图给他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一切决定都是由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作出的。但这一切在人民思想中早已成为一场滑稽戏。尽管如此,官僚们还硬说是坚持了“民主的”选举程序,这只能是官僚们所独有的许多谬论之一。

为各种“假民主的”决议作准备并操纵决定过程，这是党机关的最重要的任务。必须在干部档案卡片的基础上,在全体积极分子的协助之下为基层委员会的选举,为区代表大会、专区代表大会以及全党代表大会在干部问题上和议题方面作准备。特别重要的是要选出“最可靠”、“最热心”,尤其是“守纪律”的人作为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基层组织的举手表决开始就是形式主义的,它们只是根据专区党委书记挑选的、由积极分子提出的建议,选出区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般没有反提案。这不仅因为一般党员怕被看作是反对派，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作为单个的人反对由上面提出的附有充分理由的干部提案,说得更确切一些,他们事先也不能有组

织地联合起来，提出一个反对提案（任何微小的集体行动，都可以被当作组织宗派而予以严惩）。尽管人们经常要求基层组织发挥积极性，但又不允许发表“错误”意见和反对“党的路线”。中央委员会对敢于发表反对派政见的基层组织甚至不惜将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开除出党。大多数普通党员由于知道党机关是怎样操纵意见的形成和选举活动的，所以他们就形成了那种漠不关心和消极的态度。

因为有这样的机制和选出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唯命是从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持反对意见的代表或独立思考者的威胁，更不用说反对派集团的威胁（这一点在那些还没有掌握政权、但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机关的政党，也能发挥有效的作用）。上一届党领导或者说党中央机构准备了各种决议和决定的草案，并为新机构的选举准备了候选人名单，其目的就是为了能选出一个完全顺从的新中央委员会。党代表大会的讨论也事先作了周密的准备，通过专区书记和专区的代表团（一般由专区第一书记负责）作了周密的布置。虽然准备了很多大会发言（包括许多外国来宾和官方发言人的祝辞），但也难说在讨论过程中不会有谁发表攻击性言论，从而破坏精心安排的庆祝活动的推行。实际上，连一个能在政治方面有所影响的发言也没有。在讨论中人们无权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采取统一行动，如果单个的人想同组织得最好最坚强的党机构的统一见解相对抗，那么，这样的讨论注定要遭到失败。

党代表大会的时限是事先规定好的，它必须具有欢庆的性质，加上官僚们在幕后一一进行操纵——这样，党代表大会就完全变成了形式。所有为“选举”准备的候选人名单，代表们在事前不可能进行研究，更不用说有组织地提出相对立的候选人。所以，党代表大会实际上不是批准纲领和政治路线，而是将党机构和上一届政治局所准备的东西无反抗地承认下来。党代表大会并不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只是被动地接受符合党机构利益的、能保证继承旧

权力体系的候选人。这确实可以说是一种能不断再生产维持旧体制权力阶层的绝妙机制,尽管这个阶层的个别成员时而有所更换,但这只是党的顶层人物个人权力之争的结果，而不是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更换的。

当然,这种由党的机关准备干部、选拔干部和提出候选人的制度也被运用于国家机关、经济部门以及其他各部门任命重要领导人方面。有所谓干部花名册这样个东西,它严格规定了什么样的职务应由哪一级党的机关来配备,什么样职务应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处各部、州委员会、专区委员会以及它们的书记处来配备,这些都有详细的规定①。

干部的提名——按正式规定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书记处来批准。但这只是形式上由中央委员会举手通过，而实际上是由党机关来决定。在政治局,每个委员都可能有不同的干部提名,因为干部政策是那些想把第一书记职务弄到手的潜在的野心家们的暗中权力斗争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但即使在这方面，最有力的能起最积极作用的仍然是党的中央机关。因为党中央机关掌握着不断更新的错综复杂的情报和干部档案。为此，比起其他政治局委员来,书记处,特别是第一书记居于优越的地位。当然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会借助他们自己机关的情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利用巧妙的战术强行贯彻他们的建议。

由于干部问题是牟取权力的最重要的工具，它变成了政治局委员最关心的政治活动。他们每一个人，都给他们的个人的权力

① 根据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布拉格)所提供的资料，由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机关批准的干部职务数如下:

机　关	职务数	机　关	职务数
党中央委员会(批准)	541	中央书记处(批准)	2499
政治局(批准)	837	各部(同意)	5059

利益加上“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的伪装。实际上，在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权力斗争中，最大的政治艺术之一就是选拔和提升这样一些干部，他们虽然能忠实于某领导人，但他们并不是异乎寻常的优秀干部，因此也不可能很快地超过他们的保护人而独立自处①。这一干部——权力问题占去了政治局委员绝大部分时间，从而很难对政治、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等。此外，还有大量行政性问题要解决，这样，就完全无法把注意力用于解决国家问题、全社会的问题②。向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资料、报告和提案大部分是中央书记处准备的，但是这一类文书的数量特别庞大，以致政治局委员经常无法全部过目，更不用说对其进行研究，与专家详细商量和选择合适方案。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甚至在会议上所宣读的有关材料的批注和补充都令他们的机关给准备。就这样，大部分的国家重大决议由这个决策机构经过形式上的讨论之后决定了，这实际上等于由一个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来决定一切③。

其次，政治“代表人物”对日益复杂的经济、政治问题懂得越

---

① “事实是：人们感到对自已有较大约束的不是选举自已的人民，而是他们任职单位的领导人和机构。这证明，缺乏长期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才能锻炼，说明在党、党员和党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中加入了一种生存上的和物质上的依附关系，说明对一个人的真正品德和才能不作全面的评价就可将其由一个职务调到另一个职务。”（摘自一九六八年捷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布拉格——的基础资料第 24 页。）

② “对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情况的调查表明，许多在性质上不属于政治局的问题，即应由党和国家及其中央机关的负责人解决的行政工作，不适当地花费了政治局的很大精力。对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间政治局所处理的问题和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所处理的总数为四百八十件的政治问题中，属于原则性的问题仅三十二件，其他四百四十八件完全属于行政性问题”（所据资料同上。）

③ “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往往是照老公式套下来的，不去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竟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工作人员就是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无论就任何一个问题发言时都是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H·C·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6年2月26日，莫斯科。）

只是我们在今天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从那时以来，在共产党的实践中有哪些变化呢？”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是否揭示了官僚主义化的普遍性的和长期有效的根源？或者说，在其后的十年之间，只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人民是否满足？

少，在决策过程过于集中化的情况下越不能处理好各种问题和大量的情报，从而越不能抛开由官僚机构准备的错误百出的不署名的决定，那么，他们就越发把注意力转向了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方面，以便在犯了大量错误时不致失掉自己的地位。所谓成功的政治家或者登上了金字塔顶端的干部们，决不是因为他们具有解决问题或者说明问题的专门天资和能力，也不是因为人民喜欢他们。而是由于他们具有一种特别成问题的政治特性。只有那些长期能迎合最有权威的首长的人，那些会欺骗人民、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牺牲一切的人，那些能对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敌采取断然态度（通常称为"阶级立场"）的人，才能在政治方面飞黄腾达，才有可能晋升到最高职位。正是这种能力和特性被评价为坚定地、不妥协地保卫社会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地显露自己的感情，就会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的多情善感的人而加以处理。

利用别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其方法有各种各样。例如把一些不称职或知识不足的人推荐到许多吸引人的领导岗位上去，或者使他们能保持住地位，于是这些人就会依附于使他们能担任这种职务或保住自己地位的人。确实，这些人往往变成了完全心甘情愿的傀儡。又如，只要把那些竟敢与书记处书记和其他掌权者持不同看法的人撤换下来，就足以使许多其他人绝对服从。又例如，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官僚们之间的个人竞争，从而达到扩张自己权力的目的。人们甚至可以利用数不胜数的行政机关的改组（政府各部的合并和分开），新任命一些人担任某些职务，或者相反，使某些人离开其职位。人们利用这些方法，使官员们整天处于神经过敏之中，使之产生竞争心和服从心理。

在干部选拔中，经常以权势和对上级的服从、一致性和忠心为标准，这种自上而下的，直至工厂和农村的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必然导致领导水平的下降，使领导班子的水平普遍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即机会主义的适应性和无原则性成了个人行动的指南。功

利主义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态。能晋升的不是那些有独创性、革命性和独立思考的人，相反，而是那些小心谨慎、永世唯唯诺诺、死气沉沉的命令执行者、权威崇拜者、形式上完成任务的人。在对上的报告中只写掌权者喜欢听的东西，回避那些不愿知道的东西，这些伎俩，逐渐破坏了情报系统，从而使最高领导不再能了解人民的情绪和意见，更加沉醉于自己的主观想象和幻想之中。

同党内一样，其它地方也都是用"民主"选举的面纱掩盖着对干部产生的操纵。党的书记处为乡、县、专区、州和中央机关的"选举"挑选候选人，并通过有关机构把他们列入候选人名单。例如在有民族阵线和形式上有其他政党存在的国家，共产党组织就在这些党派（有时也在"无党派人士"）中找出可靠的适应性强的代表，然后在取得这些党派和"民族阵线"办事处的"同意"下将他们列入候选人名单。这些"党派"的全部政治活动，都要受到民族阵线书记处（它事实上由共产党机关的官僚所把持）的监视、领导和控制。这些政党若想实行自己的独立政策，或想成为反对党，那么，这种努力必将被视为反共活动而立即被清算。

其次，人民在隆重的和大肆宣染的"选举"中，只能接受所提出来的候选人。从较多的由各种独立组织推荐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虽然人们在形式上可以划去某些候选人，同时写上其他的名字，但这不能叫作真正的选举，因为选民在事前既没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也不可能有组织地提出相对立的候选人。仅划去某些候选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除常任官员（这也是由党机构慎重选拔出来的）外无法对真正的选举过程进行监督。而且整个选举活动又由众多的特务监视着。选民由于对选举结果已一清二楚，从而不愿利用这种形式上划去某些候选人的机会，而宁愿按候选人名单，不作修改地将选票投入票箱完事。这样，在"自由"选举中，被提名的候选人的得票率甚至可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被说成是"人民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统一"的表现。

被选出的代表们，当然要使党的纲领在全苏联付诸实施。为了使党制订的纲领作为具体的方针付诸实施，代表们被委托制订在这方面所需要的各种法律。一切立法活动都具有使党的决议和党机构各部门所发出的指示合法化的性质，从而使所有苏维埃代表或委员会都不得违犯。代表同选民的接触首先带有宣传鼓动的性质。因为这种接触是为了动员集聚在一起的人们去完成计划，是为了改进生产。代表们知道，他们丝毫不能改变选民生活中的本质东西，不能改变体制内部的缺陷和长期不能发挥机能作用的情况。这一点，选民也完全明白。

在这样的集会上如果选民有勇气提出例如粮食不够、商品缺乏、住宅等等不满事项，代表们最多只能将这些批评转告给有关企业和其他机构。代表们也许能致力于个别的改善，但无法克服导致缺陷不断反复出现的根源。

例如H·B·波德戈尔内曾在某次选举谈话中说过要“扩大民主”。他说：“选民们曾向未来的代表们提出过各种各样托付事项”，而且“在过去四年间在约定要给予解决的一百七十万件托付事项中，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万件由苏维埃解决了”①，这完全是蛊惑宣传。但他没有说，这些要求或托付是怎样付诸施行的。以及做了哪些事，以便使人们无需再提出对质量低劣、供应紧张、官僚主义拖拉和刁难、农业机器补充零件和修理能力缺乏等批评②。

只要代表被看作是“不满的收集家”或者“邮递员”，而不能提出原则性的政治问题，不能查明不合理现象重复产生的根源，不能批评政治领导部门，那么，整个民主充其量也只能是形式上的

① H·B·波德戈尔内的讲话。（见《真理报》1975年6月13日。）

② 例如集体农庄的庄员们每年都对未修理的机械和在收获季节机械不足进行抱怨。例如，据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消息报》报道，农业机械用在生产方面不超过其全工作时间的百分之四十八，其他时间是等待修理和因驾驶员不足而停放着。代表们对这些抱怨和批评应当怎么办呢？追究农业机械厂的责任，是否就意味着解决了问题？事后对机械进行了修理，是否就可以说代表解决了选民对自已的委托？

民主。负责选择未来代表的党机关，关心的是代表们，不要想不到这些问题，不要试图挣脱束缚精神病患者的这种囚衣，而只甘心当一个“邮递员”。同其他所有公职一样，对苏维埃代表（不管是最高苏维埃还是乡苏维埃）职务，也要寻找这样的积极分子或相同意见的人来担任，他们完全承认“党的领导作用”，并乐于接受领导。

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就是以这样的干部政策将党的支持者和顺从的积极分子安插到一切重要岗位上，并借助于这些人来统治全国人民。那么，为什么人民对这种操纵和监视不进行自卫，对共产党官僚不予推翻？关于这些问题可以从共产党政权统治的另一个工具中得到答复。

镇压和贿赂

这里所涉及的早已不再是对“剥削阶级”分子的镇压问题，他在苏联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就是在其他东方集团国家，他们也已经变成了绝望的、完全无权的、无影响的老人了。现在的问题是，镇压那些不甘愿服从现体制、违抗党的官僚的意志和愿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批评和表示不满、甚至试图消极抵制或积极抵抗的人。因此，这里首先涉及的是镇压劳动阶层的成员，但正是为了使他们从各种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才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而今天，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主要对象却是工人①，这一事实，可

①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正式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九人中被逮捕和枪决（主要是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有九十八人，即占百分之七十。……大家知道，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成员的百分之八十有表决权的代表在十月革命前的地下工作时期和在一九二一年的内战时期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其中百分之六十有表决权）”。（H·C·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在捷克也同样，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期间由于“反国家活动”而被逮捕的人之中，大部分是工人出身。

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期间由于“反国家活动”而被判决的一万一千零二十六名中，有三千四百八十八名即百分之三十一点六是工人。在同年被国家公安警察逮捕的一万六千零十名之中，有五千九百六十二名是工人，比任何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出身的人都多（J·贝里康著《镇压的记录》。）

看作是对历史的一种嘲弄。马克思关于随着剥削阶级的最后消灭，国家将消亡，社会事务将由人民共同管理这一预言早就不适用了。不仅如此，官僚机器以及所有镇压手段，即警察、法院、监狱和集中营等反而在逐年加强。

共产主义的镇压体制是历史上组织得最好和最充分地发挥其效能的镇压体制之一。比之其他极权主义镇压体制，它强大得好象钟表的构造一样，各种机件是互相衔接的，它可以用各种方法使各种各样的不满沉默下来，它是各种镇压方式的综合体。过去对持不同政见者所采取的行政镇压方法，今天在不同程度上仍在使用，从一般的审讯、威吓等警察手段，到对反国家活动进行诉讼和判处长期监禁，直到拷打和宣判死刑以威吓群众。对于在人民中享有威望而无法判处死刑的人，则宣布他有病，送进精神病院，在精神上折磨致死。对数以千计的人们乘夜雾茫茫之际驱逐出国外[①]，把受人民爱戴的人们暗杀掉，然后把这种暗杀嫁罪于“阶级敌人”，并用它来煽动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把所谓国家敌人的子女送进教养院或特别军营。在强制收容所或政治犯收容所中，被收容者从事残酷的重体力劳动，在饥饿、生病和处刑之下被折磨致死。斯大林的后继人和其他东方集团的首领们即使再不会象斯大林那样搞大规模恐怖活动和大规模屠杀，但上述镇压方法仍继续采用，只不过是没有象斯大林那样把它弄到耸人听闻的地步。这些镇压方法，不仅可使不受欢迎的反对派沉默下去，还可对数以万计的人们进行恫吓，从而达到限制反对派言行的效果。

尽管斯大林的镇压方法在苏共二十大上受到赫鲁晓夫的批判，尽管今天广泛散布说，它已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起得到了克服，但行政上的镇压还在继续，只是尽量给它披上合法的外衣。由于今天对“叛国”活动的宣判是根据可任意作解释的含义不清的法

① “由于几千人遭到大逮捕和流放，不经法院审理和宣判的死刑，扩大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的心情”（前述H·C·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律来决定的，由于所有政治诉讼中的起诉和批判是由听命于党的审判官在党的书记处商量之后决定的，由于这种审讯外国来宾以及外国记者几乎不准入内，所以，直到今天，所有法律程序仍然和斯大林时期相同，是有效的镇压工具①。

在所有东方集团国家里，共产党以外的政党的党员和抵制共产党专政的反对派成员几乎都受到清算或被迫保持沉默。共产党以外的公众，当然这是人民的绝大多数(例如在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九六八年，党员在人民之中也只占百分之十)，可称之为在政治上完全无权的公众，他们被关在政治活动的大门之外。只有一小撮盲目跟随共产党或者唯唯诺诺的非共产党人参加各种公开活动，受共产党的操纵，代表非共产党的人民以装饰门面，这些人的数量也只有那么一丁点。

这样，非共产党反对派不再可能合法地进行政治活动。只要稍稍从事一点地下的政治活动，哪怕是传布反对派的消息，也要遭到残酷镇压，受到严重的监禁刑罚。这就必然导致只有在共产党内部，才能形成反对派运动。它或多或少也变成了不赞成共产党官僚政策的非共产党的人民代表或代言人。这样一些小组，短时间内在党内还可以蒙混过去，还可以稍稍为各种改革和为自由化运动而斗争。但由于他们的要求大部分是与党的官僚根本对立，在党的官僚感到他们是危险分子的那一瞬间，就要象非共产党反对

---

① 能帮助说明东方集团各国有关政治审判和政治逮捕全貌的数字很难得到。在苏联的国际保卫人权委员会的咨询(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中载有很多有关今天苏联集中营的材料。在这个经过慎重调查研究所写出的报告中有下面一些数字——单从外表上来看，苏联法律没有政治犯。只举出一些所谓“特别危险的反国家罪犯”。

收容所为刑事“犯罪”分子的集中营，现在有一千个左右。集中营既收容政治犯，也收容普通犯人，所以在数字上很难区别开。每个集中营所收容的犯人数各不相同，平均每个集中营约为一千二百人。因此现在在集中营里所收容的犯人估计约在一百二十万人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占苏联人口百分之零点五的人生活在监狱之中(与此相对比，英国是百分之零点零七，法国是零点一六，美国是零点二)。从一九七二年以来，苏联对政治犯一次也没有大赦过。一九七一和一九七二年，在捷克因政治原因被捕和被判刑的人达三千以上。(J·贝里康著《捷克的社会主义反对派》。)

派一样被消灭。为了警告其他党员不要从事这种“危险”的党内反对派活动，这一运动的参加者将作为“最大的敌人予以揭露”，并处以重刑。尽管如此，在东方集团的共产党内依然有反对派、改革派小组，他们置一切风险于不顾，想尽种种办法为自由化、民主化而斗争着。这些小组几乎都是由普通党员所构成，但也经常有党的各种上级机关的成员参加。虽然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宣布为自己的目标，但认真对待这一目标的、并且继续与广大人民阶层保持联系的人，大部分是党内知识分子。一旦这些共产党员根据日常的亲身感受，认识到共产党上层官僚的言行严重不一致，认识到现体制给人民带来了不良后果，一旦在大吃一惊之后从过去的幻想中解放出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就会投身到绝望的为彻底改革体制的斗争中去。在东方集团中，有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曾不断地向本党权利机关及其官僚化的首脑发起进攻。他们以公开批评、组织小组、非法集团、绝望的叛乱和坚韧不拔的常年改革努力等方式不断发起进攻。而且每一次又都遭到由本党的官僚或者“社会主义”邻国党的官僚所组织的联合部队的残酷镇压。这些人的大部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或夺权斗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后来则被腐朽堕落的党的官僚所清洗①。

但是，镇压一切党内外抵抗运动的方法不只是采用行政镇压，还采用提起公诉、诽谤、制造丑闻以至打上敌人的烙印等破坏名誉的方式，最后还加上今天普遍采用的经济压迫手段。这种经济压迫的效用往往是其他镇压手段难以实现的，是共产党最拿手的伎俩之一。

---

① 一九六八年捷克共产党的党员为一百六十万人，到一九七〇年其中就有六十万人离开了党（有的脱党、有的被开除、有的取消了党籍）。其中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就有五十五万人。这个数字达到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党员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其中有一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入党的党员以及法国占领期间和一九四八年掌权以前入党的老党员。在战前入党的二万五千名党员之中尚留在捷克共产党内的仅八千名。参加过西班牙斗争的战士（原西班牙内战期间参加国际纵队的）五百名中，仅剩下了三十名！

公开扣上“敌人”的帽子，这是从斯大林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切有权力的人所惯用的压迫手段之一。在党的报告中、党报、广播和电视中给人戴上“人民的敌人”、“倾向分子”、“世界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帝国主义代理人”等帽子，确实是阻止类似事件发生的有效威吓手段。人人都知道对此无任何防御手段。因为依仗党的权力给别人扣帽子的人几乎不需要拿出什么证据，而被戴上帽子的人则不能将其反证公诸于世。人们知道，只要有一页告发信，他就别再想脱身，就会给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带来许多障碍和不利条件，他就会被所有的干部、官僚、特别是国家警察所怀疑和监视。他明白，被戴上帽子，这是以后采取行政措施的第一步。凡有如此遭遇的人，均被官僚机构视为在社会上已开始“死亡”的麻疯病人①。

经济压迫的范围很广，从工作上的百般刁难，到调换工作，调至劳动强度大的工作部门，从停止晋级到解雇。被解雇又不得申诉，其结果必定是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一切企业和设施都属于国家所有，各企业录用新职工时要根据原工作部门的人员介绍信，在这样的社会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被解雇，意味着对他终生的迫害。尽管他具有良好的劳动资格，但不得不干最卑贱、工资最低的劳动，几次三番地被解雇，只好没完没了地重复同一经验，经

---

① 著名的捷克哲学家卡雷尔·克西科于一九七五年五月给他的法国同行约翰—波尔·沙尔托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实际上我是二重存在。我不存在，但我又存在。我已经死去……，但我又活着。……在公民权和基本人权这方面我等于一个零。但当警察注意我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存在非同小可。简单来说，我什么也不是。所以我既不能在布拉格的卡尔斯大学教哲学，也不能在专门领域从事工作。我已经死亡，因此我不能应邀参加科学会议，不能应聘去欧洲的大学讲学。如同一个不复存在的、实际上就象从来就没存在过的人一样，我的出版物在捷克一概被禁止。就是到图书馆去也见不到我的出版物，在作者名簿上也没有我的名字。

我是不存在的，因此官署对我提出的指责或抗议认为不需要答复。但另一方面我又是存在的。这可用对我住宅的搜索和警察的讯问已逐步有组织地进行来证明。我作为哲学家和著作家的最基本的权利已被剥夺，但我又经常作为被告人和嫌疑犯在活着。”（引自1975年7月5日《证据》。）

常整月整月地徘徊在失业线上。与此同时，还不断生活在威胁之中，担心由于流浪而被逮捕，最后被关进强制收容所。因为长期无一定职业者，都被当作流浪汉来处理。

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开除出党，或者由于政治原因被判处有罪的人，其子女不得升大学①。这是在被称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进步体制”中进行的血统上的报复。实际上这是利用毁灭子女前途方法的一种镇压手段。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比加在自己肉体上的压迫更为残酷的镇压。

象这样范围广泛而又组织巧妙的镇压制度，它是由空前的特务制度配合的。全体党员如发现党的支持者、自己的邻居或其他人有“对党敌视”的言论，则有义务向党机关报告。假如进行此项特务活动的人即或只是一部分党员，那么这个情报网的规模也是相当庞大的。除了这些自愿的“意识形态”汇报人员外，在各个企业和工厂还有分布很广的由国家警察雇佣的情报人员。因为职工几乎不认识他们，所以他们比大家都知道的共产党积极分子更少受职工们的注意。在东方集团国家，看门的人也起着警察的情报提供人的作用。他们必须定期向警察汇报那里各住户的行动、思想、来访者以及交往等情况。在节庆活动日即或没按规定时间在窗子口上悬挂国旗，由于关系不好的看门人的告密，因而家人不为社会所信任的事例也不少。

国家警察拥有庞大的机构、范围广泛的情报网、最新式的窃听监视手段、不管什么样的微不足道的疑问在所收集的人员卡片和

① 在捷克，被捷克共产党除名的所有人的名字都被列入了一份长名单中，被秘密地分送给了各大学。被记在上面的人的子女，不准进入任何大学。此外，还制订有严格的一般标准，孩子们只能按照下面的等级顺序入大学。

1. 学生本人是捷克共产党党员；
2. 父母双方都是捷共党员的家庭的子女；
3. 政治上表现积极的家庭的子女；
4. 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子女；
5. 家族成员中有一名是捷共党员的家庭的子女。

情报上都记得一清二楚，有绝妙的侦讯手段、最现代化的精神和肉体镇压手段，这样它就变成了最重要的行政镇压中心。它的权力，随着它所拥有的手段和情报在逐渐扩大，在追究思想方面的异端分子方面，远远超过了作为党的官僚体制的工具的范围。国家警察经常掌握有主动权，在怀疑、逮捕和检举方面走在前面，有时甚至检举党机构有权势的人，使之丢失原来的地位，以至丧失生命。他们靠给人以恐怖为生，他们故意制造恐怖，并凭借恐怖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地位。他们将自己的权力地位扩大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使法院和律师变成了应声虫，由于他们能搜罗将人置于危境的材料，所以甚至经常可使党的最高级官员屈服于政治的压力之下①。由于存在这种镇压和特务制度，使得东方集团各国的公民经常处于不安和恐怖之中②，这又导致了小心翼翼地发表意见、自我检查、假装老实和阿谀奉承。很多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学会了过双

---

①“……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合法性遭到了蹂躏。……军事机关特别是公安警察的权力和地位不加限制地被放纵。这些机关，对一切事件都使用权力来使之屈服。这个“蜘蛛网”覆盖着法院和检察院。它使得自古以来法的尊严和使命完全丧失。这些机关完全处于公安警察的管治之下，并依附于它。法院已没有反驳权，根本谈不到合法性”（A·杜布切克给“联邦议会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信——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载于1975年4月3日《证据》。）

②“教师担心失掉自已的地位，在学校讲授连他自已都不相信的东西。学生出于对自已未来的担心而重复这一切。年轻人出于不再能上学的担心，而加入青年团，并按那里的要求行事。在升学考试时由于有奇怪的政治分数制度，担心自已的儿子或姑娘得不了满分，父亲承担各种作业，只要子女提出要求，什么都可根据自已的“自由允解”作出来。人们担心不去怕落个什么不祥结局，于是去参加选举，选举被指定的候选人，参加这种仪式要象所想象的真正选举一样来行动。他们担心自已的生存、地位或将来的发迹受到影响，于是出席集会，对被推荐的所有人都投赞成票，或者起码默不作声。他们由于心里老是提心吊胆，所以作屈辱的自我批评，发表忏悔性声明，在屈辱性的征询意见书上违心地进行添写。担心人们又在暗示谁，所以不公开表态，就是在自已人范围内，也经常有不发表真实意见的时候。自已生活上有什么不法行为、自已的地位上升或者由于担心是否取得了上级机关的喜欢，工人和职员们只报告自已应做的劳动量并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竞赛集团。但他们也知道，这些只能被别人充分用作向上级报告时的内容。由于惶恐不安，人人都去参加各种公开的庆祝、宣传和游行活动。由于担心今后会不会不让工作，所以很多学者和艺术家坦白交代实际上连自已都不相信的思想意识内容，写一些自已没想过的或者明知不是事实的东西，加入官办的组织。”（V·哈维尔的“书信”，载于1975年7月5日《证据》。）

重生活。在人们面前，在公开场合下对一切都满意，富于适应性，或者说起码在外表上给人的印象是单纯、不过问政治；但另一面，牢骚满腹、怒气冲天、充满了厌恶情绪则是具有另一种思想的人。他们知道，关于这种思想，就是在最亲近的家人面前（孩子们可能不懂深浅地在学校乱说），就是在自己的妻子面前也不能在态度上表现出来。东方集团各国的大多数人，象住在法西斯国家——共产党对它是加以批判的——一样，具有双重人格。人人都有隐藏自己的真实面貌、隐瞒自己真实意见的必要，这就导致了失望、自我异化、精神失常和厌世的情绪。这些事，在脑力劳动者，即在知识分子中间，表现最为强烈，这是不足为奇的，而很多工人，则变成了对政治漠不关心、只为个人生活满足（周末休息的小房、家庭儿童游玩场地、体育设施等）而活着的人。

只要这些工人能完成他们工厂制订的计划任务，只要他们在各种公开场合（五一节、生产管理大会）露面，当局就会对这些个人化的工人表示满意。人们实际上需要的只是驯顺的机器人。政治官僚们只是在向外国人夸耀的公开场合才要求能公开显示出“群众的热情”。工人们，只为了求得一个安宁，才学会参与这种传统的义务活动。他们清楚地知道，该做什么，如何才能在形式上完成计划，官员们在执行什么样的政策。他们也基本知道，谁在进行监视、谁是特务、谁在告密。他们也知道，谁在监视人们参加五一节游行的情况和人们的“情绪”，谁在开会时记录他人的行动或表决情况。但是他们仍然在形式上予以协助，为的是使自己的生活哪怕有一点点的改善。就这样，所谓“社会主义”解放造成了一种人的异化，它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可能达到的一种异化。

但是，如果人们在得不到多数人拥护、而且还要对广大人民进行压迫的情况下维持一种体制，那么，他们就必须给这个体制的压迫阶层、特别是领导官僚们以优厚的利益，以便争取他们参与这一行动，使他们与这个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任何一种镇压体制里

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贿赂拉拢的一面。物资越缺乏，供应越不足，人民对需求越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就越容易贿赂拉拢领导阶层。

例如在斯大林体制下为党的机构和主要的部(国防部、国家安全部等)设有特种商店(因为这是秘密的，所以大部分直属书记处或其他机关)。在这些特种商店里官僚们可以买到一切在一般供应中不可能或很少能得到的东西。这一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传入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全体主要积极分子分配住宅(这一直到今天还是最奇缺商品)，以后又优先分配私人汽车，现在仍旧是这样。

党的官僚们有专用的周末休息之家、休假和疗养的别墅以及指定的疗养区。在那里，廉价提供最高级的供应、服务和其他娱乐生活条件。这些休养娱乐设施是按官员的级别设立的(1．书记处一般人员；2．司、局长一级；3．中央书记、政府各部部长、政治局委员一级)，它们在豪华程度和占地面积方面都有所不同①，这在鼓动人们追求权欲方面有显著的效果。此外，对较高级的干部来说，还有到国外休养和观光的可能性，他们可以到最美丽的地区去观赏明媚风光，纵情享乐。

斯大林曾对政治局委员采用过特殊补偿制度。他根据"被补偿者"的"表现"每月将额外的钱装在信封里(所以人们都称此为"信封"工资)分给每一个人。这种补偿工资是加在高工资之上的工资，它是秘密赠予、免除所得税的。由于它的数额是由斯大林独自决定的，所以在这件事上可说是一种特殊的贿赂手段。这一制度也被其他党，例如诺沃提尼时代的捷克党所仿效②。

---

① 例如在捷克，为政治局委员和几位部长在伏尔塔瓦河畔的一个最美丽的水库地区划定了一个很大的休养区，一般人禁止入内。在那里有近代的别墅，设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过着这样穷奢极欲生活的诺沃提尼曾想出了下面这样一句口号："在我们这一代就能过上共产主义的生活"。

② 诺沃提尼长时间发给政治局委员们比每月正常薪金多得多的钱。这一事实在"布拉格之春"时期被公诸于世时在最保守的教条主义的中央委员之间引起了极大的气愤。但这种气愤只是由于这些人没享受到这种特权。

最一般而且恐怕也是最重要的贿赂拉拢方法是，为了某种目的将普通党员提升为官僚。不需要经过专业学习，只要修完了党校和工人大学的专门课程，就可免除在工厂的繁重体力劳动，一下子就可升到影响很大的官僚地位。这样上来的人，当然要全力以赴，以便终身占据这个宝座①。如果说“白领”职员是为大资产阶级或贵族服务时代很多人所垂涎的职位，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掌握着极大权力的党的官僚地位就更富有魅力。事实上被选进此地位的人，对于能给予他这种可能性的体制，是最忠实的支柱。

一般来讲，以高俸直接贿赂拉拢高级干部，以小恩小惠来贿赂，特别以较大的利益来引诱那些地位较低的官员向上爬，最后，以党官僚所拥有的极大权力来引诱那些特别关心权势的人——这一切就为共产主义体制创造出一个可靠的统治阶层。有了这样的官僚阶层，共产主义体制就可维持几十年，对于任何反抗、改革企图甚至叛乱，都可予以镇压下去。在这方面重要的问题是，党的官僚在社会内部要掌握一定的集团作为预备队，并通过他们去完成各项任务，而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社会基础。

但是，普通党员始终是个问题。在东方集团各个国家中整个党从未成为这个制度的可靠支柱。大部分普通党员，特别是持有伦理——理想主义观点和抱着真的社会主义信仰而入党的普通党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且根据经验，就出现了这样的人，觉得他们的理想严重地破灭了。当他们发现宣传同实际现实之间有很大矛盾时，他们在政治上也就消极起来，并在内心对“干部档案制”产生反感，这往往导致一部分人（大部是工人）离开了党，或者导致一部分人转为地下状态的反对派，但是，他们仅是一些知识分子党员，在各种机构中工作的、在政权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他们最终

① “……这些人，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热爱体力劳动，但比任何人都更加躲开它。他们夸耀自己工人出身，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回到工厂去。他们擅长于一切卑鄙的勾当。但谁也不会自愿地到工厂和农村去。（J·布蒂克著《天堂之门》。）

将进行重大的政治活动……①

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党员(特别在苏联)至今还没识破谎言和欺骗，尚被蒙在政府的情报活动和宣传之中。大多数这样的党员，只要他们还是正直的，也能看到许多不正确的东西和缺点，并对他们同事中的不满情绪有所感觉。但他们还没有能力识别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制度内的不正之风的根源。他们大部分是相信马克思、列宁的伟大理想和目标，并或多或少地以为党的领导机关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他们认为导致缺点的原因只是在于政府或领导机关在制订计划或进行管理时出现的错误，所以他们也痛骂那里的"游手好闲"的官僚。这种共产党员(在苏联共产党内最典型)时而批评国家机构，时而向党的领导机关写信(这对党的官僚来讲不仅不起什么作用，而且认为是好事)。他们之中还有人认为，一切困难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者不断威胁苏联和加强军备"所造成。持这种思想方法的人，主要是苏共党员，在其他东方集团国家无几。

当然，纯粹抱着找出路的动机、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任何幻想、只顾升官发财的普通党员，也大有人在。打手、告密者以便于便衣警察特务活动的，大多出于这伙人，而党机构也正是从这些人中寻找接班人。尽管这样的"未来官僚"对现任者来说是如此地重要，但他们并不能取代那些在同事和邻居等人中间还保持着良好声誉的共产党人。大多数告密者或狂热者，对其同事不仅没有政治威信，而且由于已被同事所熟知，故被敬而远之。只有那些名声不那么坏的共产党员才能完成党机构同人民之间的传导和鼓动的作用。因

① 最早认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已堕落成官僚主义体制并企图打破斯大林权力统治以改变这种发展的集团，都出自这些共产党员。但他们被斯大林主义官僚们当作"托洛茨基叛徒"或者"布哈林式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而被消灭了。以体制的自由化为目标，并试图达到此目标的匈牙利的裴多菲集团，也是从这些共产党员中生长出来的。为体制的民主化和人道主义化而斗争的波兰改革者们以及最后的捷克的改革者们，都是由这些共产党员所组成的。这些改革者们的认识和政治成熟程度高低不一，他们对共产主义腐败原因的认识也不一样，但他们都知道，坚决向党的和社会的官僚主义化进行斗争，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必须采取的行动。

为党不能单靠压迫和威胁来获得民心，还希望人民能自愿地从事社会必要活动，所以党机构不得不经常把具有“信念”的共产党员或真正的工人留在党内，或者争取他们入党。但是这一年比一年难以办到。正是一无所失的普通工人和那些在生活上并不太困难的知识分子等躲开党，这一事实① 最清楚地说明了工人们是怎样看待党和这个制度的。

但是党的机构不能放弃对党员或者起码一部分人民施加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②。因为：第一，要为党官僚本身提供论据，给他们的活动(包括镇压活动)以道义上的特别允许；第二，要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来迷惑普通党员以及一部分非党群众，或者使他们中立。所以权力机制的第三要素——意识形态的垄断，也具有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的垄断

当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从而能统一指挥这一切，并通过干部操纵这一切，那么，在这种体制之下，舆论工具必然完全受有权势的官僚所摆布，并只能为他们的目的和利益服务。人民虽然根据常年的反面经验，对报纸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但是在精心挑选和有意识编写的情报以及片面宣传的不断影响下，人民也很难看到社会真相和某些缺点的严重程度；他们无法权衡本国体制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因为他们没有可能与其他体制进行比较；他们不可能认识各种缺点形成的原因。总之，国

① 据党的布拉格市委会统计，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布拉格市(捷克的最大工业地区)的全体党员中百分之十三是工人。这个百分比，比之工人党员仅占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七这一本来就较低的比例还要低。而且这个比例，是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为增加工人党员而努力的誓约相违背的。

② 这在东方集团，各国的情况不一。如在捷克，党机构今天对大部分党外人士来说，在意识形态方面几乎无任何影响。在东德和苏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其影响可能大些。这种影响在波兰和匈牙利也比较小，而在罗马尼亚，则带有较强的民族色彩。

家垄断了舆论，人民只能受其摆布。

官僚主义的共产党权势阶层知道如何巧妙地利用意识形态工具来左右舆论。在这一点上它胜过过去任何一个极权主义体制。他们使所有能形成舆论和意见的手段都掌握在效忠于现政权的可靠的干部手中。因此，可使情报系统完全处于隶属地位，可任意对情报进行歪曲。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经常与党中央书记处联系，定期的或者在发生某个事件时领受指导方针，以及对什么事件应采取什么态度的具体指示。社长或总编辑要百分之百的对其主管的出版物、广播负责，并接受党中央书记处附设的主管部的严格控制。只要稍微偏离党的路线，干部就要受到警告，如果屡犯，那就毫不宽恕地予以撤职。

特别在吸取捷克的改革运动教训之后，东方集团的所有国家，特别是捷克，重新加强了意识形态的领导和对全体干部的控制措施。在捷克，从事改革运动的人，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了近十年的耐心和有意识的启蒙活动，此外还由于进步的改革者打入各个编辑部门，成功地在那些重要部门争取到一大批支持改革和反对诺沃提尼政权的分子。党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们，从此过程中得出了结论，即只进行一次大的清洗还不够，还必须使所有新任命的干部按照党机关所规定的严格要求进行工作。为此，他们宁愿选拔那些在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方面欠缺，但在政治上是可靠的人来担任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往往是一些与各种丑闻有牵连的人，是一些被党的机关重新起用、并获得高薪、从而不能不向党的机构表示感谢的人①）。

舆论工具的任务不是向读者提供真实可靠的情报，而是把这些情报加以挑选和编排，从而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每个时期的政治

---

① 例如胡萨克掌权后，国家警察（国家警察档案部）的代表在电台宣读几页对领导改革者进行诽谤的丑闻报告（大约十五分钟）就能得到广播费五千克朗，这相当于熟练工人两个半月的薪金。

目标,尽量使政治方面的领导得到支持。这就是说首先压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病和缺陷的批评和不顺从的意见，压制可能贬低国内成就的有关外国情况的报道,压制有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的不满以及其他的情报。另一方面,突出报道党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证明拥护和支持它的消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提高及其威力的消息、国际上支持社会主义体制以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等消息。

为了不致因国外情况的报道而降低国内活动的威信，不得不封锁国外消息的传入（禁止和限制外国新闻的输入或自由买卖外国报纸，对外国的情报、通信、论文、书籍的购进和出版等严加检查,以及干扰外国广播等）。出于同一目的，对人民出国旅行也要严加限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根本不承认国内的错误和缺陷。因为这将使所有报道活动和宣传活动不起任何效果。相反,为了表现客观性,往往从上面,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下面,允许工人、读者(读者来信)对政治领导机关提出批评,发表反映他们的苦楚和不满的文章。但是,从报界来说,第一,它一定要处理得使这些缺点与伟大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个别现象。第二,不得对体制的本质产生怀疑,不得揭示造成错误一犯再犯的原因。情报活动首先应加强现体制,不允许导致对现体制超过其他任何体制的"优越性"产生怀疑。

为达到这一目的，在宣传中出现了单纯依靠罗列生产总额以及引人注目的各类商品的增长数量与革命前相比较的数字等等，来宣扬成果。与此同时,则煞费苦心地去掉那些能减弱"成果"或起反效果的数字和比较（例如与西方国家消费品增长的比较，与西方国家每人收入的比较，等等）。一切宣传性论文和稿件必须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强调问题解决方法的独特的进步性。于是，在这些来稿之中就出现了所有问题都已被克服或"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被轻而易举地完成了"等论

述，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困难被说成是偶然的个别现象，是初期阶段出现的、但“日益为劳动者更好地克服了的”“幼稚病”。在两种体制中都已发生的某些共同现象（如物价上涨），则一方面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产生的消极后果”；而另一方面则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国家为克服由于少数经营管理者未完成计划而出现的局部不平衡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有了缺点，不是通过舆论的批评来加以克服，而是想用积极的事例来对工人进行教育，这是官僚们的方针，它导致了人们拚命寻找“模范事例”，轻率地设想出劳动英雄称号，并使其理想化，颂扬他们创造的“新的劳动纪录”。

“社会科学”也被迫染上了宣传性的弊病。社会科学不需要发现社会内部真正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不需要为解决问题而提出建议。因为这样的科学活动势必引起对政治领导机关各种决定和决议的批评。尽管具有科学根据的对解决问题有积极意义的建议对社会是有益的，但它同时也具有被滥用的危险，因为它可能为这个或那个争权者用来反对某个领域的负责官员。更为严重的是，那些揭示了较原则的、较普遍的缺点、从而危及到整个领导集团权力的科学认识都将遭到厉害的压制。克服缺点的建议，不管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常被戴上“反社会主义的、敌对的”帽子。因为有可能损害领导集团的权力的一切东西，从根本上说都是反社会主义的，都带有反国家的性质。这样一来，社会科学只能堕落到为唯一绝对的社会主义——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辩护的学术地位。

在诺沃提尼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能产生一些经济改革理论，这是由于众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实业家常年艰苦地、有时是大胆地进行了准备工作、逐步地有目的地对客观经济情报和统计数字进行加工、扩展的结果。例如，为打破有关国民收入的保密性，做了多么大的辛勤努力啊！为弄清物价、实际收入及其他发展情况的统计花费了多少精力和毅力啊！为暴露捷克人民的

生活水平落后于西方工业国，需要多大的科学勇气和公正的气概！这些研究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当然是不允许出版的。但是它的存在以及所有的分析和比较已在国内广为流传，加速了新理论和重要改革方针的发展。

但为此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一方面在六十年代初，捷克的经济形势开始急剧恶化，与此同时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另一方面由于诚实的进步分子常年不懈地活动，促使无能的政府在政治方面逐渐妥协，使它放宽了在社会科学方面比较自由、比较公正的活动范围。在一个领域一旦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揭露，它在其他领域也会引起仿效，坚持科学的真诚态度。尽管党的官僚没有放松住宅搜查、刑罚和迫害活动，并加强了警察的职能，但是科学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们粉碎了空洞无物的、专门进行辩解的党的宣传。

当然，这一非常时期，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突破，不是官僚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各部门的普遍状况。更为典型的是，一切科学机构都是在党的严密监视之下，它的活动及其结果又都是由党机构从政治“纯洁性”的立场出发加以直接控制。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对改革运动的镇压也导致对研究机构、大学、新闻编辑部门和出版部门等采取了最严格的措施。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和较负责的工作人员被撤换，很多机构被全部解散，在另一些机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被解职。强令发表卑躬屈膝的公开自我批评或驯顺性声明。与改革运动有关的人，一个不剩地被迫送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适合官僚政治口味的“科学”作品才能得到再版的希望。

在学校方面，从小学到专科和大学，大大加强了党组织的监视和控制。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下，孩子们不是被教育成独立地、批判性地和创造性地进行思考的人，相反，他们只能教条主义地模仿和死记信条，如果对此产生怀疑，就被看作是反社会主义的异己分子。与马克思关于对所有理论都要不断提出疑问、要经

常把它与现实相对照、要修正那些过时的与实际不符的学术理论的要求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却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一切重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活动，都等于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最近被公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1]，但对此不使用修正的表达方式，而是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来表述。今天，任何偏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都是被禁止的，而且被当作异说而加以迫害。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观念，都变成了信仰的教条，象宗教里所谓"上帝"和"恶魔"观念一样。尽管对求知欲旺盛的人来说都会提出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要求对这个制度的现实发展、客观内在联系、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结果进行不断地分析，但是人们却不准青年们对其内容进行独立思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的基本观念，也只允许官方的理论家来解释。

而这些理论家也只满足于列举几个极端抽象的特点，不允许去研究具体的表现形式、各种矛盾和优缺点。"社会主义对劳动者来说，是完全排除了剥削和压迫的体制"、"社会主义是建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按计划均衡发展基础上的体制"、"社会主义保证生产力高速发展，保证人民的物资、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劳动人民有广泛的民主"。谁若想知道社会主义概念的内容，就只能满足于这样或那样类似的信条作为答复。社会主义学校的教师也必须用这样的语言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教育。

假设某共产党员科学家或大学教授发现了公式化的理论同实际之间有矛盾。他如果不想被非难为修正主义者，只有将这一矛盾隐瞒起来。假如有一个经济学家认为，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不能保证生产的合适发展，只能带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损失，因此有必要以其他计划形式和保证社会生产平衡发展的机制来代替指令性

① 参看奥塔·希克著《第三条道路》，德文版第387页起。

的计划管理。于是，这个经济学家就会被官僚们定为不仅危害"社会主义计划性"的信仰教条，而且是对党的经济权力支柱的计划体制的现实威胁。也只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会被当作完全拒绝社会主义、鼓吹市场经济优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受到迫害。基于新的思想方法而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变成了"卖身给资本主义"的异己分子，因此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一概都要予以肃清。

为把"修正主义"理论家视作异己分子，几乎不正确运用公正的辩论方式。党的教条主义的理论家们坚决不同意在辩论中引用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者"理论家的意见。譬如说某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分析东方集团的国家所有制时，发现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根本缺点(官僚主义化、脱离工人、无效率等)，建议采用别的集体所有制形态。于是，他就会被当作所谓"全民所有制"的敌人，轻易地给戴上反社会主义者的帽子。至于他用以证明国家所有制实际上不是全民所有制的事实和论据，则一概不予理睬，以简单化的断语把一切要求采取其他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努力，都说成是"与马列主义不相符"。正是这种站在僵化的马列主义立场上，把一切新的理论认识都说得一钱不值的作法，表明了这种理论的绝对教条主义的和反对任何理论发展的政治专横面貌。一种批评如果与官僚主义的权力利益相冲突，那么，人们就不能同意这种批评，也不会照着去做。而且这个批评就会被不许反驳地搞得名声扫地。

不管是在国内某个学校、某个研究所或者某个编辑部出现了独立见解，或者在国外出现了某个东方集团国家的党机构认为具有政治危险性的思想，那么，党的理论家就会被动员起来写"论战文章"(从意识形态方面，以书评等方式)。这种"论战文章"的政治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当新的意见出现之后，根本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证它是否正确，分析研究它哪点正确，哪点又过于简单化。而只看这种意见

是否符合政治路线的有关观点，来确定它是否是错误的。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从一开始就被抛弃了。只要人们发表了与政治领导机关的判断不相同的意见，或者暴露了体制的重大缺点，那么，这种意见就被立即断定它是错误的，而且必须加以批判。具体作法，随着每个时期的目的不同而异，但总是采用那种众所周知的煽动方式。被批判的意见，又必定是被歪曲了的。对无法进行反驳的重要发言则避而不谈；或是断章取义。必要时，则把一些作者从未发表过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一切完全是为了将当事者当作"敌人"、"反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来加以揭露，因此，在实事求是的争论中正确地反映其观点，这对领导者来说似乎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某个理论家在"社会主义"的某个理论方面或者实践方面发现了和说出了某些矛盾但也不敢把它通过公开讨论而加以传播。因为如进行公开讨论，则有就此矛盾在一般群众之间扩散的顾虑。这种顾虑是共产主义理论家特别禁忌的东西，并经常反映在他们的著作之中。人们甚至被警告，不要去阅读那些受批判的作品，以至去倾听那些被断定为错误的意见。

在捷克斯洛伐克对修正主义者所进行的宣传活动中，人们只诽谤他们要废弃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从一九六八年军事入侵后，人们所写的有关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论文、书籍和报告，都只能把党官僚所规定的内容，当作"社会主义"的内容，凡是想改变官僚掌握的国家所有制或者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体制的企图都被说成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不准在分析现实发展的障碍、缺点等基础上评论这些改革建议本身是否正确，也不允许就此写文章或讨论。在所有非难之中提出来的唯一的东西是"反革命阴谋"的经过和罗列修正主义者的"反社会主义"的论文、发言和著作等。至于他们提出的建议、论据和目标则一字不提。

今日捷克党的驯顺的理论家们，竭力歪曲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见解，并把改革派说成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对工人阶级的叛

徒。这只能表明斯大林主义的谎言宣传仍继续存在①。

人们不去反驳改革派为了能证明真正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而提出的对现实的分析、论据和建议，而是把一些他们从未说过的目标强加于改革派。在宣传运动中，人们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也就是说，使用一切谎言来中伤改革派的观点，诽谤改革派是“西德复仇主义者”、“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集团”勾结等等，以致对改革派进行人身攻击。正因为这种虚伪的宣传运动是在党的正式机关报上进行的，所以不允许任何人对这种文章进行答辩，也不能予以揭发。这些机关报的主谋者可以冠冕堂皇地盘算他们如何进行不需要任何证据和不负责的造谣。这证明情况迄今未变。正如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对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最为恶毒的诽谤。在年青一代中给布哈林等人戴上了“特别危险的阴谋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且又不允许任何人了解他们的意见和活动情况，并且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就害怕。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也同样遭到诽谤和诅咒。这种宣传与斯大林主义有

① 关于这些情况西方的舆论界也很少了解，因为西方报纸、杂志和出版物出于他们的尊严考虑不愿翻译出版那种低劣的作品。一个少数的例外，就是出版了J·海耶克著的《是民主化，还是解体》(慕尼黑·达姆尼兹出版社，1969年)。作为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之一、布拉格的党机关刊物《创造》的总编在这本书中把捷克的所谓“修正主义者”、“反革命者”的发展完全用片面的歪曲的方法来描述。如果要反驳集中在这本书中的谎言，则需要写几本书。因此在此仅叙述一个事实。据J·海耶克说，奥塔·希克在诺沃提尼政权期间作为改革委员会的领导人，起初反对“企业内的工人委员会”，直到“布拉格之春”的那个月“态度才急剧转变”。而海耶克对下述事实却故意默不作声，即所有改革建议在政治局的压力下不得不多次以至全面修改，特别是以经营管理民主化为目标的建议，不得不全部取消。如果说许多比令人害怕的工人委员会更无害的建议，也不得不被删去，这只是因为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们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以便使最重要的改革建议能保留下来。关于企业委员会的代表，三分之一应来自企业以外的单位(商业、银行、学者等等)，三分之二由企业来任命，这种想法决不是坏建议，可是就是这样个建议在“一九六八年春”的初期，也不得不与官僚们进行彻底的斗争。官僚机构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工人委员会，改革派不得不在不断排除官僚的抵抗下一步一步前进。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关于在全国实行工人委员会的建议，也曾两次被政府内各部的多数官员(诺沃提尼时代任职的官员)所否决。在这种状态下留给我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建议直接公布于众，以求贯彻执行。海耶克为什么对此事保持沉默？他如果认为工人委员会是符合工人利益的一个组织，那么，他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不为工人委员会去战斗？

什么不同呢？改革派被诬蔑为"叛徒"，改革派有关社会主义的设想必须从人民的头脑中清除。

这样，所谓"赞成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就与"赞成还是反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解释"等同起来了。这意味着扼杀批判地、独立自主地分析事物，然而这种作法正是党机构所期望的。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要求"堕落为脱离现实的宗教，被说成是"绝对真理"，但实际上它与拥有的一切行政手段一起，被用来强制地掠夺人们的幸福以有利于他们自己。

官方制订的教科书所讲授的内容，完全脱离实际。在青年学生的思想中不断出现矛盾。了解这一状况的教师为数也是很多的。但是各个学校中的监督是很严的，它不仅采取从外面派进督学官的形式，而且还通过狂热的积极分子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大学生干部在各校实行对付青年学生的特务制度，迫使教师接受控制，即不管愿意与否，都被迫去伪装和违心地从事适应体制的教育活动。如果一个教师引起党机关主管教育的部门的怀疑，那么他迟早要被赶出教育界① 。因为这等于终身被禁止就业，因此，大部分教师

---

① 在捷克，当六十年代初期肃反期间，数千名最有才干的学者、教授和教师们被赶出学校和研究所，不得不完全放弃他们的科学活动和教育活动。谁要留在学校，就必须填写屈辱人格登记表，批判修正主义分子，联名给苏联写感谢信，感谢苏联给捷克带来解放，同时还不得不写密告信等等。被开除出党的教师不仅不能担任教学工作，而且与他共同生活的妻子作为被开除的党员家属也不允许登上教坛。大学的社会科学学者们被迫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里不可能详细地报告有关精神颓废的程度。但是当我们把各个片断加以集中起来看时，就会明白，傲气十足的党的官僚应负全部责任。仅以卡尔斯大学哲学系来看，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学期中，有十三个科目的讲义停止讲授。其中包括哲学、社会学、东方学、民族学、音乐和艺术史。技术政策学不再能作为一个单独科目存在。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和哲学系的政治学研究所被封闭；在政治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研室和社会学指导理论教研室也被废除了。在历史系中，受打击最大的是二十世纪史的研究。例如政治大学哲学系、军事历史研究所、过去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主义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在这里，捷克历史教研室也被废除了）、卡尔斯大学社会政治科学研究所就属于这种情况。经济学也受到严重打击。在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许多优秀的研究生被解雇，研究专业倒退到五十年代的解释水平。从经济学校解雇了包括多数教授和讲座的负责人在内的一百八十名助手。在法律系的法律课和科学院的国家法律研究所受到了很大损害。此外，文学和波希米亚语、斯拉夫语和德语同样大受其害。这样，上面列举的只是社会科学部门的问题。

都屈服于这种压力，即使自己也不相信，但仍然照本宣科地讲授所指定的教材。

在教育活动中也完全采用了形式主义的典型的官僚主义“管理”方法。最重要的大学应试者必须证明自己对上是“忠诚”的。其中必须向上报告究竟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教育的。中央一级的官僚不可能也不打算去调查这些“学生们”是否真正提高了觉悟，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汇报和罗列教育活动的数量就可以了。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或者是党内学习，对于当时的负责人——官僚来讲，重要的是年终统计。即究竟进行了几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讲授、讲演、学习讨论会和会议，以及参加人数等，以此来证明学习积极性。官僚们并不关心人们的头脑究竟接受了些什么东西。官僚们关心的是“积极性”本身。教师要证明这种“积极性”，学生则要证明他们参加了学习活动，考试时，即使脱离现实，但只要讲些骗人的假话就可以通过了。

在共产主义体制中，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很长的单子，开列着被禁售的书目及作者名单，科学研究所也必须执行这些禁令。这种禁止出售书籍的作法可与法西斯体制或中世纪的宗教法庭相匹敌。许多被禁的书籍从图书馆中轻易地被拿走了和销毁了，有许多原在诺沃提尼时代出版的、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曾准许销售的书籍，现在虽然还陈列在索引卡中，但已从所有图书馆和有关单位中消失了。在那里，禁止书籍发行对官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官僚来讲，真理的反作用比现实更为危险。

在官僚政权看来，整个艺术活动领域只能是直接为社会主义政治目标和利益服务的领域。它的任务就是争取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奋斗。此外，它必须以社会主义的道德精神为教育服务，为反对社会主义敌人和破坏人民统一的所有势力的斗争服务。照这种“政治宣传”的要求，艺术所担负的任务不仅要经常影响教育和学习活动，而且还要在群众中用感情手段宣传党的政治

目标，如果根据这种设想，那么，实际上一切艺术都必须在内容上、形式上按“社会主义现实的党派艺术”观念重新改写。

一种艺术，如果它不为官僚所理解、是抽象的、甚至对制度或制度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的艺术，如果它对人的良心起一定的影响，同社会上的邪恶和压迫进行了斗争，起到了先锋和振奋人的作用，那么，这种艺术，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承认，而且还要遭到禁止和镇压①。在党的机关领导下的国家文化同盟的头头们毫不含糊地进行管制和检查活动，使一切艺术形式和艺术家都必须为政治服务，而这种设想完全是对艺术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

尽管如此，并不是说就不能产生艺术作品。这就是除了一些与真正艺术无关的极其肤浅的艺术外，也创作出了一些从艺术水平而言不能加以否定的文学作品、绘画、雕刻和电影，但这些艺术品只反映同社会关系不大的主题。艺术家被迫只就一些人的生活中较小的、枝节的、甚至脱离生活的主题进行创作，为的是回避对现实进行解释，或者为了不致因对现实作了批判性的、讽刺性的批评而遭到查禁和镇压。

党的官僚对那些不关心政治或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只靠他们的成就而驰名中外的艺术家、学者、运动员以及其他有“名望”的人是关怀备至的。政府为这些人的活动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某些人虽然不是党员，但在国内外享有威望并在艺术活动中又不危及体制，他们被东方集团的党官僚捧为宝贝，对他们大加利用，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对党的官僚来说，这种人无论如何远比批评体制、闹事和要求改革的党员艺术家要好得多。因此，政府在一切方面给

① “不允许我们作家有自已的认识，同时也不允许对人和社会道德生活作自我的判断和表述，而且不准作家对社会问题和我国正深深为之苦恼的历史现象进行独自的解释（在现实中碰到的问题），至于那些反映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思想以及可能影响精神领域和社会觉悟的作品，则以这些作品反映的是琐事，是鼓吹个人主义或没有看到人民生活的广阔天地而被禁止。”（A·索尔仁尼琴：《关于作家的责任——给苏联作家同盟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

予这些不属于党的、不问政治和在政治上顺从的文化创造者以特权，相反地，对反对体制的艺术家却严加指责和迫害。

在当前这种物质水平低和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下，物质利益和到国外演出以及进行比赛（特别到西方去），这已成为对年轻人的一种强烈的物质刺激。这特别对非党群众来说，是取得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除了国家补助和支持外，这是东方集团国家体育运动等取得较大成绩的一个原因。

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艺术家们，仰赖于国家通过文化协会所给予的物质支持，因为他们得不到文化协会的批准就无法公演、出版和出售，而且他们只要违反文化协会的意志，就不能作为文艺工作者而被正式承认，并因此而有可能作为"游手好闲分子"或"危害国家的分子"受到警察的迫害，因此，文化协会中的党的机关拥有随心所欲地对艺术家施加压迫的手段。党的官僚为了控制文化协会的全部活动和整个文艺界，把顺从的党员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数在文艺上是无能的和没有特点的）安插到文化部所属各个文化协会的关键性岗位上。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遭到压制和扼杀①。

尽管存在着这种歪曲现状的情报体系、不科学的和煽动性的宣传以及党机关和其他国家专门机构所控制的"文化教育"，但是忠实描写现实、暴露现实和进行战斗的文章、论文、报告、书籍和艺术作品仍然不断出现。尽管意识形态体制如此专制，但它并不能轻而易举地使人类良心中的积极因素保持沉默，也不可能阻止国内事件的不断"爆发"，不能阻挡科学、艺术和出版界知识分子向人民

① "关于当今文化的荒芜状态已经说了许多。例如：成百个作家不能写作，大批书籍被查禁；许多杂志勒令停刊；出版社的出版可能性和戏剧演出的机会被破坏；各种精神联系被中断，在这方面遭到迫害和排斥的状况是极为严重的；一切艺术家组织和许多学术研究所遭到破坏，并为一些假的艺术家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所取代，它们是由一小撮爱寻衅的宗派分子，臭名昭著的向上爬者、不可救药的懦夫和无孔不入的追求功名的人所管理。"（弗·哈维尔的《信》，载于1975年7月5日《证据》）。

揭露真象的决心。知识分子的这种抵抗，在共产党国家内正以不同的规模和时起时伏的形式日益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体制是以所谓“社会主义”的绝对的道德原则为理论依据的，并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几乎排除各种罪恶活动的动机，然而这个体制并不能排除人类的良心，不能阻止这样一种人的不断出现，他们在感情上和利益上与人民有紧密的联系，具有很高的判断能力，并不断为真理而进行殊死的斗争。

五、反民主的官僚制

反民主的理论

正如我在前面阐述的那样，只有通过压制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权利，官僚机构才能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现在，人民既没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也没有选举和罢免政治代表的自由；没有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提出的“使选举和罢免更简便易行”的充分的民主制；也没有列宁要求的人民同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密切联系和企业工人委员会①的选举等。人民享有的自由比在受蔑视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下更少，从而不存在“取消官僚机构和没有这些机构也能行的可能性”，官僚们变成了人民的绝对统治者。由于反对官僚制的内部和外部因素都被排除了，由于居于官僚之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也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们就成了绝无仅有的统治者。压迫全体人民的官僚全面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官僚们非常清楚，要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维持他们无限的支配一切的权力，就不能容许任何民主自由。他们虽然也很需要经济的有效发展，但是，通过企业的真正独立自主，通过社会主义的市场关系和宏观计划的民主化来实现经济的有效发展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为这样做，将毁灭他们在经济上的权力。比这一点更使党的官僚们害怕的②，是人民的民主自由，因为一旦存在这种民主，这不仅将使官僚的权力受到限制，而且将使民主独立地

---

① 参阅本书第18页注②。

② 因为在经济状况十分危急，从而有可能在严重威胁官僚的政治权力这种最严重的紧急状态下，官僚们为了至少能保住政治权力，也许才会被迫放弃无限的经济权力。

发展下去，导致广义上的人民自治，从而导致官僚统治的垮台。

党官僚的特殊经济和权势利益产生于他们高居人民之上的特殊地位，并成为他们所有行动的最高宗旨，这种利益也对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思维方法起决定性的影响，并导致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发展，即意识形态首先必须是为维护官僚体制提供根据。从这一立场出发，一切民主和自由的要求都一概被指责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同时，他们又不得不企图使现在的官僚体制看上去似乎是最能保障劳动人民利益的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具有最广泛的民主①。

在东方集团国家的有关意识形态的全部文件中，很难发现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社会主义机制进行的分析与有力地足以说明劳动人民享有真正民主自由并不受党机构约束地进行政治活动的证明材料。

其实，我们在东方集团国家公开发表的理论和宣传中看不到他们对现实情况所作的具体分析，看到的只是"经典作家"的语录和抽象的观点，"正如列宁所说，事情应当如何如何，因此应如何如何……"。没有任何证据和论证，也没有事实印证。虽然也谈论分析研究的必要，但是，官方的理论家回避对现存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进行真正的理论分析。因为即使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矛盾，以及分析了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当权的统治者是不会感到愉快的。

捷克进步的改革运动被镇压之后，最阴险毒辣的官僚体制复活了。从意识形态方面对改革者进行攻击，以此来消除改革者在人民中的思想影响。但是，这种宣传攻势对改革者进行的分析，提

① "跟资产阶级的体制"不同，苏联不仅在形式上宣布公民的民主自由，而且还关心具体实现其民主自由的情况，（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6月发表的选举演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为劳动人民的真正民主，是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最好的形式也无法比拟的最广泛的民主"（B·N·托波尔宁（音译）：《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我国的社会生活在所有方面实际上都是民主的"（勃列日涅夫：《真理报》1974年10月13日。）

出的证据和观点，除抛出一些抽象的经典辞句和盖上早已大吵大嚷过的“社会主义的敌人”这个标记之外，别无他法。他们还必须用“关于民主问题的阶级立场”这种陈词滥调，颠倒黑白地把改革者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主张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阶级异己的”。在这个宣传攻势中站在最前面的是G·胡萨克。他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得到党机构的完全支持。为了向读者揭示官僚的宣传是一些什么货色，我想在这儿详细介绍胡萨克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论述。下面就是他的论述：

“与论述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相联系，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列宁无情地批判了对笼统的民主，或对民主问题的抽象的谈论。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篇著作中，在批判纯粹民主时说：“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的论调，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在考察民主和它的形态的问题以及如何使它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自由、人道主义和其他问题上也是一样）时，必须经常与分析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现状和国际形势相结合。此外，它又是与一系列问题上的阶级立场相关联的，即：给谁以民主，为什么，在哪个领域，与谁相比等重大问题。如果不考虑到这些问题，人们就会停留于随便喊喊一般民主的抽象口号，而根本不想去真正发展民主，只是为了掩饰与发展民主完全不同的目的和立场，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修正者们，即提出有关新型社会主义模式的人，不懂得这一点。

这里还应指出：列宁认为，不仅是国家问题，而且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在理论和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列宁这个包括多方面内容的观点，包含着双重意义。第一，它是对各种右

倾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以及他们滥用民主口号的批判。类似列宁时代的考茨基和其他一些人所做的那样，这些人在理论上至少还暂时承认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民主的许多基本原则。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们从具体结论、任务和措施出发，却忘记了这些原则。他们忘记的正是列宁多次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九六八年许多在捷克宣布社会主义新模式的人们实际上也忘掉了这些原则。在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中，对国家和民主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党的政策一致起来，换句话说，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多大程度上被他们所遗忘，这一状况是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标准。

第二，列宁首先把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的理论设想与考虑苏维埃的职能和任务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见解同苏维埃民主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产阶级的民主是民主的更高形式，是大多数人民所享有的民主，它同时也是对剥削的暴力镇压。无产阶级民主的这种新的性质在于下面这一点，即超越了议会制（所谓代议制民主的界限，劳动人民成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直接主体，人民直接参加这个政权意志的制订，并使它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①

现在姑且不管这种官僚主义的颠倒黑白、内容空洞、脱离现实的，引用列宁的话来进行宣传的表达方式。这里，我只想对他们指责修正主义者的几个观点作一些分析。

反对"所谓纯粹民主的代表"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意思？改革派中的什么人要求实行纯粹民主？他们只是要求在我国实现人民民主，因为现政权在长达二十年的统治时间里，镇压劳动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斗争，几乎使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在政治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并被排除在活跃的政治生活之外。这里涉及到具体回答列宁

① G·胡萨克：《列宁关于国家和民主的理论的现实性》。（为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论文。1970 年 4 月 16 日的《红色权利报》转载。）

关于“对谁民主”的问题，涉及到创造条件，使劳动人民享受真正的民主；关系到争取实现列宁宣布过、但从未实现过的、在选举和罢免上更简便易行的充分的民主制。另外，这里还涉及到创造条件使“重心应该从形式上承认自由（如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那样）转到在实际上保证推翻了剥削者的劳动者的自由；例如，从承认集会自由转到把一切最好的大厅和场所交给工人使用，从承认言论自由转到把所有最好的印刷所交由工人掌握等等”①。

如果仅仅由国家和党的机关来决定公开集会、利用建筑物和新闻机构，以及搞什么样的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话，这绝不意味着人民实现了自由，它只能说明全国人民必须完全服从统治者们的意志和利益。这些统治者根本不允许对他们的行动提出任何批评，他们压制任何企图更换最高领导人的要求。他们与人民没有共同的利益。所有极权主义体制的特点，原则上都只能容许符合官僚们利益的政治活动，不容许危及最高统治者权力地位的任何政治活动，因此这种体制是极不民主的。

我们就是社会主义体制，这种宣传是捷克的统治者们的最大的煽动。他们把一切要求对政治领导人实行真正的监督和罢免，从人民中选举政治代表和允许政治代表们之间进行辩论的民主化，都视为是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这种民主条件甚至在许多共产党内部也得不到保证，凡是努力创造这些民主条件的共产党员都被戴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因此而被开除出党。

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消灭资产阶级，在捷克已达二十多年，在苏联也长达五十多年了，为什么还要经常用阶级观点来论证问题呢？属于过去阶级的人活着的已为数不多了，他们怎能对拥

---

① “……重心应该从形式上承认自由（如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那样）转到在实际上保证推翻了剥削者的劳动者的自由，例如，从承认集会自由转到把一切最好的大厅和场所交给工人使用，从承认言论自由转到把所有最好的印刷所交由工人掌握等等。”《列宁在第七次联共〔布〕临时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第142页。）

有一切政权和意识形态工具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现实的危险呢？一小撮过去属于占有阶级的人怎么能得到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支持呢？难道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惧怕不正是对官僚体制的社会主义最严重的控告吗？

一个社会制度，它在几十年之后还不能赢得劳动人民的自愿支持，而且还由于担心民主化被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分子"利用而惧怕真正民主化，那么，这个社会制度就是不合法的。他们实际上毫不掩饰地承认，必须用官僚政权来镇压劳动人民，不能给劳动人民以民主自由，因为官僚体制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们无法在民主的条件下，在竞争中战胜资本主义代表。

这就是所有害怕民主的共产主义者所担心的。胡萨克多少也道破了这一点。他强调过去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还活着①。在他看来，这是反对扩大工人民主权利的充足论据。他怎样解释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可能把现在的年轻工人拉到自己一边去的这种担心呢？共产党人不是一再声称资产阶级其所以对一部分工人有影响力，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巨大的经济手段，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工具、政党、国家机器和数目可观的一部分劳动人民吗？但是现在，这些因素都可以为共产党人所利用，而他们却又害怕起那些被剥夺了所有经济权力的当年资产阶级政治家来了。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在苏联，从前的统治阶级的成员已经差不多都不复存在了。

实际上，党官僚害怕的是工人，而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劳动人民如果对社会主义体制比较满意的话，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家代表就不可能取胜。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给民主自

① "剥削阶级虽然失去了经济上的地位，但他们的成员仍然构成了一个在数量上相当多的社会阶层。在捷克还有过去的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和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另外，截至一九四八年二月止，还有参加过资产阶级各政党的人，对上述问题，没有给予充分注意。"（G·胡萨克，见《红色人道报》1970年4月16日。）

由以保障，那么，它就不可能为少数资产阶级残余所损害。过去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即使人还在，但现在基本上都已成为普通的工人、职员，或合作社社员（合作社的农民或手工业者）①。他们既无生产资料，也无值钱的财产，更没有任何可能借助于群众交往手段，给群众以思想影响。如果共产党的官僚们还总是担心过去资产阶级的少数残余在民主的条件下，能够突然比自己争取更多的工人群众的话，也就是等于宣布官僚体制本身的破产。这也间接地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承认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和长达几十年的教育（应该为宣传）都未能给工人以很大的影响，使他们较快地成为“同资本主义复辟进行斗争的战士”。

还有这样一种论点，认为资产阶级残余在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时，在物质和经济上得到了来自外部，即来自资本主义各国的援助。这种议论实际上是对苏联目前的统治集团在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没有足够吸引力的严重抗议。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和制止外国给反社会主义运动以经济支援，不仅如此，具有几十年统治经验的社会主义政权可以使用宣传上的巨大的有效手段阻止这种可能。列宁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暂时还具有比革命政府大的力量，同时列宁又强调这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阶段。在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统治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政权下，上述论点已不能认真地提出了②。

---

① 截至一九七三年止，捷克的工人和职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三，农业合作社社员占百分之十点六。这两个数字在匈牙利分别为百分之八十二和百分之十三，保加利亚分别为百分之五十九点六和百分之三十九点二，罗马尼亚分别为百分之五十二点三和百分之四十点七。

② 尽管资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者常把对“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官僚主义所进行的批评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也常在社会主义各国得到传播，但这不是这些思想在这些国家内有强大物质或政权基础的反映，也不是它们受到外国势力的有力支持的体现，而是这些国家的政权执行了满是错误的有害政策的结果，是没有说服力的、空洞的、不真实的意识形态活动的结果。东方政治家们认为，宣布一项政治主张或意识形态观点无需作令人信服的论证，也不容提出不同意见和进行讨论。他们认为人民会简单地接受，因为所有宣传工具都在反复宣传这些主张。这是他们一贯低估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判断能力而得出的结论。只有官僚才认为靠空洞的言词、威吓和高压政策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欢呼，因为他们把这理解为是一条被打的狗所表现的顺从。

利益普遍化的条件

胡萨克说："纯粹的民主"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必须充分尊重。他到底想以此说明什么呢？当然，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利益，民主就绝不意味着贯彻和实现**所有**人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所有的人都是靠劳动收入生活的（丧失劳动能力的除外），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资本家的利益不再能作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现，必须贯彻普遍的利益，即与各个时期少数人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很难设想，所有社会成员具有完全相同的利益和目的，而社会的发展总还是要由多数人来决定。问题只在于要对这种多数人的利益作真正的深入研究，允许各种利益自由地显示，对多种利益进行对比，从而使多数人的利益作为或多或少的妥协产物，作为多数居民普遍化的利益而出现。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看到和实现劳动者的普遍利益，并能防止危害劳动人民的资本主义利益占上风，这种观点在一个几十年来已没有资本家的国家里是错误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这种观点**把广大居民阶层很不相同的利益趋向一致的普遍化过程看得太简单了**。可以认为，一个社会单位的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有不同的具体选择。即使人们想到了社会向"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富裕社会"发展时，那也只是一种极其一般的和朦胧的设想而已。至于今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具体发展很可能要出现多种多样的道路。一个由某些人所组成的集团不可能单独认识和提出所有各种形式①，更不用说选择和实

① "巴兰的基本观点是：什么是需要，这至少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无需争论的。但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需要，即具体的社会最终制度在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也决不是没有争论的。如果……对这种'需要'没有统一认识，那怎么能把某一种需要宣布为合法的呢？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内部存在对立观点的情况下，怎么能把某一种决定说成是最后的结论呢？又怎能证明仅从这种决定出发而制定的政治镇压措施是正确的呢？"（A·贝林卡：《生气勃勃的民主制》。）

现唯一正确的形式了。

社会一切领域的未来发展形式及其设想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在人民能自由地制订和发表自己的设想，能为此争取他人和成立组织，并且允许各个集团在尊重一定的基本规则的情况下，相互交换、调整和统一意见时，才能谈得上各种利益趋向一致，才能形成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第二，胡萨克的观点忽视了官僚们的特殊利益，它不同于整个社会的利益。虽然官僚们在追求抽象的共产主义理想方面（如“技术革命”，“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他们的立场可能和全国人民的立场是一致的，——“谁会拒绝这样一些目标呢？”但是，在贯彻今后几周内，几个月内，甚至几年内要执行的具体政治、经济政策时，他们总是要反对一切可能削弱和破坏他们的权势、控制权、干部选任、组织意图以及资金和投资分配、规定增长速度等方面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地位的一切建议和意见。在一党制中，官僚机关，特别是党的机关，有其特殊的利益，它常常与全国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这种种情况就进一步使这种机关不可能在选择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时作出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决定。全国人民的利益同官僚特殊权利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是举不胜举的。几乎没有一个官僚决定不是贯彻了他们的特殊利益，不是或多或少与人民利益相矛盾的。就以捷克新闻纸（一种短缺商品）的分配决定为例吧。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退报率最高，可是分配的纸张最多，尽管其他报纸、杂志的内容远比《红色权利报》丰富，看的人也多，但被分配到的纸张却不够用。另外，在选举大企业总经理时，如果要在两个候选人中进行选择，一个是优秀的专家，尽管也是党员，但他在过去的某一次集会上发表过与区委书记不同的意见；而另一个人能力虽差，但多年来，被区委书记处任命为党的会议的报告人。在这种情况下，区委党组织一定选任后者。仅这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党官僚的利害关系是怎样地起着决定性作

用。总的说来，所有决定，不管它是大是小，牵涉的面是宽是窄，都值得怀疑，因为如果在自由的气氛中，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又没有居统治地位的官僚势力的控制，那么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志的形成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形式，并在不同的决定和过程中表现出来。

共产党人为说明党的领导作用的必然性，经常引用这样一些论点："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只有共产党才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认识和预卜客观的、必然的社会发展规律；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类才有行动的自由。但是，这正如前面阐述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都只不过纯属宣传。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可认识的客观发展规律，那么，人们只能以抽象的概念作为媒介，从理论上来说明最基本的、历史的长远发展趋势。而这一些长期的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在大量的、常常难以预见的偶然过程和现象中向前发展的，这些过程和现象又给历史发展以具体的表现形式①。

上述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适应的，因为所谓有意识地运用业已认识到的发展规律，最多也只不过是意味着尊重各种基本的、相互联系的关系而已。比如，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和产品的分配等各种变化，而它们又常常在各自的相对独立的运动中引起生产力的变化。但是，这一认识能说出今后五年里生产力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发展吗？或者"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能预见今后五年的生产结构吗？能说出各种产品将按怎样的比例生产吗？实际上，生产发展会有许多具体选择的可能性。虽然生产的发展多少要受到前一阶段发展的制约，但还是有人的自由

①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恩格斯1890年 9 月21日《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七卷第 461 页。）

意志起作用的种种可能①。

即使说存在着自由选择的发展可能性，而它们又都可能是深刻的客观必然性的表现形式，但是，这也仍然是抽象的概括，因为具体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大量难以预料的偶然现象，并可能以大量的不同形式出现。因此，认为应由一个政党来决定未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具体形式的主张，是不可理解的，即使这种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确定总是包含在一定幅度内允许自由决定的内容。此外，在对未来作出决定时，它实际上为党的官僚们所控制，并使他们的特殊权势利益得以贯彻，因此，在决定中表现出来的只是“官僚们的自由”。这种官僚们对决定权的要求绝不能以“认识了的必然性”等空洞字句作为借口。相反，在作出将影响人类未来的重大步骤的决定时，必须真正地贯彻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各阶层人民与集团的不同利益和普遍化利益的意见。

谁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大量存在的利益差别，谁看不到多种利益和意见集团的必然存在是真正民主的利益普遍化前提，是抵制官僚统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他就会把社会主义民主概念简单化，并使其变成虚伪的东西。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这种大加宣扬的说法改变不了这样的现实：人民不能表达与官僚所代表的“人民利益”的不同意见，不能改变官僚们业已作出的决定，由于人民得不到客观的情报而无法判断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

如果党的官僚真正相信迄今作出的大部分决定和所采取的措施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话，就不应该惧怕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只有在自由的各种条件下，他们才能战胜一切企图实现资本主义

---

① “一方面，我们能够干预经济过程（有从各种标准中进行选择的可能性时），而且能够影响经济过程的形成。另一方面，在什么是可能的问题上又要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因素的制约。最终，我们虽然是靠一定的规律来决定经济政策上的具体方法，但在被制约的瞬间，在如何选择政策范围和如何执行其政策的问题上总是自由的。”（A·S·门德尔松：《过渡时期的计划》，见《计划经济》1928年第8期。）

利益（违反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集团和行为。然而，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存在着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那只不过是意味着官僚们正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几十年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没有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支持而已。

胡萨克一直强调说：承认政治结社的自由，就是给昔日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苏联的理论家们至今还支持他的这个观点①。但是，民主化却是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复辟的保障。比如只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里写进这样一些条文即可，如：不允许私人占有借助于他人劳动而使用的生产资料，换句话说，就是不允许雇佣超过一定数量的雇工。捷克的改革派也想到了这样的宪法条文，即在同时规定，对宪法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是公民直接投票的结果，为了使这种改动更加困难，可加上需要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赞成票这样严厉的条件②。

如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也复辟了，那么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得到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赞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某个理论家仍然说这些资本主义复辟是违反法律手续的，是通过反革命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等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拒绝。这也就意味着在长达几十年里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工人及其民兵们，以及在长达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共产党及其他组织都是极其无能的，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却可以突然发动起非常巨大的政治，即革命的力量，冲破一切法律障碍，彻底变革社会主义体制。这时，我们就应该想一想，为什么

① "如果人们相信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为反对社会主义体制而活跃一时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话，那么，就会认为，只有保持资产阶级社会的多元主义的习惯和传统，并且让反对无产阶级的各个政党作为共产党的对立面而出现才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他们甚至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说成是非法的。换言之，他们要的是恢复资产阶级的民主，从而可以毫无阻碍地实现他们的反革命的企图。"（多勃雷宁：《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② 这个提议有其社会结构的根据，因为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也不会占有生产资料，在直接的民意测验中他们是不会表示赞成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宪法和依靠国家暴力对宪法的保护却能足以维持资本主义体制，使它在几十年漫长岁月里不受有组织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危害。

“社会主义”官僚制的理论家们，为了给维持官僚独裁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而宣称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是他们自己却陷入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说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还存在，过去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还具有危险的影响，并以此作为反对多元化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理论根据①。同时，他们又强调共产党人是得到人民最广泛支持的最强大的党。

因此，大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具有很大危险性、并以此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理由的B·N·多勃雷宁突然又说：“共产党人之所以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反对派的观点，不是因为他们象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企图使人相信的那样，害怕竞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是劳动群众公认的领导，在劳动人民当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威信。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是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它集中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为社会主义而努力工作的、有高度觉悟的战士。如果共产党在组织和行动方面实行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不朽的列宁主义原则，那么，共产党的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②。

既然共产党在群众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威信，为什么又不允许人民自由讨论、自由旅行、自由交换情报、自由组织团体和自由选举呢？如果共产党在民主制度下，能通过自己最好的计划、最好的

---

①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拥有众多人口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构成我国的社会中有着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这个阶层本身的缺点和毛病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阶层有着悠久的传统，很强的组织性，而且具有非常系统的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同时还具有马萨利克（捷克的政治家——译注）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这些思想意识侵蚀了或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

这是多勃雷宁为维护无产阶级专政而引自所谓《在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社会危机的教训》的一段话。（多勃雷宁：《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② 同上。

政治、最好的行动来取得多数人的支持，那么它的威信就一定会提高。如果确实有必要同反对派进行斗争，而反对派又缺乏社会基础或得不到任何支持，那么，人们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害怕建立多元化的民主制度呢①。

实际上，这些只不过是内容空洞的宣传而已。多勃雷宁的书是一本典型的没有科学真实性的、只是期望得到官僚们认可的毫无价值的著作。这是一本写社会主义政权体制的书，却只字不提官僚和它所起的作用、官僚的利益以及他们的活动。列宁尽管在临终前已认识到苏联体制的官僚化和苏联共产党的官僚化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但是在那以后，官僚体制发展和强大起来。官僚们当然不会同意实行民主，因为他们害怕人民长期受压抑所潜藏着的愤怒，还因为他们深知在民主的条件下，将会失去他们的垄断统治地位。因此，与捷克毗邻的各国官僚们互相勾结起来，镇压有传染性的捷克式改革运动。

对反官僚主义的民主化的惧怕

实际上，党的官僚们并不是害怕使用暴力的捷克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而是害怕实现人民的民主自由。面临危险的不是社会主义体制，而是国家官僚垄断体制。在我国，如同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情况那样，认识到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倒退现象和人民对它普遍不满的是一批持进步立场的共产党人。他们逐步看到了现体制内部的矛盾，并认为单凭镇压、腐蚀和欺骗宣传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他们还认识到只有用宪法保障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同时，通过一种真正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民主化才能拯救社会主义体制，这些认识促使他们起来进行斗争。这些共产党人得到了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从未有过的热情支持。另外，通过根本变革现体制实

---

① 同本书第146页注①

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大。

经过周密考虑和长时间酝酿的关于变革体制的基本设想现在已经形成。变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使内在的和外部的反对官僚制的社会因素发挥作用，从而限制官僚化的灾难性发展和打破官僚制的绝对统治。

人们认识到：不管是集中的经济计划和监督机关，或是工人和农民的外部监督，都不能保证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活动得到全面的最佳的发展；只有现实的市场压力才能有效地对付生产管理的官僚化。这些认识导致了相应的经济改革建议。集体企业的社会主义有调节的市场关系与宏观经济的指导计划的新型的结合，不仅可以产生不受官僚体制阻碍的企业的独立性和责任心，而且还会使企业作出最佳的、尽可能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决定。同时，宏观计划和有计划的市场调节将克服资本主义特有的市场发展，防止垄断资本在收入分配和操纵消费方面的弊病，防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

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关系，作为经济内部的反官僚体制的重要因素，将借助于刚形成的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来克服经济管理上的官僚化。宏观计划的民主化将会把有关重要的生活目标和与此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的消费与分配比例的决定权从不负责任的匿名的官僚们手里夺过来，交给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也就是一切较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表。

所谓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实行全面的民主化，就是把一切管理和领导工作交给从最基层到中央都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所组成的机关，但这种管理和领导活动如果没有专职的和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和管理人员是不可想象的。一切关系到人民生活的重要基本方针的决定，都应该由被选举出来的在一定任期内的人民代表来制订。职业政治家应该从这种机关里排除出去。人民不管在社会的哪一个领域，在什么问题上，只要是以变更现状为目的，都

应有可能组织起长期或短期的团体。

不仅是政党，而且工会、农民团体、大的文化团体、青年团体及其他具有一定成员并尊重民主社会的宪法的团体应组成广泛的人民战线，社会的政治基础只有在民主选举中产生的多数才能决定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方针，并根据宪法的宗旨确定新的社会的基本原则。此外，还必须准许其他各种政治团体（虽然目前是少数派）从事活动。各个主张修改宪法的团体只有在得到法律规定的最低票数时，才能要求实行人民投票。这时，正如我在前面已阐述过的，在修改基本法的时候，当然需要达到法律规定的必要票数。

这种民主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某个垄断官僚机构（不管是一个唯一的政党和军事组织，或某个政权组织）通过窃取重要职务（操纵干部），通过镇压、贿赂或垄断意识形态，把自己的排他意志强加给人民的可能性。但是，即使在形式上采取了苏维埃体制，劳动人民能够选举各级代表，但在此背后还存在一个垄断的政治机构，这个机构实际上操纵广大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完成的各项准备工作，如具体制订修改草案、决议、方针、制度、推荐干部等，那么，这个官僚机构就会重新成为唯一的真正的统治者。单个的居民对这种有组织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一般说来，当他们发现自己是在被操纵的情况下作出了决议和决定，而且那些决议和决定不仅不符合他们的实际利益，并给他们带来相当坏的结果时，已经为时过晚。

人民只有在实现了下面两个条件的时候才有可能从种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发展可能性中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目标。这两个条件是：第一，人民能够依靠各种不同的、不受资本所有者间接或直接影响的相互竞争的政治辅助机构、群众宣传工具、研究机关等获得情报和作出判断；第二，人民不再受那些政治家们的操纵，这些政治家们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和靠人事关系已积蓄起强大的力量。此外，人民还要学会向各种代表机关选送那些能在那里实现人民要求的代表。所有代表最多只能连任两期，期满之后，必须回到原

来的工作岗位（不是从一个政治职业转到另一个政治职业）①，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政治上的权力集中，人民代表也不会变成实际上作为一个工具、为其背后的庞大机构效劳的政治野心家。

捷克的改革运动既不是反社会主义的，也不是空想的，它是在理论上经过长期准备，并得到了人民的完全拥护。如果那个纲领得以实行，就能从根本上限制官僚机构的垄断权。即使允许它存在，也要迫使它从属于选举出来的人民机关。如果能从不同政治团体的候选人中视其纲领、目标和修正草案的好坏程度选出代表，这就有可能阻止某一个政治集团垄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具，而不给其他集团使用，并进而使垄断政治的少数派不可能控制多数人。从两三个五年计划方案中选择出来的宏观经济计划如果与五年一任期的政治机关选举结合起来，那么就可能使政策进一步实事求是，就不再会出现为了某个野心目标而进行的政治煽动，就可以对各个发展计划的利弊加以充分考虑，并使竞选活动充满这种热烈的讨论。如果所有政治机关都实行轮换制，不仅可以使权力不至于集中在个别人手里（因为每个代表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也可防止机构的经验中断(因为总有一定的老人员留在新机构中)。

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们反官僚体制的基本方针，但这个国家却因此被联合起来的官僚暴力在“拯救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所践踏。就是现在，在西方各国也还有许多极为天真的“革命者”，对这些人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这类口号要比批判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官僚本质更为容易入耳。这些天真的人们认为，要想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容忍官僚主义的存在。他们甚至还想，只要镇压、白色恐怖和大屠杀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就可以视而不见。他们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并非常了解这种体制的大多数工人不同，他们有意无视官僚体制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情况。

① 这也是捷克改革派的目标之一。

六、对社会主义的歪曲

官僚体制下的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提出的、作为新型共产主义社会标准的准则，在苏联体制内一个也没有确立起来。这里还涉及到在共产主义第一或低级阶段（列宁把它称为“社会主义阶段”）就必须实现的准则，它可以被视为克服资本主义矛盾而建立的新社会的开端。

始终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做首要标准提出来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为迅速，这也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正是从这一总的估计出发才推演出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用更进步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取而代之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的经济或生产关系应该能保障生产力更快和更有效的发展，经济损失的减少，生产诸要素的更好利用，技术的更快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更迅速提高，并在此基础上保证人民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表明新的生产关系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之间的一致性。

但是，东方集团国家的经济体制离这些基本原则还很远。根据各方面的分析和比较，东方集团的经济体制，根本没有达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尽管复杂的换算和不同的统计原则，以及有意识的政治保密和歪曲，给两者之间的比较造成了巨大困难，但经济学家们通过长期从事的这种比较研究而得出的上述结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国家可以借助资金的集中使用，迅

速地兴建起一些新的工业企业，但这丝毫也不能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工业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国家也给企业提供相当的援助；共产党国家具有充分控制全部积累资金的能力，所以实际上大大地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但是，靠牺牲已非常老化了的生产企业（农业或工业企业），用这些老企业上交的全部利润和几乎全部的折旧费来建设新的企业，这只能说明经济增长仍处于外延型的发展阶段。只要有多余的劳动力（来自农业或家庭妇女），就能够用这种方法迅速地扩大工业基础，其速度可以比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速度更快。但是，在劳动力缺乏时，这种外延型的工业发展将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①。

在东方集团里，国家把重点放在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上②。对这些工业不断地提高新的劳动力。结果造成了农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行业及其他所有部门都缺乏劳动力，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比例失调，给人民造成灾难性的结果。由于苏联农业几十年来一直停留在低水平上，曾经是农产品的出口大国——俄国，已变成几乎不得不依靠资本主义各国农产品的进口国了。另外，建筑活动的严重落后，使东方集团住房紧张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象捷克这样曾是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现在也下降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了③。不适当地强制发展重工业的结果，在捷克过去作为

---

① 参阅奥塔·希克：《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第一章。

② “在一九六三年，苏联工业总产值的约百分之八十一分配给主要部门了。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间，主要产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点三，而次要部门只有百分之六点六。次要部门的投资率一直很低。以一九六三年为例，每给主要产业部门投资十三点三卢布的话，给次要部门的投资仅有一点九卢布。”（A·卡尔洛：《一九一七——一九七五年的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一九七四年苏联的重工业产值比消费资料部门高。按一九七五年结束的五年计划，后者本应居首位。”（《苏黎世每日新闻报》1974年1月21日。）

一九七二年捷克分配给生产资料生产部门（A P类）的投资金额占工业投资总额的约百分之七十八，消费资料生产部门（B P类）只占百分之二十二。（1973年《捷克统计年鉴》。）

③ 一九六八年，在按人口平均建筑住房面积方面，捷克在欧洲是倒数第二位，葡萄牙比捷克更差。至今捷克的住房情况仍没有多大改善。年轻夫妇要分到住房，平均要等六年，乃至八年。

出口工业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制鞋、纺织、玻璃、陶瓷、木材加工、汽车、食品工业等)的完全老化，其生产能力已缩小到不能满足需要的地步①。

指令性的计划制度，不能保证在现有企业迅速实现技术革新和现代化基础上实现生产的增长。现有设备得不到充分更新，已经老化的企业仍在使用，在技术上早已陈旧和报废的机器仍继续在利用，这些都表明工业基础基本上还是落后的。企业受到年年增长的计划任务的压力(计划任务随着生产增长而增长)，但是，为增加产量而分配到的机器和各种生产设备首先在技术上来说并不比以前的好多少，其次，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因为机器的供应量没有与必须迅速增加的产量相适应，所以企业还必须继续使用老的机器，并努力招募新的劳动力。只有通过这种办法，企业才能完成上级规定的产量，工业部门也只有这样来保持基本上是外延型的增产。

这样，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就会不适当地要求增加劳动力和投资。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生产发展的效果是低下的。劳动力大量集中于工业部门，这不仅导致其他部门劳动力的不足，而且也恶化了工业中生产设备的使用情况。因为工业企业招募第一班的工人比较容易，第二班的工人人数下降了(因此也造成机器的不能充分利用)；同时第一班则需要更多的机器。这样，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计划的压力下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但不能保证有必要的劳动力，所以闲缺的工作岗位的数字在增加，由此而产生的没有被利用的生产资料的数字也在增加②。

其次，这种外延型的增长导致投资需求的增加，它表现为资本增殖率严重下降。扩大了的投资和周转资金(原料、半成品、能源

① 有关具体数字，参阅奥塔·希克：《为了实现没有教条的经济》和《处在变革时期的经济和社会》。

② “外延型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是利用轮班工作制的程度低(捷克是一点三，苏联和波兰是一点五)。在捷克的产业部门至今仍有约三十万个工作岗位缺少工人。”(宾托罗巴：《长期预测的关键问题》，见《关于预测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论问题》一书。)

等）构成了占去国民收入主要部分的所谓积累基金。积累基金比国民收入增加得更快，即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进一步扩大，再加上劳动力同时迅速增加，这些都无容置疑地说明了生产技术发展不足。为使国民收入获得一定增长而必须投入的生产基金越多，以及积累资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大，那么，人民的消费水平（国民收入中的其他部分）也就提高得越慢。这种国民收入的增长与积累率增大之间的正在恶化的关系① 与工业部门日益需要增加劳动力的状况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成了东方集团政治家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忧虑② 。

东方集团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比西方工业国低。由于东方集团国家的积累率很高，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也比西方小③。因此，要想使这些国家的平均消费水平接近西方的水平，其先决条件首先就是大大缩小积累率，同

① 如表所示，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期间，捷克的积累的增长速度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年　　份	国民收入（净产值）的年均增长率（%）	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
1971	5.1	31.7
1972	6.0	31.5
1973	5.3	33.7
1974	5.2	34.8

资料来源：J·兹贝克：《1975年的东欧经济》载于《东西方研究报告》1975年第8期。

据有名 的经济学家诺特金估计，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〇年，苏联的积累系数（即国民收入 增长百分之一，积累部分的增长百分数）从百分之一点九增加到百分之四。（诺特金：《对国民收入的增长及其最终利用的估计》，见《关于预测社会经济的方法论 的 问题》一书。）

② “过渡到集约化经济工作的方法和强调提高质量方面的因素具有决 定 性 的 意义。……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如果不在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劳动力，就不能实现，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勃列日涅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选举大会的讲话》，《红色权利报》1974年6月15日转载。）

③ 参看奥塔·希克：《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论据》中的表格。

时迅速增加国民收入。对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来说是这样，就是对职工的平均消费水平也是如此，西方各国的职工平均消费水平也远远高于东方集团国家的水平。东方集团的资本生产率还在继续下降，因此，提高消费水平，甚至要接近西方水平是颇为困难的。正如大多数西方工业国在长时期里的资本系数的发展所说明的那样[1]，西方国家的资本生产率在提高，至少保持了稳定。

在所有东方集团国家里，生产的技术发展和现代化程度较低，为劳动力支付的费用占生产基金的比例很高，这就是苏联经济体制下生产力的发展低于西方各国的重要标志。东方集团，特别是企业的领导人对引进西方的技术和技术知识极为关心，不是偶然的[2]，大力发展的军事工业虽然在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改变上述现象。军事工业部门不仅需要庞大的投资，而且集中了最佳的技术（既有国内的，也有从西方进口的）和最有才能的领导及技术人员。最高的报酬，也为加速军事工业技术发展创造了特殊的刺激。由于在政策上处于决定性的优先地位，军事工业获得了比其他所有部门的优先照顾，因此，这个部门的发展并不能反映整个其他部门的发展情况。在这个部门，一般不计成本，更正确地说，提出了任务后，需要多少就给多少。这里根本没有可比较的成本核算，从而无法说明这种出于政治需要而强制生产的军事产品可以在更经济和更高的生产率状况下把成本再低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多。

当然，这并不能理解为，军事工业部门以外的部门根本没有进行技术革新。由于垄断企业既没有受到竞争的压力，也根本没有

---

① 关于资本系数的资料，参阅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引自埃尔姆蒂特：《资本系数》。

② “在六十年代，苏联的新的机械设备有五分之一是从国外进口的。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进口机械设备的部门，大致上以下列各工业部门的比例最高：化学工业（百分之三十四），车辆和船舶工业（百分之三十四），食品工业（百分之二十三），轻工业（百分之三十五）。这些部门从西方国家进口机械设备，不仅对引进先进技术有好处，而且在扩大机械生产的基础方面恐怕也有重大的意义。”（赫曼主编：《七十年代初期的东欧经济》。）

来自购货者对产品选择的压力，再加上凌驾垄断企业之上的上级官僚无法判断他的下属企业可以进行多大程度和什么样的革新，所以这些垄断企业就可采取随心所欲的态度。经济结构的变动常常要引起技术上的改组、重新培训工人、原材料调拨困难，也就是要造成时间损失和投入更多的物资等，从而妨碍企业日常计划的完成。因此，各企业都尽量少进行技术革新。某些新产品常常是大肆宣传，以便向上级机关报功，这个上级机关又用这些新成就向更高一级的政治机关吹嘘"高价出售"。许多纯粹是形式上的新产品，实际上并不是在花费时间的生产改革的情况下生产的，但它也没有带来什么新好处，企业之所以生产它只不过是为了以这种所谓的新产品获得更有利的价格。即使质量下降了，人们也能以此达到变相提价的目的①。企业往往借助于这种较高的价格轻而易举地提高产值，并可以用来夸耀生产率的虚假的提高。

除了前面谈到的为了宣传而开展的革新外，一般说来，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革新活动都落后于西方各国。居绝对垄断地位的企业很容易象西方垄断企业那样行动。也就是说，在企业没有受到市场压力的时候，采取与西方垄断企业相类似的行动，忽视革新活动，加强垄断地位。但是，这种情况在西方各国是例外。因为绝大多数的企业常常是通过改革的努力勉强地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东方集团各国同西方各国在技术上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因而东方集团各国的生产率的发展也比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缓慢②。

技术发展不快，而且资本的生产率低。与此相关联的就是相

① 商业部长斯沃博达在1975年5月13日的《红色权利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由于产品的质量差，消费者埋怨和发牢骚的事件一年中有两万起以上，国内商业的某些部门必须对此负责。"销售额虽有所增加，但被产品的质量低劣掩盖了。

② 与捷克的生产落后状况（参阅奥塔·希克：《捷克的经济实态》）相类似，东德的数字也表明，它的生产率也大大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如果将东西德的马克按一比一的比价来计算，一九六二年西德的劳动生产率比东德高百分之三十"。（W·盖茨编：《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发展》。）

对多地使用劳动力。不仅如此，原材料的使用量也相对地多，这说明在东方集团国家没有充分利用生产诸要素。在这些国家，重要的原料、燃料和能源的消耗量高，它们在生产单位产品中的平均消耗量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一九六八年春在捷克的详细调查表明，生产资源的浪费极为严重①。在原材料极其贫乏的捷克，资源浪费的情况比西方工业国严重，这种浪费原材料的情况至今没有任何好转②，一九七三年布拉格的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开的材料表明，同西方任何一个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生产单位产品使用的钢铁量几乎高一倍③。甚至原材料非常丰富的瑞典，钢铁的使用量也比捷克少得多。同样的情况在东方集团的其他国家也存在，因为政治领导人批评得最严厉的，莫过于对原材料使用量过高的批评。在东德，由于生产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生产单位产品的一次能源消耗量比西德多百分之二十至三十④，钢材的消耗量超过国际标准的百分之三十⑤。资本货物、原料、能源和劳动力等所有生产要素的消耗都可以说是过分的多了。这一事实极其清楚地证明了生产者，特别是居领导地位的经济官僚对于适当地提高生产率不十分关心。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市场价格，而且官僚们的收入与市场成绩毫无关系，这些因素促使他们对提高经济效果漠不关心⑥。对生产上的主观决定缺少客观的评价标准。居领导

---

① 这些数字参阅奥塔·希克：《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现实》。

② 一九七四年，捷克每生产价值一百克朗的产品，平均消耗价值六十三点一克朗的原料。在西方原料很丰富的国家里，原料消耗率却非常低。如美国，在加工工业的销售额中，原料成本费只占百分之五十四。（《制造业年报，1964——1965年》。）

③ 维森特罗巴：《长期预测的关键问题》，载于《关于预测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论问题》。

④ H·H·赫曼编：《七十年代初期的东欧经济》

⑤ 《明镜》周刊第41期（1974年10月7日。）

⑥ “苏联的科学月刊《经济问题》一九七〇年六月号对原材料的浪费进行了非常有益的研究。研究者们说，苏联的金属切削粉末、废料一般要比工业发达国家多三到四倍。在机械生产中，加工时产生的金属粉末平均达到原料的百分之二十九；在生产特殊机械时，原料的损失更大。如生产农业机械的时候，其损失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五，特别是使用贵重钢生产滚珠轴承的时候，原料的百分之五十七当作边角废料扔掉了。……要生产这些当作废料扔掉的金属，国家每年要花费四十——五十亿卢布。”（贝尔海姆：《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

地位的政治家虽然不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激励，但这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发生作用①。由于在计划和监督生产发展方面，借助的仍然是总产量除以企业职工人数的计算办法，因此，企业关心的是这样一种生产发展，即尽可能地提高生产消耗，从而扩大总产值。为此，企业里的微观生产结构也被操纵了。即使象在东德那样进行了加强企业对计划利润关心的改革，但也不能排除与刚才提到的对生产结构进行操纵的类似情形，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人们可以通过对结构的操纵最迅速地增加利润。

绝对垄断化的企业经常控制生产结构的后果造成了生产结构的发展和需求结构的这种矛盾是非常严重的。消费者（包括居民和企业）对各种产品的不断寻求，即所谓的“追逐”是费力的和令人神经失常的。几十年来，这种未能解决的使经济几乎处于类似战时状态的矛盾，虽然口头上受过批评，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改变。一方面是生产了许多完全多余的、不需要的产品，因为生产这些产品能较容易地完成计划；另一方面，那些非常必需的物资却一直不足，而不需要的产品却被迫作为库存品储存起来，造成无法想象的经济损失②。如果在库存品之外再加上虽然动工，但未竣工的庞大的、而且在不断增加的建筑项目（这是建筑企业的类似利益而造成

① 捷克总理什特劳加尔在捷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许多年前，人们从当时的总理诺沃提尼那里听到过这种要求和批评，今后可能还会听到：“长期来，我们一直为原料、基本资料、燃料、能源等的消耗量过大的问题而煞费苦心，但是，我们对改善生产组织的速度和程度是不满意的，因为它不符合我国工业和强大研究基础的可能性，不符合消费者的要求和嗜好。我们也不能忽视投资资金一方面没有有效利用，同时又不断要求扩大投资的问题。在建筑业方面，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动工、但没有竣工的项目非常多，并且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工期毫无理由地被拖得很长。新建成的项目很晚才投入生产。经常不能为重要的投资项目及时提供器材。”（什特劳加尔：《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党的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

② 据1974年6月26日的《红色权利报》报道，捷克的库存产品的总额到一九七三年底已达二千三百亿克朗，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一百四十亿克朗。这个数字相当于国民收入的约三分之二。据1974年9月24日的《红色权利报》报道，在波兰，这种库存产品的金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七。

的损失)①,这两者就占去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②。在这些不断增大的损失中反映出来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比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严重得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结构上的不平衡发展程度严重时就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哪个企业，都不可能为长期继续生产不需要的产品而调拨资金;可是在共产党国家,这种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则为国家的资金补贴所掩盖。一个企业只要它完成了由上面规定的总的生产计划(而生产计划中的微观结构,上级既不能计划，也无法监督),就能得到相应的奖金。所有的产品，不管它们当时是否需要,都将被另外的生产企业或商业部门购买,因为需求总是大于供给。另外,任何一个企业都想尽量多贮存一些物资,即使这些物资眼下是不需要的,因为企业都知道,现在能得到的东西，到下个月,或下一年也许就得不到了。这样一来,就不是在生产者方面,而是在需求者方面出现了大量库存，而这些库存又不得不用国家提供的不断增加的贷款来支付。因为官僚制的中央机关对此毫无办法,所以生产就在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下继续进行下去。

一九二四年，经济学家们,如托洛茨基派的R·N·库利库曼,曾批评过经济上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并把它叫做供应方面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个被研究的无产阶级的自然社会中,分配是有组织的,但是,供应是没有组织的。具有这种特点的无政府状态就是供应无政府状态”③。按照库利库曼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需求的增长慢于供给的增长，因为商品的分配是在市场上无政府地进行的。相反,在“无产阶级的”经济中，需求大于供给。为什么呢?因为产品的分配虽然是由国家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中央的生产计

---

① 由于主要企业供应的必要部件(设备安装和电气方面的器材、窗户、门及其它)不及时,延长了工程的建筑时间,结果,使未完成的建筑项目越来越多,一鼓作气竣工的建筑项目越来越少。

② 一九七三年,捷克斯洛伐克未完成的建筑项目,总值达二千二百亿克朗。

③ 库利库曼:《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代》,(《共产主义科学院年报》1924年第9期。)

划不符合实际的需求，因此它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供应计划。可是，库利库曼以为，人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制订一个较好的、集中的详细供应计划。但是后来，以至今天，人们看到，鉴于产品多达几十万种，要制订一个如此详细的分配计划，就是使用最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官僚们出于权势利益拒绝给企业以经济上的独立性，拒绝运用有调节的市场，并坚持纯粹官僚制的、不要市场尺度和企业对市场负责的总体计划。正因如此，我前面谈到的这种给人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的分配无政府状态，至今仍保持着。

综上所述，苏联的官僚经济体制不可能使生产力获得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有效的发展。因为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缺乏保证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使生产结构不断适应需求结构、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以及使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迅速提高所必须的经济刺激、经济原则和经济机制。正因如此，也不能保证劳动人民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在过去工业就已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如捷克，消费发展也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更甭说超过他们了①。

经常只谈“伟大的生产增长成就”的宣传，故意不谈：如果上述损失不出现，如果以高效果生产增长代替了这种浪费的、基本上是外延型的生产增长，人民的消费将得到多大的提高。

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法国差不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已落后于所有西方国家，官僚体制的理论家却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认为改革派经过充分计算而提出的目标也是不够现实的，即：借助于体制改革和各种经济政策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几个比捷克稍微发达的西方国家（如奥地利）。哈伊耶克先生以讥讽的目光看待改革派的目标，这位教授在说改革派的主张是主观臆断。难道他在进行批判之前，不应该充分研究改革派的计算和力求达到的具体先决条件吗？在嘲笑改革派之余，难道不应该分析“社会主义”的捷克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为什么落后于奥地利吗？（参阅哈伊耶克：《民主化还是破坏民主》。）

对工人的剥削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个基本准则。资本私有者占有剩余价值（新创造的价值超过生产性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必须是变革为一种对新创造出来的价值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分配①。消灭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不意味着消灭剩余劳动本身，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从事生产的人们必须创造剩余产品，这就是说必须生产出比直接用于生产的和个人消费更多的东西。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只不过是一般社会都必需的剩余产品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没有剩余产品，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无法生存下去②。这一点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特别强调。他们把剩余价值这个范畴同它的一般的历史性质割裂开来，而且不能批判地看待现在官僚体制的“社会主义”的剩余产品，也就是说，不能研究这种剩余产品和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有什么共同之处，它是否实际上已基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即可以说生

① 参阅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九卷，第15—35页。)

② “当然，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门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社会需求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把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为社会上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不断进行的劳动，包括到1. 必要劳动和2. 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50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990页。）

产者受剥削的状况已被克服了①。

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有化，当然就不再可能有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剩余价值的问题了。但这还远不能说：创造的价值已真的按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分配了；剩余价值真的在有利于生产者的情况下被用于社会所期望的目的；或在他人占有和利用剩余价值这个意义上的对工人的剥削已不复存在了。按照恩格斯的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即使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剥削依然存在，因为工人还只不过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对剩余价值的使用没有决定权②。这一点在官僚制的国家里，情况又是怎样呢？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想到的是：在革命后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较多的过渡时期以后，要有意识地消灭国家。作为异化了的政权机构——国家，连同它的官僚机构、警察、监狱和其他镇压工具应逐渐消亡，应让位于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③。这一期望也反映在马克思的这一设想中：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产品分配虽然必须包括对非生产性的一般管理费用的

---

① J·Y·卡尔维特在评论我的《第三条道路》一书时这样写道："不知是有意还是由于无知，奥塔·希克根据他错误的观点，把剩余价值与含糊不清的剩余或增值的概念混为一谈了。他竟然宣布，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还存在剩余价值。……而且还计算出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的剩余价值率。"（卡尔维特：《社会主义，还是戴上了人道主义假面具的资本主义？》，见《工人之声报》1973年10月12日）

在九泉之下的马克思要是知道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是怎样理解剩余价值的，并如何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的话，不仅会感到焦急不安，而且会感到痛心。卡尔维持至少应该知道这样一种道理：即在西方国家统计中所说的增值，大致等于新创造的价值（即通过劳动而补充到生产资料价值中去的价值），而且从这种新创造的价值中扣除工人的工资金额后剩下的价值大体上相当于剩余价值。当然，这是剩余价值的近似值。如果东西方都是以同样方法来计算，那么，这一剩余价值额就有可能作剩余价值率进行比较。在所有社会生产方式中，都要产生剩余产品，所不同的是，剩余产品由谁占有和怎样利用它。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已阐述得非常清楚。

②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已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九卷，第240页。）

③ 参阅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第四章第一节。

支付，但他同时又强调："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立即极为显著的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①

但是，在东方集团里，马克思的这种愿望根本没有实现。国家机构不但没有缩小，而是跟马克思所期待的国家消亡完全相反，国家机构在逐年扩大。据苏联的资料表明，官僚机构的扩大比生产的增长还要快②。这种资料本身就有珍贵的价值，尽管它只限于经济机构。资料虽然没有谈到政治和行政机关，但根据作者多年的经验，可以肯定地说，整个官僚机关比生产、文化和社会医疗事业发展得更快，发展得最快的是警察、公安和民兵机构。然后就是党的机关，它与整个行政和镇压机关齐头并进，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党的领导作用。

这个与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全部是靠剩余产品来维持的。但是，有关这些机构的规模和费用是非常保密的，所以人民不仅不能监督和评论，而且要受这些机构的控制和镇压。因此，把大量剩余产品用于这种目的可视为是与工人利益毫不相关的占有，因此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继续存在的剥削。正出于这原因，在东欧集团国家根本没有按马克思主义所阐明和论证的"剩余产品"这一范畴进行过计算和统计。这并不是因为统计上有困难，而是因为官僚们对这种研究和计算没有兴趣。他们不仅对剩余产品的总数保密，而且尽量不发表有关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利用的所有详细资料。

长期来，有关国民收入的数字都严格保密，到六十年代，这些数字总算公开发表了，但只有一个总数字，能说明社会结构的数字极少，而且还加上了含糊不清的注解。因此，为社会创造新价值的人们几乎无法知道剩余价值的数量和利用情况。持反官僚制态度的经济学家们尽管遇到了统计上的种种困难，但仍然对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九卷，第15—35页。）
② 参阅本书第三章中"共产主义制度下官僚集团的特殊构成"一节的统计图表。

国家的剩余产品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剩余产品的价值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更大①。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发表的数字是捷克经济学家J·库列季的计算数字，他的计算表明，捷克、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率（剩余产品率）比法国、奥地利、挪威等大致可比的西方国家还高，这一点也不能归诸于东方集团国家从事生产的人可以从剩余价值中得到比西方国家更多的东西。

今天，在许多西方国家，已建立了职工医疗和养老的保险制度，其保险程度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比东方集团国家的差，甚至还要超过这些国家②。因此，不能用社会保险支出这个因素来解释东方集团国家的剩余产品之所以较多的这一状况。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远远大于东方集团国家。西德就是一个例子。下面是一九六九年西德等几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比较表（社会福利支出包括：A、为老人、病残者、工伤者及其家属的抚恤支出，B、为医疗卫生的支出，C、为战争中牺牲者提供的抚恤金支出，D、其他方面的支出）：（见165页。）

社会主义各国为教育事业提供的费用对工人和其他生活困难的家庭的子女是有利的。因为这些子女不仅整个普通教育是免费的，而且在接受高等教育时还基本上可以享受助学金，从而可以在学习期间能过上相当好的生活。但是东方集团国家的教育经费无

① 参阅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第235页起。）

② "捷克实行养老金制度，退休前有工资的人在工龄超过一定的年限之后，有权领养老金，还可根据种种情况（工龄和收入的多少等）领补贴费。几十万领养老金的人，虽然开支控制在最低水平，但由于养老金的金额非常少，所以只靠养老金无法维持生活。养老金的金额一个月约五百五十克朗。可是政府计算每个人最低的生活费一个月需七百八十九克朗。一九七四年的平均工资是二千二百三十二克朗。只领取五百五十克朗养老金的老人因此还必须依靠子女抚养，或继续参加劳动。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无权领取这个最低数字的养老金，这些人就是在劳动力衰退的晚年参加合作社，也常常领不到养老金。

一九七一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均公共社会福利支出为七百六十四马克，只相当于西德的一半左右。"（布吕尔：《东德的经济》。）

	东　　德	捷　　克	西　　德
社会福利开支 ＝社会所得①	121亿 东德马克	389亿 捷克克朗	780亿 西德马克
国民收入②	1,072亿 东德马克	2,940亿 捷克克朗③	4,435亿 西德马克
社会福利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	11.3	13.2	17.6

注：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西德法兰克福 1971 年出版，第 322 页。

② 西德的数字是按东方的方法换算出来的，参阅1973 年《经济研究季刊》中《东西方社会产值比较》一文。

③ 参阅1972年《出生统计表》。

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或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比西方工业国低①。因而就这些国家的整个教育来说，不能说比西方各国的普

---

① 一九七〇年国家支付的教育经费情况为：

国　名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	在财政支出中的比率%
苏　联	6.8	12.8
东　德	5.1	8.3
保加利亚	4.8	8.9
捷　克	4.4	7.0
匈牙利	4.5	6.9
美　国	6.5	17.9
西　德	4.0	13.8
意大利	4.3	20.2
瑞　典	7.8	30.2
日　本	4.1	20.4

资料来源：K·方·盖梅：《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第131页，

及程度高①。因此，这方面的支出也不能作为解释东方集团国家剩余产品率高的理由。另外，在西方各国必须把资产阶级家庭（也即所有不能免费和获得奖学金的学生的家庭）的学费支出计算进去。这样一来，在教育经费的开支方面，差距就更加小了。因而用为劳动人民提供的教育费用大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剩余产品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的差距是不行的，它只能说明剩余产品中的极小一部分的情况，而不能解释剩余产品中的主要部分的情况。

前面已经提到官僚机构的庞大物质开支，这儿就暂不说它。剩余产品的第二位支出是用于投资活动的支出。积累基金较高决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相反，它是下列现象造成的：

第一，由于技术发展缓慢，资本生产率低，投资产品的质量低不得不日益靠用数量来弥补。

第二，由于原材料的严重浪费、生产结构不适应需要、商品滞销、外贸亏损和工程项目不能按期完工等所造成的惊人损失，使得国民收入与需要的资金积累相比变得太小了。

第三，由于需要大量投资的重工业不成比例地过分发展，使得生产结构缺乏经济上的合理性。这种现象既是上述滥用和浪费原料、金属半成品、能源等所致（它要求重工业过分发展），也是日益加强军备的结果（军备生产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

但是，也不象教条主义的共产党理论家所说的那样，积累的不合理发展是由于发展军备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是“外部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因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扩充军备（这里我们暂且不谈整个军备竞赛的政治方面，因为那是一个很复杂的

① 在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工人的平均学习时间比西北欧国家短，跟美国比较就相差更远了。这些国家的工人的学习时间是：美国为十一点六年；西北欧国家为九年；苏联为六点八年；意大利为五点三年。

六十年代中期，高等学校毕业生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率：美国为百分之十一点八，苏联为百分之三点八，西北欧各国为百分之三点二，意大利为百分之二点六。（P·扎盖尔：《东西方的技术差距》。）

问题）。尽管有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等）的国防费用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相当高，但是这些国家的积累并没有出现象东方集团国家那样的发展[1]。东方集团国家存在的那种经济损失和浪费现象，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过高的积累率，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都是不能容许的。

这种"社会主义"的积累只给人民带来极少的利益，相反却减少了他们的浪费。共产党人说西方的积累只是为扩大私人资本服务，但是这种论证对东方集团国家的工人来说根本不产生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家资本的增加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相反，由于那种体制造成的巨大浪费和官僚们追求权力的政策，人民的消费相对减少了。

工人非常清楚，官僚主义的经济体制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损失，而且这种损失都要由降低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来弥补。如前所述，由于不需要的产品的库存量不断增加、未竣工的建筑工程项目日益增多、投资上的失误（包括在建设中或竣工以后带来的问题，从而不得不修改投资计划或生产计划）、为弥补生产或外贸中出现的亏损而实行的国家补贴不断增加，这一切都必须从剩余产品中支出。这对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利益，只表明官僚机构和领导的无能。一九七三年，捷克为弥补外贸亏空而付出的国家补贴就达四十八亿克朗[2]。

东方集团国家的人们感到，这一切就是对他们的劳动的剥削，尽管他们不能从理论上来说明这种剥削，也不能计算这种剥削的严重程度，但对他们来说，下面的事实是重要的：他们的实际工资和其他生活条件远远低于西方，而大张旗鼓宣传的"消灭了剥削"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工人们看到，由于不能经常供应需

---

① 西德的积累率（纯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一九六八年为百分之十四点三，一九六九年为百分之十六，一九七〇年为百分之十七点四。（《西德统计年鉴》1972年版。）

② 1974年6月26日《红色权利报》。

要的各种物资而不得不停工待料，白白浪费了许多生产时间，然后又不得不加班加点，成立突击队来完成生产计划指标。对工人们来说，“计划”就等于官僚们的不负责任，他们既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也不能在发展和利用他们的劳动成果方面享有任何监督权和共同决定权。

当人们注意观察由于官僚不负责任而造成的剩余产品的种种浪费现象时，人们也就不会再对官僚们不愿计算和公布剩余产品利用情况而感到惊奇了。很显然，这里的劳动人民受的剥削，即使不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更厉害，但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官僚们丝毫不愿听到有关计划的民主化或是由民主选出来的人民代表提出种种供选择的计划方案之类的意见，也不愿听到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决定国民收入的使用，决定投资和满足人民的种种需求的意见。

只有工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供人民代表选择时，人民代表才能真正对将来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只要计划当局只拟定唯一的一个计划方案，而党中央委员对它既不能理解，更谈不上进行评价，从而使得这个计划在中央委员会上往往不作任何重大修改地就被通过，只要这种形式上的决定是由居垄断地位的党中央委员会来进行，而根本不存在对各种方案进行自由、民主的讨论和选择的可能性时，那么，有关国民收入和剩余产品的创造和利用，也只能由官僚们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官僚机关占有和处理剩余产品也只能是一个**剥削的过程**。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就这样被国家官僚制的剥削所代替，因此，这决不能看成是社会主义劳动力的解放。

人 的 异 化

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所引起的人的异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另一个根本愿望和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准则。但是,这一准则在苏联社会中没有实现。人的异化有各种形式，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认为通过革命变革社会能够完全克服人的异化现象,这是一种不符合现实的观点①。尽管异化现象能否从世界上完全消除,这还是一个未作定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这项最基本的要求简单地作为“哲学问题”而撇在一边,完全不予置理。

在今天的发展阶段上，要克服由于进步的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劳动异化恐怕是困难的。人的许多基本需求还没得到满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连饥饿还未消除。尽管劳动分工把许多人的一生都束缚在单调的、扼杀精神的劳动上,但是废除分工在现阶段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倒退，其结果不仅不能减少饥饿现象，反而会使之更加严重。尽管这样,在这个领域内还是有许多事可以尝试,有的也正在试验中。在独立自主的劳动小组内部实行的以扩大活动领域和加强个人责任的劳动改革为目标的劳动轮换制就是一些应予以支持、发展和普及的试验②。

但是,进行这些试验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那里人们注意的不是人和减轻人的劳动问题，而是完成计划的问题。当然在那里也在进行把劳动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创造一个健康、清洁和舒适的劳动环境的试验，但完成计划超过对人的关心。所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和其他劳动竞赛组织的目的都是一个(通过增加劳动提高产量来扩大生产,并刺激其他工人使他们的劳动生产也达到同样高的水平)。同时把这作为工人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一方面用加强劳动强度来增加产量,另一方面,又由于官僚计划和领导上的错误而造成几十亿的浪费，几十亿个工

---

① 参阅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第111—125页。

② 瑞典的福尔福公司的试验、挪威的诺尔斯克许德罗公司的试验(参阅G·皮尔:《从集体决定到自主决定》)。

时的浪费。尽管如此，这些现象几乎没有引起共产党的政治家们的深思。

尽管在克服过于僵化的劳动分工方面现在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还不能到达这样的发展阶段，消灭或那怕是减少那种关系到劳动创造性和吸引力的巨大劳动差别。因此，把克服由于分工产生的劳动异化作为现实的政治目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不现实的，难以做到的。

但是，在克服社会决定方面的异化的条件不仅正在成熟，而且在劳动生产率迅速发展、以及人类环境遭到威胁和出现了世界性灾难的现阶段，克服人的异化已成为任何一种社会改革的决定性要求。然而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在这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人的异化在日趋严重。绝大多数人民不仅无权参与有关社会发展进程的决定，而且日益与经济、政治、文化、情报等方面的意志形成和决策相脱离。

工人几乎不能参与对生产资料、企业活动和劳动成果的处理。他们丝毫不能变更对生产、投资和分配方面所作的决定。他们对人事问题也不能施加影响，甚至对与自己的劳动报酬有直接关系的决定他们也不能反对。工人知道自己是无权的，因此，他们按自己的办法来对待与他们完全异化了的世界。由于他们的实际工资低，而且也不把官僚化的企业看作是自己的企业，所以工人们就学会了依靠自己的双手。他们盗窃本厂的原料、工具和产品，这种状况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从而足以说明国家所有制已发生了异化。

工人们在上班时间偷懒，下班后则用从工厂偷来的材料做私活。因为集体的修理行业发展不足，于是私人行业就很兴旺。这样，私人地下劳动就变得习以为常，偷窃“非己的”工厂的原料已成了工人的普遍“道德”。在商业部门，短缺商品的走后门、偷盗、侵吞行为不仅发生在下级人员中，而且也发生在领导人员中。尽管这种现象在个别情况下被发现的时候要受到重罚，但这种“自寻门

路"的办法仍在不断增加。因为这是对许多官僚的错误领导和愚蠢行为的一种自发的反抗。

在无法偷盗的服务性行业里，贿赂成风。病人为了缩短候诊时间和摆脱官僚主义"流水作业"的办事方法，就向国家卫生部门的医生行贿。在高等学校里也存在贿赂现象，父亲们为了使子女能上大学不惜违反"干部规定"，经常去干预入学考试。最近，这种坏作风甚至发展到升入中学和评定毕业考试成绩等方面。政府部门也贿赂成风。对小官员们来说，这种"收入"只是一种补贴，弥补因支付修理费和购买零件等短缺商品而不得不多付的钱。党的高级官员当然也需要很难弄到手的零件(如汽车零件)、地下私人劳动力及其他东西，而他们可以依靠同自己任命的生产和商业单位的经理之间的"关系"弄到这一切。但这不叫贪污，而被称之为是一种照顾①。

这种状况和大张旗鼓宣传的东方集团国家的市民们的"精神一致性"没有丝毫关系，而且也不可能通过教育和宣传鼓动而加以克服的。因为它是人们对几十年来不断受到批评、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在矛盾和错误中继续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一种反应。这是各种机关与普通的人严重脱离的反映，是人们之间相互害怕和相互异化的反映，也是人的自身异化的反映。经济缺点越严重，社会幻想越破灭，以及信念和对前途的信心越丧失，人对物质利益的要求就越膨胀，个人利益和短期内致富的要求也就更加强烈。党的理论家们想通过鼓励工作改变人们利益的这种毫无意义的功名心②，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人首先是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党的理论家们，正如他们

---

① 一九七五年春，比尔森区委第一书记由于贪污被撤职，这是由于程度过于严重。

② "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取得效果的标准之一是协调个人、集体、整个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卡泽：《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负责人》，《红色权利报》1975年6月13日。)

不能承认体制中的各种矛盾一样，几十年来只是不断徒劳地试图“改造”人，以宣传鼓动的言词来“造就”人。即使进行宣传鼓动的人自己也并不认为他们的宣传工作具有教育人的力量，但他们还是这样干，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这只能说明这种官僚活动的荒谬性。

当人民从切身经验中知道，真想改变现状、并对制度进行善意批判的人最后只得被迫沉默，而那些无能的机会主义者却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在此情况下，他们只能是：一部分人将适应这种环境，同流合污，并尽自己的能力向上爬。在政治上不可能飞黄腾达的人，则试图依靠人事关系至少求得一个舒适生活。而连人事关系也无法依靠的人，则从事干私活、黑市买卖或接受贿赂等来达到同样的个人目的。另一部分人，由于所受的教育和形成的人生观不允许他们以这种方式为这个制度效劳，他们则回避一切公众生活，退缩到极其狭小的圈子里生活。这种退缩到家庭和朋友的小圈子里去，并以那种漠不关心或轻蔑的态度对待公众和政治生活的态度，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些国家的人们中存在着一种强烈追求周末别墅（常常是在郊外的木板小房）。一周里，有五天必须工作，而另外的两天则在郊外，在狭小的圈子里度过，以便能再熬过另五天工作日。

不管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社会体制满意不满意，也不管他们是否关心这个体制，是否恨这个体制，人们都必须生活下去。但是人可以忘却自己不喜欢的、而又不能推翻的体制，与此同时，可以寻找个人的欢乐，这种欢乐可以随时随地帮助人们忍受烦恼。有的人建造小庭院寻欢，另一些人则玩牌作乐，有人集邮，也有人喝酒，还有一部分人则正在节衣缩食，或已经节约了十五年，在想着什么时候能买到一辆小汽车，正愉快地等待着；有的人则把所有的钱吃光，或研究烹调。只有在为了买肉排长队的时候，或买不到满意的蔬菜和水果的时候，才想到体制的问题，还有就是不得不挤在专区

接待室里为办理某项行政手续而等候几小时或为了一袋水泥要等几个月的时候，或为了配一个汽车零件必须从早晨三点起床奋斗甚至还买不着的时候，或者当他们弄不到他们所需要的那种钉子时，或者一年只能有两次买到手纸的时候等等，只有在类似上述情况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自己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体制下。

但是，人们每天都要遇到体制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就习惯于那种体制了。“人们不能一年到头处于愤怒状态，如果人们不能改变这个事物，而生命又是短暂的”。所以，对消费状况的不满、对西方的和时髦的物品的要求、暴食狂饮等，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表现（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去和现在所表现的那样）。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异化情况，只是抱怨东方集团国家的消费没有西方国家那样不受约束。人们甚至向往西方各国的消费条件，而共产党政府则尽力压制人们的消费欲望，但毫无成效，因为官僚本身首先就是在为自己的物质享受而忙碌着。也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在有计划地促使人民追求享受，因为专心致力于消费的人不会对社会体制造成很大的危险。

当然，愤怒、反抗在加剧，有组织的反对派也在日益增长，并常常潜伏于上面提到的一部分人民中间。而且，漠不关心与愤怒、躲进自己狭窄的世界里与对立、绝望和反抗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不仅反映了这部分人民的不同倾向，而且也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不断发生的态度变化。今天对什么也不关心、只注意自己小花园的人，明天也可能在一条能带来一线希望的消息鼓舞下成为变革社会的积极战士。对这种制度不仅不支持、而且强烈反对的人，数量是如此之大，从而只要有一小点机会，这部分居民就可能成为活跃的反体制者。胡萨克政权没有得到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的支持，而且这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是这个体制的反人道主义本质的反映。这个体制不仅直接刺激了这样一些人的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没有愚蠢的官僚制阻碍着社会的发展，生

活将会过得更好，而且这个体制也引起了那些更多地考虑“私利”的人的反对。

因为镇压和迫害在各个方面都很厉害，所以能够活跃地开展抵抗活动的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能够认识胡萨克体制镇压反对派的政策实质、决心在政治上进行反抗、并想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人，必须是在道义上有很大勇气的人。反体制者们越是受到世界舆论或国内舆论的支持，政权体制要使他们沉默，进而镇压他们就越困难。各种反体制派的人们，尽管追求各自不同的社会体制，但是只要他们反对官僚体制，为人类解放而斗争，那么他们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人士。

官僚们把捷克的改革派称作机会主义者，这实在是太可笑了。所谓机会主义者应该是不顾前后因果，只追求个人利益和有利地位的人。今天，全国人民都认为，机会主义者就是那些在“布拉格之春”的时候，受到舆论的谴责而担心失去自己的地位的政治家和官僚们，正是他们同邻国的、同样处于惶恐不安的官僚们相勾结，用暴力镇压了改革运动。人民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的这些看法怎么能为这些政治家们的谎言和煽动抹掉呢！切身体验非常深，它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心里。在这种日常的体验中，包含着政治家们的言论同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体验保存在人的头脑中，所以既不会忘掉，也不会被其他花言巧语所蒙骗。

很多人由于无法忍受这些矛盾而陷入绝望之中。特别是这样一些人，即曾经渴望找到伟大的思想和憧憬着未来，而如今知道自己却是陷入幻想，突然受到现实的强大冲击，感到希望幻灭，对前途失去信心，因而感到生活毫无意义①。人的自身异化、孤独、忧

① “在我国，遭受不幸和受命运蹂躏的人非常多；有只靠少得可怜的养老金过活的孤独老人；有无法维持生活、失去了劳动和学习机会的人；有甚至连我国贫困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的、无家可归的人；有得了慢性病、因得不到床位不能住院治疗的人；还有无数的醉汉，一百五十万在押犯，他们往往是盲从的和不公正的司法机关的牺牲者；还有从正常的生活中永远被排挤出来的人，这些人往往是这样一些倒霉鬼，他们不知道应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行贿。”（萨哈罗夫：《我的祖国和世界》，第 15 页起。）

愁、没有慰藉、绝望和厌世，使得他们走上毁灭自己的酗酒、甚至自杀的道路。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造成的人的异化的集中表现①。的确，这种现象是由种种相互矛盾的、极其复杂的原因和进程引起的。但是不能忽视社会的重要影响，社会内部的、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和它对那些敏感的人所产生的无法忍耐的压力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正确地控诉了资本主义的关系，但"社会主义"关系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而且使自杀率不断增加，这也是事实。这是对这种制度一种最强烈的控诉②。

在那些西方式的生活观已经形成的匈牙利、东德、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的反抗都被俄国的坦克镇压了，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属于新的俄国帝国主义，这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绝望和彷徨。正是在这些国家，人民的自杀率

---

① 参阅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第120页。

② 自杀和自我伤残率最高的欧洲十国顺序表：

顺序	年 份	国 别	自杀和自我伤残率（每10万人）	自杀和自我伤残人数
1	1971	匈牙利	36.1	3,737
2	1970	东 德	30.5	5,196
3	1970	捷 克	25.3	3,627
4	1970	奥地利	22.7	1,694
5	1970	瑞 典	22.3	1,790
6	1970	丹 麦	21.5	1,060
7	1970	西 德	21.2	13,046
8	1970	芬 兰	21.0	983
9	1970	瑞 士	18.4	1,150
10	1970	法 国	15.4	7,836

根据联合国《一九七二年人口年鉴》编制，1973年纽约版。

高，甚至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决不是偶然的。尽管有许多其它因素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但是，特殊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社会体制所决定的因素起的影响却是不能忽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应特别加以考虑的问题。

一个制度，如果它突然要强迫人民违反他们一生所受到的教育、利益发展和生活方式，走完全不同的新路，按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朝着不同目标去生活，而又不给他们以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根本不给他们以参与缔造生活条件和树立人生目标的可能性，只是强迫他们无主见地顺从事物的发展，那么，这种体制必然导致前所未有的人的异化。官僚们一方面宣称他们最了解人民的要求，并知道如何按人民的利益安排生活，而另一方面他们却避而不谈，他们在处理各种事务中优先考虑和追求的是他们自己的、与人民利益根本矛盾的利益，特别是权势利益。这样，官僚们就必然使自己处于被大多数人民憎恶的境地。

地位高的官僚只跟身边的人来往，对他们来说，只有上层的利益、愿望和力量变化才是重要的，而一般人也不向他们讲心里话。因此，官僚们根本不了解人民的真实心理和思想活动。他们也绝不能理解劳动人民的感情，从而也只能凭借政权工具来统治人民。这种彻底官僚化的体制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异化于人民的体制。

国家垄断体制与社会矛盾

一个社会制度，如果它不能比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更为有效地发展生产力，那么，它也不能保障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如果它不能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同时造成了比过去任何社会都严重的人的异化，那么，这种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数百年来对人类彻底解放的幻想基础上制订出来

的基本准则，在东方集团国家里并没有变成现实。尽管官方的共产党理论家们大声疾呼地作了一些不同的解释，但他们无法反驳人们对这个社会形态提出的基本批评。他们不敢在自己的刊物上和广播里公布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批评，他们只能依靠严格的检查制度，禁止自由讨论和单方面地公布他们的主张。这些事实证明，党的理论家们无法反驳真理。

在这种国家垄断体制中，掌权的是历史形成的特殊的政治官僚。他们脱离人民，他们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权利益（从国内外加强自己的政权地位），他们剥削和压迫人民，千方百计维持已严重妨碍生产力有效发展和影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关系。他们以巧妙的手法控制情报，实行严格检查制度，垄断教育事业，控制科学、艺术的发展，通过国家机构宣传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变成新的信仰教条。这样，他们就以历史上罕见的方式，把公众思想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他们在经济上的权力是建立在国家垄断和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分配所有产品的基础上的，而国家这个中介完全为党官僚所控制，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人民的监督和提出自己要求的可能性。

在六十年代，南斯拉夫著名的共产主义体制的批评者米·吉拉斯[①]提出，党的官僚具有一种新阶级的性质。后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吉拉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的阶级概念进行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之前意大利的B·里齐就认为苏联的官僚是一个阶级，并试图对这种看法进行论证。现在安·卡尔洛的著作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回忆。卡尔洛提出了一个关于苏联官僚阶级的理论，并以官僚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存在为根据，论述这一理论[②]。这个理论值得注意，而且在很多方面得到证

① 参阅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体制的分析，第49页起。

② “但苏联的现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应理解为不受任何监督的、有益于自己的支配权）属于官僚们，官僚作为一个整体应看作是一个阶级。不能以单个的官僚不拥有个人的支配权来反驳这一观点”。（卡尔洛：《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1917—1975）》）

明。

这里虽然不能从哲学上来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但应提请注意的是：它首先涉及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是否完全正确地概括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所有特征，是否只能不作任何修改地接受它，或者应作进一步补充和修改①？如果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党垄断着对生产资料、劳动和产品的占有权；如果在哲学讨论中承认，一个社会集团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独自拥有支配权，这就是一个阶级的普遍有效的特征的话，那么，把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党的官僚看成是一个新的阶级，这基本上也就是正确的了②。

曼德尔认为，苏联的官僚体制不可能是个阶级，因为推翻了官僚体制（如果社会主义体制不继续保持的话）并不能带来其他生产方式。他的这一理论③是不能说服人的，是没有对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进行充分分析而作出的结论。总之，曼德尔认为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具有官僚体制的缺点。他还认为，"一个阶级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存在，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这种看法也丝毫不能改变苏联的现状。第一，在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社会制度，它的统治阶级是在这个制度出现后而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如奴隶主

---

①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382—383页。）

② "把生产资料国有化和无阶级社会视为一体的观点一直为许多人所接受。这种观点不是以同义反复的论证方法来论证的（这就是说，只根据是否存在私有制来给阶级下定义，从这个定义出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私有制不存在了，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即在经济领域里废除私有财产之后，统治国家机器的阶级就不存在了。然而，只靠逻辑的力量是证明不了这种观点的。这种观点不适应俄国。在俄国存在统治阶级，这是毫无疑问的，再清楚不过的事实，而且这个阶级在管理国家机构，这在今天也几乎是无需论述的事实。"（克罗斯兰德：《社会主义的未来》。）

③ 恩·曼德尔：《论官僚制》，第52页起。

阶级)。第二,即使在历史上不存在先例,但这也丝毫不能改变下面这一事实,即政治官僚在历史上第一次单独垄断了生产资料、生产和生产成果,而且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官僚变成了统治阶级,并用暴力排除了其他阶层或阶级对垄断性的管理提出异议和变动的可能性。只有通过人民斗争从这个阶级的手中夺取政权,并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现体制的民主化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所有决定过程的民主化,才能结束这个特殊阶级的统治,铲除这个官僚体制的统治阶级,这也正是东方集团国家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

尽管在这本书的范围内不可能讲清"阶级概念"这个一般哲学问题,但这也丝毫改变不了这样的现实,即党的官僚已成为国家垄断体制中的一个实行独裁统治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的特殊的、异化于人民的利益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

即使在苏联对外政策中也明显反映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的官僚权势利益及其对反民主的目标的追求。

我不想在这里全面阐述东方集团国家的对外政策,因为这要求详细分析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发展、以及苏联对这些关系的影响,它超越了本书的范围。但是这里应简要证明和强调一下列宁的下列理论的正确性。那就是:对外政策总是与国内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是与镇压民主联系在一起的① 。苏联的官僚们在国内无视人的现实要求和利益,压制一切民主要求,这就决定了它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帝国主义的大国态度。他们在观察其他各国和民族政策时(不管这些国家是在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标准,即看它是否有利于苏联政权的巩固,是

① "想把'对外政策'同一般政策分开,或者甚至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立起来,这是根本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看法。帝国主义无论在对外或对内政策中,都同样力求破坏民主,实行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无疑是一般民主即一切民主的'否定',而决不是民族自决这一民主要求的'否定'。"(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35页。)

否有利于扩大苏联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直接或间接的权力影响，以及是否有利于加强苏联国家和党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霸权。从这种扩大权力的目的出发，苏联采取了帝国主义所用的各种手段,借助于经济影响、武力威胁等，直接地或间接地使其他国家的政策从属于自己。

当然，苏联的官僚们就是在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质的场合，也要给自己制造对别国行使暴力的根据，制造本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受到威胁的理由。但是，这种以所谓维护自身利益、被迫自卫和预防为理由进行辩护的作法正是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惯用的手法,它丝毫不能掩盖这一政策的真正的扩张本质。迄今为止，苏联的官僚从来就没有在事态发展与其权势目标和霸权要求相矛盾的情况下，自觉地尊重其他各民族和各国人民的利益及其发展的愿望；在不能使用暴力的情况下，他也起码要对不甘心屈服的政府给予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最严厉的制裁。而且，当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好地确保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畏惧地使用残酷的暴力,肆无忌惮地镇压别国人民。

苏联官僚们采取的帝国主义政策，把列宁曾经从理论上提出的在社会主义阶段各民族应享有的权利变成了何种无稽之谈。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充分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列宁说，不愿意承认各民族的这种自由的政党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①。可是,今天的大俄罗斯主义的官僚们却正在不折不扣地用镇压其他各民族的自由和自决权来实行列宁所说的这种背叛行为。

捷克的改革派从未要求过脱离与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联盟,也没要求退出华沙条约。他们要求的只是希望尊重捷克在所

① 参阅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137页。）

有国际机构中的平等地位，不干涉并尊重他们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的自决权。但是，捷克的反官僚体制的态度在邻国产生了影响，这些国家的官僚们感到民主的发展危及他们的权力地位。而这些就足以促使苏联用坦克来残酷地镇压捷克的、对社会主义世界也具有深刻影响的尝试。官僚们对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是漠不关心的，因此他们不考虑这一侵犯会在世界范围内对人们的思想发展带来什么影响，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也只有这样的官僚才能采取这种入侵行动。但是，它使苏联权势范围内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越来越高涨。

正如在国内提出各种“精神”要求一样，官僚体制的当权者在国际范围内所采取的每一个所谓和平行动和倡议也都是为了追求某个政治目的。例如，当他们动员人民增加生产时，对官僚来说，重要的不是人们真正在想什么，而是被官僚机关在“精神”上调动和动员起来的数字。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对苏联的官僚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些行动是否对生活在不同国家和制度下的人们产生一些思想影响，使他们之间的相互态度有所改变，重要的只是唤起和平假象，从而给苏联统治者带来各种经济利益。和平政策就可能变成军事行动，因此，当他们认为采取军事行动是扩大苏联权势影响的更适当的方式，那么，他们就会在刹那间用军事行动代替“和平行动”，根本不考虑人的生命。

尽管官僚们把这种官僚体制标榜为“社会主义”，但它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人们不能承认官僚体制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们单独有权决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内容。否则，“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成了不自由、压迫和落后的同义词了。在苏联，或在苏联实力影响下的小国确立的体制，只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更严格说，应该是国家垄断主义的，和彻底官僚化的体制。揭露这种体制反社会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实质并不意味着肯定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恰恰相反。苏联共产党体制以国家垄断体制

的形式固定起来，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消极特征已在苏联的制度中占统治地位。这些消极特征表现为工人们越来越不关心争取最佳经济效益，反映为国家的剥削日益加重和人的异化日益加深。揭露苏联体制的国家垄断状况是为了把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争取把这种体制改变成**民主的、人道的和真正社会主义制度**。官僚们抬出来的“反共”这个吓唬麻雀的草人不可能阻挡反对官僚歪曲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伟大历史理想的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斗争，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反对歪曲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是同已知的官僚制祸根的斗争。捷克的改革派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行动。在实行国家垄断制的国家里，使**反对官僚制的内在因素**发挥作用，使企业变成独立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并在有调节的市场关系中，从经济上迫使企业尽可能有效地发挥其管理、研究、投资和生产活动，才能克服经济的官僚化。只有在**外部的**反对官僚制的因素也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政治和宏观经济计划实现了民主化的情况下，官僚们的政治统治才能被推翻。

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民主中主要因少数特权者掌握资本所有权而带来的缺点和不平等。任何利益集团，任何官僚都不应该拥有特权，不能以此把他们的特殊利益强加给大多数人民。为此，必须实施以下各项原则，并使其制度化。也就是说，允许存在各种利益集团和组织；通过独立的宣传工具，自由地发表不同意见；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制度相结合；建立企业职工的集体资本所有制；保障少数派的权利的同时，实行多数决定的原则；取消职业政治家；修改宪法条款时，由人民直接投票；实现选举和罢免一切领导人；确保少数派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各种利益代表参加下，由委员会制订出几种可供选择的宏观计划，经人民讨论后对计划作出抉择；计划的选择与政治竞选相结合；研究各种利益的单位应独立存在，并与群众宣传工具密切结合；国家应对

不同的群众宣传工具给予财政支援；以及实行其他和类似的加深民主化过程的制度。

争取实现上述民主化和推翻官僚统治的斗争，迟早会在所有东方集团国家里发展和壮大起来，因为压力总要引起反抗的。在俄国这样一些从来不知道真正的民主的国家里，这个过程可能相当长。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国家里也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是人民日益要求民主和自由发展的一个表现。这一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技术、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在苏联，其典型的代表是以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为首的小组织。年轻的技术员、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甚至包括熟练工人和进步的工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强烈地意识到了苏联体制同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①。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这个体制充满了矛盾、僵化，而且给人民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小小的改良是无济于事的。由于在官方的宣传与他们的实际体验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这使他们日益成长为争取民主和进行彻底改革的有觉悟的战士②。

在历史上，首先对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压迫进行斗争的是知识分子。他们绝不是没有社会基础，他们发出的反抗的呼声一旦为人们所听取，这就标志着他们的思想和要求已逐渐扎根于人民，被人民所理解。这反过来又给他们以必要的精神力量，对绝对

---

① "技术员和工程师，大部分是在工人阶级这个环境中产生的，并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他们没有特权，至少是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另外，在工程技术人员之间也不存在阶层间的激烈竞争，因为工程技术人员满足不了需要，这在地方上尤其如此。在企业职工中，技术员、建筑师和工程师占了很大比例，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些人员的增加，将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他们希望进行彻底的、但是渐进的社会改革，根本不希望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别罗契尔科夫斯基：《给苏联未来领导人的信》，见《党派评论》杂志第四十二卷，第二期，第265页。）

② "工人工程师和科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关心建设性的改革的。因为他们比其他任何一个阶层都更加认为自由的缺乏是不合理的专制官僚制造成的，所以他们在为建立一个民主的、工人享有权利的体制而奋斗。他们对于盲目的破坏或无政府主义不感兴趣。他们具有相当高的健康理智和人道主义的正直性。"（同上）

主义的政权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没有人民的有力支持，捷克的改革派也不可能展开斗争。

当然，党的官僚们的态度也决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各种巨大的困难和人民当中不断增长的不满和反对态度造成了党内分裂。虽然所有官僚在维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应读为党的机关的领导地位）和一党专政体制这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加强党的官僚政权问题上自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部分党的官僚倾向于采取反动手段，他们认为，只有维持和加强镇压体制，才能在不进行任何改革的情况下维护现政权（公开的说法是“社会主义”）。这部分可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人企图把这种体制的缺点说成是“资本主义残余”，而且是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所造成的。这些斯大林分子利用伪造国内外敌人的方法：第一，把群众的注意力从制度的缺点及其官僚制根源上转移开。第二，想在人民内部引起民族主义感情和与此相联系的人民意志，以维护本制度。这些人还确信，经常加剧国内外紧张局势并经常刺激反对所谓社会主义敌人的心理，能够平息人民的所有怀疑、批评和反对态度。

“在对外政策方面，这些斯大林分子批判勃列日涅夫对西方的政策，尤其反对同西方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他们主张东方集团的统一性，而且对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采取强烈的态度。所谓修正主义的倾向就是指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路线和西欧的许多共产党内出现的进步倾向。”①

与此相反，党官僚中的另一部分人相信，只要保障人民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并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来平息人民的强烈反抗，就能巩固体制。这派人想进行某种程度的部分改革来博得人民的欢心，比如，向人民保证提高经济效率和消费水平。但是改革不允许触

① 参阅W·莱昂哈德：《一次新的革命即将到来？》，第121页。

及体制的本质，即不能触动党机关的绝对统治，从而也就不可能排除一切决策完全官僚化的主要根源。但是，这种比较宽大的官僚们准备作某些妥协，人们首先可以从中期望较快地提高生活水平（例如，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在经济计划和领导体制方面作部分改革，在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放宽一点政策①）。

在形势发展的不同阶段，党的司令部中的这两派有可能交替掌权，政治路线和策略也许会有所差异。那时，有可能经常发生党的机构和人事的变动。但是，这两派在路线方面的区别并不突出，而且很不清楚。许多党官僚究竟跟随哪一派，不取决于原则判断，往往取决于权势变化和人事关系。自由派虽然为各种真正的改革和解放运动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但他们在实质上仍是官僚的一部分。因此，期待这一派排除官僚统治的根本原因，则完全是一种幻想。为实现改革体制而努力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们，在较自由的条件下要比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能较容易地为民主化进行斗争（比如捷克的改革派就曾如此）。但是他们必须考虑到在为真正的民主化进行斗争时，迟早会遭到整个党的官僚的抵抗，因而只有依靠人民的强大压力或进步的国际援助，才能粉碎这种抵抗。

党的官僚们的手中虽然集中了极大的权力，但在共产主义各国，特别是在苏联本身，在可预见到的将来，推翻体制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对这种官僚制的国家垄断经济的分析说明，劳动生产率日趋下降，其损失巨大，并且没有能力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体制内部有思想的人，将不支持这个体制，相反，将否认这个体制，并抱有越来越强烈的改革思想。不满情绪将日益增强，潜在的、没

① "主张现代化的人们想通过周密准备的、而且是由上面控制的改革来避免体制发生严重动摇。在经济领域里，他们主张进行自上而下的有限的改革；在民族政策方面，他们主张执行削弱民族主义的审慎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这些人表现出具有专家治国论的倾向。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们赞成执行同西方实行缓和的政策，赞成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实行科学技术合作。在这方面，他们甚至准备比现领导走得更远。他们主张发展足够的消费品生产，但他们更多地是想以此来安抚人民。"参阅W·莱昂哈德：《一次新的革命即将到来？》，第124页。

有明显表露出来的反体制的感情将越来越广泛地扩大到人民的各个阶层。这将愈发加剧党的官僚体制内部的两极分化。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出现极端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发展，但是也有理由可以期待自由派官僚的力量得到壮大。可以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个制度逐渐地向未来的民主化开放，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逆转。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随着多数人民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官僚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他们本身的利益关系出发，受到很大影响，进而接受人民的要求。当然，世界舆论对这种形势的发展也将给予不小的影响。

七、政 治 后 记

这本书的目的，是打算介绍共产主义国家中政权体系的真相。但是，我特别想到的是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而把社会主义变革看作是人类未来的人。随着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矛盾和困难逐步增加，同时，也随着资本主义体制解决未来问题（在不根本改变体制的情况下）的能力日益削弱，他们日益感到有责任应为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而努力。如果形势要求彻底解决问题，那么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应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何方呢？今天，这些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命运。我恳切地警告那些把苏联社会的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人，这些人犯了各种各样的"幼稚病"，这本书所进行的分析当然只能是理论和抽象的东西，所以不可能十分生动地描述苏联社会中触目惊心地对人性进行歪曲的事实，从而唤醒读者。苏联共产党的干部和官僚在精神上颓废和缺乏品德，他们玩世不恭，在他们中间只有阴险的权力之争，以及虚伪的宣传和颠倒黑白的本领。他们是那样的无知、那样的爱搞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这一切表现，在共产主义体制下是日益严重了，并已蔓延到人民群众之中。但是，只有那些掌握语言艺术的作家，才能具体生动地把这一切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还是很不够的，它只不过是以极其理智的形式表述了官僚体制的不良发展倾向及其后果而已。

它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能克服的幼稚病，它是背叛解放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冒充社会主义的官僚制的特性。同这个体制生死与共的体制代表们和辩护士们，总是说这一切都是假的，是资产阶级"反共"的表现。但是现在用这些陈词滥调来简单地扼杀

和回避这些证据充分的批评已不可能了。这里我要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只有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未来。尽管有人竭力指控我是背教者或叛徒，而且歪曲我的见解，但是，谁也不能动摇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不能把我的观点歪曲成为反社会主义的。

我之所以用我的一切经验和知识反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因为对我来说，关系到实现一个大众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官僚化的政权干部们的社会主义。我认为我的任务不仅在于要彻底地暴露共产主义体制的现实，而且还在于阐明导致这一制度堕落为反社会主义的原因。

认识这些原因，不仅是改革现实体制的最基本的条件，而且也是将来防止在其他国家建立这种官僚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前提条件。如果不是只考虑个人的权力，而是真正为人民的话，就不应不理会这本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和知识。

目前，在意大利、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内，正在形成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设想，其中包括保持多元化的民主。希望所有的共产党都认识到各种民主条件对实现社会主义进步所具有的根本意义。但是这不能意味着这些西欧党可以继续无视东方集团国家中正在镇压民主以及随之而出现反社会主义的后果。西欧共产党理应彻底地研究捷克改革者们的分析和改革方案，并在理论上加以利用，这也是他们的历史责任。只是抗议占领捷克是不够的，因为这对捷克人民来说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今天，衡量人们是否真诚地追求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其标准不仅是对捷克的改革尝试采取了什么态度，而且要看他们从中得出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论。一些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参加苏联对捷克改革派的诽谤，把他们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叛逆者”。但是，东方集团的权势官僚们认为是背叛的东西，正是改革派长期以来同那些早已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激烈争论的东西。真正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们必须背离官僚们、功利主义者们和伪善者们，因为

他们不仅没有体现社会主义，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里败坏了社会主义的信誉。

我认为这本书如实地阐述了共产主义体制，这是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尽的义务。换句话说，我不是从什么政治的、战略的立场出发来加以阐述的，从而试图使共产党的掌权者们能接受我的叙述和论断。就这一意义而言，人们必须把政治和社会科学严加区分。的确，政治性的策略还是有意义的。在共产党国家中，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这样的必要性。即很多理论性论文的作者对事物看得很深，具有很深的批判性，如果在自由的条件下，他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形式写出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不得不如此小心谨慎地撰写他们的论文，为了不致使它很快被指责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或是敌对的言论，从而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但是，即使这些不能明说，而只能采取暗示的方式和寓意深刻的方法撰写的论文，正以不同的方式在东方传播，甚至在一部分共产党员中起着影响，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我自己和所有改革者们长期以来都不得不极力注意运用这种策略，因为我们既要改变现状，又不愿意立即被作为“敌人”遭到镇压。不理解这种策略的人们，就是不懂得政治为何物的人，也是不认识在一定的客观情况下如何实现正确目标的人。同样，人们也应该理解国际政治中各种不同的政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去正视东方集团的现实，或是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本质及其发展抱有幻想。相反，不以政治策略为自我目的，或者不愿长期适应现有权势关系而要求逐步走向人类解放的人，也不能总是实行“现实”的、适应性的政策。人们对那些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对手是可以作出各种让步的，但必须确信，作出让步是为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能实现有利于被压迫人民的进步和变化。官僚体制的反对者只有借助于长期的政治战略，甚至与苏联官僚体制作某些妥协，才能使官僚体制在将来变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体制。捷克的改革者们虽然对官僚体制的本质不抱幻

想，但是他们长期地、慎重地考虑了在党内的行动，并选择了富有策略性的、分阶段的步骤，接近根本改变体制这一伟大目标的道路。但是，这一体制的改革被军事干涉破坏后，改革者们不得不脱离党，因为他们已不可能使体制改革继续进行，如果同反动的官僚政权继续合作，只会失掉人们的信任。

一旦人们确信，共产主义体制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主义的官僚体制，那么，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即使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成为衡量人们社会主义态度的标志了。如果一定的策略行动有助于这个改革，社会主义者就可以同意这种策略。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允许对体制的性质作"谨慎的"描述。但是，这种谨慎描述如果是为了掩盖真实的非社会主义的内容，或者只是为承认非本质的缺点和社会主义初期的不足，那么，这就应看作是对各国人民现实利益的背叛，是对国家垄断官僚的帮助。对于共产主义体制的真实的本质，对于试图改革这种体制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以及对于捷克改革者的努力采取什么态度，等等，是衡量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重要的基本标志。

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缺乏关心的人们，以及作为保守的资本主义支持者，或是作为没有长远目标的实用主义者而拒绝向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人们，都将企图同苏联大国寻求和好，因为他们以为通过和好可以达到：第一，维持和平；第二，使资本主义在世界的一部分地区残存下去。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通过这种政策是否能真正保证资本主义的长远目标呢？这种政策必然将带来有意识地保持相应军事实力的努力。

希望变革资本主义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们以及企图防止本国朝着官僚体制、国家垄断制和极权主义方向发展的人们，都在他们国家的防御能力方面不应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就是说，只要东方集团还没有完成根本性的民主变革，就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如果在西方国家实行各种民主的、社会主义性的变革的可能性越

大，劳动人民因此而获得自由和社会进步越多，那么，西方国家越要对东方集团的国家官僚体制具有防御能力。不理解这点的人们，就是不理解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反人民、反民主及其新帝国主义的性质。民主制度的成绩越大，这个制度下的人民生活水平越高和自由越多，共产主义国家内争取民主改革的人们就会更加强有力地进行斗争。但与此同时，在东方集团的党官僚内部，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的一派，也必将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对改革派进行孤注一掷的斗争。官僚们为维持其权力，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国内镇压，而且还将进行对外扩张，首先针对的是有感染力的发展民主的中心。因此，只要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势力还未能通过真正的民主改革从根本上加以削弱，只要对外扩张主义的野心和危险还没有被排除，那么，西方各民主力量就不能放弃其军事保护。

很显然，如果西方国家能实行进一步的民主的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这将会更加促进东方集团的民主解放斗争。同样，在西方国家垄断主义的和国家官僚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民主受到了限制，那么，它必然将有助于加强东方集团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们的观点、利益和地位。当前世界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矛盾日益明显地存在于这样两个发展方向之间：一方面，向着国家垄断主义的、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化方向发展，人民的权利日益被剥夺，对人民的压迫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经济领域内都存在着这样的发展，它给人民带来日益增多的可能性，在社会的微观和宏观方面，在不受部分利益集团的控制下，民主地决定社会的发展。如果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越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那么，东方集团国家中的民主解放斗争也将会越加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和东方国家之间的各种人员接触将不断发展。这种接触，最终将使缓和政策日益成为现实。

正因为缓和政策首先有助于东方集团国家的自由力量，削弱斯大林主义势力，并减少他们煽动敌对情绪的借口，因此，缓和政

策受到一切进步人士的欢迎和支持。当然，我们不能对苏联共产主义官僚体制抱幻想。缓和政策对于国家和党的机关中一味追求个人目的、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斯大林主义势力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策略而已，他们把这个策略看作是现有条件下追逐其统治世界的目标的一个实验。西方国家应充分地认识现实斯大林主义的倾向，执行一种积极的、促进民主和阻止官僚体制在世界进行侵略的政策。只要斯大林主义者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暴力行动、强行推进疯狂的扩军备战活动的可能性越小，那么，不仅保卫世界和平的可能性越大，而且争取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和进步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东西方之间通过经济、文化、旅游等关系进一步取得发展，同时，西欧的民主如果在这种关系中更加一致性地、谨慎地、有长远目的地发挥促进民主的作用，那么，东方集团各种民主力量争取自由的斗争就将会出现更好的条件①。

当然，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在各国间进行协调，而且要比苏联的外交政策更具有长远的目标。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在缓和中继续追求在世界上扩大其霸权主义的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因为东方集团体制的民主化，也是克服其新帝国主义性质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所以西方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应是**东方集团国家的真正民主化**，而短期的策略步骤都必须服从这个长远的目标。西方国家通过这种目标明确的外交政策，即使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更强烈的斯大林主义倾向在苏联重现（这是应该充分地认识到的），但是这种政策总比冷战政策更能为东方集团的民主化提供较好的机会。而冷战政策只会造成世界大灾难。

在这本书中，不可能充分地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复杂问题。为了完整地理解东方集团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及其条件，简要地谈一下这个问题也是必要的。希望对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这一分析，也

① 参阅奥塔·希克：《东西方经济关系的政治意义》一文，见《争取没有独断的经济》一书，第74—87页。

能激起西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对社会主义的内容进行认真的理论性的研究。

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劳动者至今还害怕进行社会主义变革，那么，这首先是由于那些共产党在掌握了政权后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国家垄断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果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存在，那么，任何资产阶级的宣传也不可能长期地向工人阶级隐瞒和歪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削弱争取社会主义未来这一斗争的，不是揭露当今共产主义实情的人们，而是那些害怕正视现实的人们。认真的批评，即使受到蔑视和虚伪的反驳，但它不可能被取消。尽管共产主义官僚体制在镇压人民，但这种批评也在日益加强，而且将成为一股现实的政治力量。只有当这个体制本身开始发生变化时，批判这一制度的理论才会不复存在。

附 录

一位未署名的朋友从布拉格的来信(摘抄)

尽管我国的领导干部以强硬的语气进行种种乐观的发言，但是我国政权机关已陷入日益加强和扩大的恐惧之中。

当前,我国政权机关害怕一切,确实害怕一切。它害怕活人,活人能思考,不愿作自我批评,而敢于说话。它也害怕死人，害怕对死人的怀念。它既害怕坟墓,也害怕掘墓人。不光害怕年轻人,也害怕老共产党员。害怕非党人士、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害怕科学、艺术、影片、戏剧、书籍和唱片。

我国政权机关害怕新闻的自由传播,害怕电视卫星。西德电视台的第三套节目使它不得安宁。它害怕外国的广播,如同害怕吗啡和大麻毒品一样。它害怕外国文学和印刷品进入国境,害怕本国人民到国外旅行和外国人来访。害怕西方的旅行者、记者、实业家、外交家、知识分子甚至学生，因为他们对我国政权机关来说是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敌人。

我国政府害怕技术进步。对它来说,印刷术、复写机、复印机，甚至普通电报、电传报以及对外联系的自动电话等均成为火烫燎身的火种。内务部在不断探求新的方法和措施,企图使这些发明和技术进步的使用无害于它。他们还害怕将不断在生产和工业中引起变化的本来就是无害和中性的技术进步，因为这些很难预料会引起什么后果。但我国政府却似乎并不害怕那些有关战争技术和镇压技术的发展(例如改进了的警棒、催泪弹、空间窃听设备、电话窃听器和信件检查装置等),因为这些技术进步,会巩固它的地位,加强它的安全感。但是实际并非如此,这些技术很昂贵,花费大,使用这些技术装备势必破坏本来就很难维持的经济平衡。

我国政府害怕爱收集轶事者，害怕流传中的手稿，害怕国外流亡者的英德克斯出版社和多伦多六十八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害怕在伦敦出版的《证据》杂志，甚至也害怕用打字机复写的只有很少分数的传阅刊物。

我国政府既害怕人们的现实的政治活动，也害怕已被判处的政治犯。胡萨克政权在捷克局势正常化的五年之后，认为必须从根本上强化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不受约束的警察的权力；给军事法庭以判处一般市民的权限；限制一般市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对被释放的政治犯实行所谓监护制度；使通信检查合法化；以及进一步恶化政治犯待遇等等，这些都决不是偶然的。一九七三年生效的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就等于宣布紧急状态，这显然同已宣布的局势正常化是相矛盾的。但是，这却表明，我国政府在采用这一系列措施的同时，却又害怕实行表决，使之"合法化"。

胡萨克政权不管是对所谓政治右翼还是对极左派，都同样惧怕。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积极分子集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发出警告说有来自右翼的危险。他们说：右翼势力仍然很强大，而且组织得很好，不同的只是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和领导人。

胡萨克政权也害怕他们自己的警察。正如历史所多次证明的那样，自己的警察对于身居最高政治地位的人们来说也可能是危险的。正因为如此，内务部部长卡斯加神秘地死去（因飞机失事）之后隔了相当长时间不知所措，直至一九七三年春才任命奥布契纳继任内务部部长。

胡萨克政权同时害怕撤退苏联军队。当限制欧洲军事力量的维也纳会谈开始后，捷克负责保安的最高当局便发表一个决议和备忘录，提醒捷克和苏联政治局说，如果匆忙地从捷克撤退苏军将会出现不可忽视的政治后果。他们的职责就是了解国内形势，因此可以认为，他们是充分认识国内状况的。

他们尤其是害怕缓和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紧张局势。在捷共

秘密干部会议和干部培训班上，他们说，缓和紧张局势只不过是一种策略，实际上并非需要缓和；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进一步巩固我们的政权，因为在捷克西部边境驻扎有武装到牙齿的西德联邦军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他们正在威胁着我国的主权（难道我国的主权还存在吗?!）

的确，胡萨克政权是有很多因素促使它担心，因为他们的政策是充满对本国人民犯罪的政策，他们出卖了我国主权，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在胡萨克政权执政期间，我国已完全沦落为苏联的殖民地，其政治权限远比非洲和亚洲当前残存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拥有的权限还小。许多公开或秘密的协定，把我国进一步牢牢地同苏联连结在一起。我国至今还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捷克要对任何一个国际协定，甚至是一般的事件表示态度时，都必须事先同莫斯科商量以取得它的同意。根据秘密协定，即使在欧洲以外发生纠纷时，捷克军队有义务同苏联军队并肩作战。捷克国家公安机关完全掌握在苏联克格勃手中。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顾问不断增加。我国机关的效率很低。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毫无权利。这些机关，包括选出的工作人员在内，完全处于党的机构的控制之下。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以及人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不断减少。但执政机关却从不尊重现行法律。在经济领域里，问题也堆积如山。石油和原料的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使我国已在不断出现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人民虽然因物价昂贵而被迫节约，但这已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物资供应不断发生问题，同时现政权也无能解决住宅问题（从布拉格住宅合作社建房的情况看，今天年轻人要房子，必须等十年至十五年）。

胡萨克政权确实有许多理由害怕，因为它的力量是建立在外国的刺刀和坦克的基础之上的。它的政治活动家都是我国的一些技术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庸才。

虽然捷克的官僚们大肆宣传在进行科学技术的革新，但实际

上这同他们说忠于列宁主义、同苏联的永恒友谊等一样，都是千篇一律的宣传。实际上这些宣传同社会运动只能使人民对统治阶层产生怀疑和失望。因为人们难以理解这一切，从而产生了恐惧。在捷克不是以革命理论为依据建立一个革命的制度，而是建立了一个当代最反动和最保守的政权。

但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无情的。现政权害怕，并力图禁止任何改革，这只能更加促使倒退，引起内部的更大的不稳定，并为它的没落或变革创造了前提条件。

（全文载于《证据》1975年第5期）